

# 闽学研究

## 编辑委员会

顾问：陈 来

编委会主任：陈庆元

编委会副主任：方宝川 谢必震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照南 王岗峰 王晓德 方彦寿 叶松荣

朱人求 朱杰人 朱高正 汤漳平 李豫闽

连 榕 陈 颖 陈支平 陈永森 张品端

张善文 林庆彰 郜积意 黎 昕

主 编：陈庆元

副主编：方宝川 谢必震

# 闽学研究

(季刊)

2018年第4期(总第16期)

---

---

## 目 录

### · 朱子学 ·

朱熹“格物致知”的功夫论内涵·····乐爱国 / 1

闽学刍议·····苗圃 / 12

### · 闽学名家 ·

蔡献臣生平事迹与作品系年·····王石堆 陈庆元 / 16

朱熹高足陈淳与傅伯成、傅壅父子交往考·····刘涛 / 62

严复海权思想研究之检讨与前瞻·····戚庆雨 / 71

### · 闽学文献 ·

士珪禅师入闽时间及驻锡地小考·····郑淑榕 / 77

南宋李韶《竹湖公论葬说》辨伪·····李弢 / 83

主管 主办 福建师范大学

---

---

· 闽学与诗学 ·

论黄道周拟骚作品的艺术特色

——以《九诉》为例·····吴 洁 / 91

何振岱的咏梅诗·····杨 玲 / 95

· 闽台文化 ·

试论晋城古堡与福建土楼的异同点·····王军雷 / 100

台湾竹枝词中的民俗节日研究

——以农历七月为例·····刘国棋 / 105

· 闽学与时代 ·

论阳明文化在平和的传承与发展·····张山梁 / 113

闽地高僧慈航信仰与两岸文化交流·····郑顺婷 / 120

《闽学研究》稿约····· / 11

# Journal of Fujian Studies, No.4, 2018

---

## Contents

- The connotation of Zhu Xi's methodology on the Study of Nature.....Le Aiguo / 1
- A brief discussion on Fujian Studies.....Miao Pu / 12
- Life story and literal works by year of Cai Xianchen.....Wang Shidui   Chen Qingyuan / 16
-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interactions among Zhu Xi's brilliant student Chen Chun, Fu Bocheng and his son Fu Yong.....Liu Tao / 62
- Review and outlook of Yan Fu's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maritime power .....Qi Qingyu / 71
- The time Shigui, the Buddhist monk came to Fujian province and his place of residence  
.....Zheng Shurong / 77
- Analyse the authenticity of Li Shao' authorship of the article on funeral rit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 Tao / 83
- The discussion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s of Huang Daozhou which imitate the style of *Lisao*.....Wu Jie / 91
- He Zhendai's Poems on Plum Blossom.....Yang Ling / 95
- Discussion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Jincheng Castles and Fujian earth Tower of Hakka.....Wang Junlei / 100
- The study of folk holidays in Taiwan's Zhuzhi Poems—such as the seventh month in the lunar calendar  
.....Liu Guoqi / 105
- Discussion on the inheritances and discoveries of Wang Yangming's culture in Pinghe county  
.....Zhang Shanliang / 113
- The beliefs of Cihang, the eminent monk in Fujian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Zheng Shunting / 120

# 朱熹“格物致知”的工夫论内涵

乐爱国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朱熹讲《大学》，讲修身以“格物致知”为先，又以“诚意正心”为本，解“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又以“敬”为本，因而以二程“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作为为学宗旨。朱熹“格物致知”不只是向外穷理，获取知识，其目的在于“致吾之知”，在“明明德”，七分向内，三分向外，要通过“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具有丰富的工夫论内涵。同时，朱熹“格物致知”由于包含向外穷物之理，包含了对自然界事物的探究，朱熹自己也对此有深入研究，因而对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朱熹；格物致知；敬；工夫论

说起朱熹，大家都有所知，今天侧重讲他的工夫论，这是朱熹学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整理和注释“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编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今天讲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所整理和注释的“四书”。朱熹致力于“四书”研究，尤其是对《大学》最为用力，直到临终前几天还在修改《大学》的“诚意章”。“诚意章”非常重要。《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朱熹的说法，《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先，但是在他之前的学者都认为应该从“诚意正心”开始；对此，朱熹进一步认为，“格物致知”是知的问题，“诚意正心”是行的问题，而行的问题比知的问题更为重要，更加根本，但要行得好，还是要从“格物致知”开始。朱熹说：“论先后，知在先；论轻重，行为重。”也就是说，《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先，但是以“诚意正心”为本。

朱熹注释《大学》，不仅讲《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先，最重要的是他还特地编写了“格物致知”补传。经过朱熹整理过的《大学》有经有传，但“格物致知”只有经没有传。也就是说，在朱熹整理的《大学》本子里，“格物致知”补传是朱熹增加的。朱熹的学问之所以能被后人接受，是因为他增加的“格物致知”补传被之后的学者所认同，同时也因而受到各种批评。所以，朱熹的思想是以格物致知论为特色的，且对后世影响最大。

朱熹除了讲《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先之外，还在注释《大学》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敬”。《大学》文本里没有“敬”字，但朱熹特别强调“敬”，认为敬是“涵养本原之功，是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为此，朱熹吸收了二程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把“敬”“涵养”与“格物致知”统一起来，认为“敬”“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这实际上就是学术上多年来一直讨论的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直到今天的学校教育、为人处事也经常涉及的德性与知识的关系问题。

朱熹所讲的“格物致知”，不仅是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工夫，而且还包括了对外部事物的研

---

**作者简介:** 乐爱国，男，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

究。朱熹从小就对自然界事物感兴趣，而且长期生活在南方武夷山地区，对山青水秀的自然界很感兴趣，长期从事自然研究。因此，他在儒学经典的诠释中，在授徒讲学过程中，对自然界事物都有所论述。今天讲儒学、传播弘扬儒学，不要轻视历代儒家学者对于自然知识的重视和论述。

下面大致分四个方面来讲述朱熹的工夫论思想，第一《大学》的“格物致知”补传，第二“敬”为格物致知之本，第三“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第四“格物致知”与自然研究。

## 一、《大学》的“格物致知”补传

我们先讲《大学》的“格物致知”补传。朱熹把《大学》分成经、传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朱熹认为是孔子讲的，第二部分是传，朱熹认为是曾子做的，是对经的解释。

先看经的部分。《大学》一开始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句说成是《大学》的“三纲”。这与董仲舒所说“三纲五常”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是一回事。

关于“明明德”，是有不同解释的。从字面上说，明德是好的品德，要彰显发扬出来。问题是人的好品德到底是社会规定的，还是人们内心中原本就有的，人的好品德到底是教给的，还是自身就有的？比如，大家都认为上了公共汽车就应该给老人让坐，小孩不知道，我们就要教他，也就是说，好品德是后天受教育而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原本就有好品德。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一个小女孩掉到井里去了，每个人都为之而生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受教育而来的，还是他天生就有的？人有善良之心、爱人之心，这个心到底是受教育而来的，还是内心本来就有的？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就是说这个恻隐之心原本就有。既然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为什么在现实中不是每个人看到小孩掉到井里都会有恻隐之心。我们看到报纸上披露，有人要跳楼，大家说你跳下来吧，真正有恻隐之心的人都不在场，那怎么解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題，我们才要把每个人内心固有的恻隐之心激发出来，而“明明德”就是要把自己内心原本就有的明德激发而彰显出来。

所谓“亲民”，朱熹注释为“新民”。每个人原本都有明德，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没了，应当把它激发出来，然而，仅仅这样做还不够，还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让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好人，这叫“新民”。《大学》原字是“亲民”，凭什么要注释成“新民”？因为朱熹在整理《大学》时发现，《大学》里有所谓“《康诰》曰‘作新民’”的说法。既然“亲民”是经，那末后面就应当有传，对经作出解释，所以朱熹就用传里的“新民”二字注释经里的“亲民”。后来王阳明说朱熹注释得不对，认为“亲”就是爱，“亲民”就是爱民，怎么会是“新民”呢？到底哪一个注释合理，我们可以讨论。

“止于至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做就做到最好，凡事都要做到极致，这是“格物致知”的精髓。比如，大家都来听课，就要听到最认真，集中精力，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凡事都要做到极致，这就叫“止于至善”。以上就是《大学》的前三句。

接着是“八目”，顺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方面在明清时期简化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个方面，修身在中间，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修身是根本，而修身的具体做法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怎么修？是不是坐到庙里念一念经就是修身，闭目养神就是修身，在家里浇花、种草、听音乐、听讲座就叫修身？在朱熹看来，修身就是《大学》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格致诚正”。

《大学》在讲“三纲”“八目”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修身为本”。朱熹认为，这是相对于天下国家而言，修身为本，天下国家是末。但这并不是说天下国家不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重本轻末之说。当时的人们喜欢讲本末问题，凡事抓住本，比较轻视末。宋代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体用关系。什么叫本末，什么叫体用？比如说，一个人的精气神，这当然是本，就是体，肉体是末，也就是用，能说肉体不重要吗？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为末不重要。1983年我从华东师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在硬座火车上碰到华东政法学院学法律的毕业生，我们辩论到底哲学重要还是法律重要，我说哲学是本，法律就是末，他不服气，非得辩，最后他辩不了了。应该说哲学与法律都重要，只是有本末的差异。宋代人把本末说成是体用关系，就是人的精气神和骨肉的关系。没有骨肉，也就没有精气神；没有精气神，光有一身骨肉，不过行尸走肉而已，也不算什么事。所以两个都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说，精气神为本、为体，骨肉为末、为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修身为本，天下国家是末，并不是说天下国家可以不要了，而是说，修身是体，天下国家是用，是要通过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把事情做好。

朱熹说：“大学之道，虽以诚意正心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为先。”也就是说，《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最根本的是“诚意正心”，最为重要。不少人听过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朱熹却要将知行分个先后，认为这样才容易做。如果不将知行分个先后，就不知从哪里下手。“格物致知”为先，就是要从“格物致知”下手，讲的是知在先，但最重要的是“诚意正心”，是行，在这个方面，王阳明和朱子学是一样的，都强调行的重要性。但是，朱熹较多思考如何“诚意正心”、如何行的问题，因而提出“诚意正心”为本，一定要以“格物致知”为先。

朱熹讲《大学》“以修身为本”，特别对“明明德”作了深入阐释。朱熹说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在朱熹的宇宙观看来，不仅人有明德，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共同的德性，这是老天给的。生活在世上的每个人，他们的能力、品行、知识虽有高低之差，但最初的明德是老天赋予的。这个“明德”，从朱熹后来的文本看，就是指心，讲的是每个人原本都有老天赋予的德心，性善论就是说每个人原本都应该有仁爱之心。我跟我的学生说，大家原本都有爱心，但是自己为什么不知道呢？要想知道，很容易。厦门大学面朝大海，到海边去，静静地面向大海，问问自己有没有爱心，想想就知道了。许多学生爱问老师怎么做人，我说你到海边面向大海问问自己，就知道怎么做人了。如果老师教你怎么做人，那只是老师的做人之道，可以参考，但不等于你应该像他那样去做，因为如何做人并没有固定答案，答案在每一个人心中。这都是老天给的。人之心原本不仅是“明德”之心，而且还具众理，具备天下万事万物的共同道理。有人说这是圣人吧，只有圣人之心才可能具众理。但在朱熹看来，每个人的心原本都具备众理，都有爱心，而能应万事。

按照朱熹所谓性善论，我们一定会问，既然性善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干坏事？朱熹回答说，这是由于“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什么叫气禀所拘，就是气质不行。有的学生考上博士生，第一年基本就是玩掉了，什么书都不看，太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祖宗十八代就出那么一个，能够光宗耀祖当然开心；而有的人，今天考上博士生明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好几个博士，他是最后才考上博士生，一点面子也没有，所以他第二天就去看书了。考上博士生，高兴了两年，突然想到快要毕业了，这才开始做事；到那时，即使累的趴下，也无济于事。这就叫气禀所拘。在现实中，人与人的确有很多差异性，有的人天生就是学数学的，有些人学了一辈子，即使是非常努力，也未必能学好。可能有大脑生理结构的差异，更多是家庭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

除了气禀所拘，还有人欲所蔽。老百姓经常会说某某小孩小时候多好多好，后来被一些人带坏了，叫交友不慎，这会使我们想到孟母三迁。人欲多了，好不好？过去一直说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对人的欲望批评太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欲多了，心就乱，头脑容易发昏。这就是所谓“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原来人有善良之心，能够知天下根本之事；即使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但也知道下雨的时候，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些原本就知道的，但因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有时昏了头。我们常常讲反腐，那些被逮到监狱里的人往往自称是一时糊涂，昏了头了。其实，他的心像明镜似的，进了监狱，方知后悔。为什么会后悔？如果他说他值了，那就是良心泯灭了；他说自己后悔，说明本体之明，本心还是明亮的、明净的，只是那个心管不住自己。昏头了，怎么办？“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就是要根据其具体情况，将其内心之明德激发而显现出来，“以复其初也”，恢复其最初的明德，正如被污泥裹着的珍珠，将它擦拭干净，让它恢复明亮。

《大学》讲“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最重要的是明明德。明明德跟“八目”是什么关系？朱熹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五个方面都是“明明德”，是本、是体，后面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末、是用。只要“明明德”了，回复到了善良本心，你自然会去做。但不等于说我身修好了，家庭就能摆平，国家就能治理好，这不一定，还要去学习。不过，这些都好办，没有学不会的。

所以，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要修身，而修身，就是要“明明德”，就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朱熹说：“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通过格物、致知，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坏东西，什么东西是臭的，什么东西是漂亮的，这就是知。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就得喜欢；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就要厌恶。厌恶坏的、臭东西，就是“恶恶臭”；喜欢好的、漂亮的东西，就是“好好色”。这就叫“诚意”。

朱熹既重视“格物”，又强调“诚意”。他说：“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诚意是善恶关，诚得来是善，诚不得只是恶。”我们格物，格得来就是觉，格不来就是梦，所以，“格物是梦觉关”，这个好理解。那么，为什么“诚意是善恶关”呢？一个人的善恶是从哪里开始的，关键要看你做不做。通过格物，明白了这个事是对的，我就去做，那个事不对，我就不做，这就是诚意，就是善；明知道这个事是对的，应该做，但我不做，那个事不对的，不该做，但我偏要做，这就是不诚意，就是恶。所以“诚意是善恶关，诚得来是善，诚不得只是恶”。

朱熹注释《大学》，最重要的是为“格物致知”增补了传，这就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致知在格物”，这是《大学》经里的一句话，按朱熹的解释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内心原本就有的知识道理，就必须去“格物”，而所谓“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关于“格物”的“格”字，有不同解释。朱熹认为，“格物”就是要研究各种事物，彻底弄明白事物的道理。什么叫“致吾之知”？人的心原本就具有众理，原本就明明白白，但是现在糊涂了，要把内心原本就有的知识道理明白起来，就要“即物而穷其理”，弄明白事物的道理。与朱熹不同，陆九渊和阳明学认为，既然人的本心是良心良知，那我们就去把它找回来，这与弄明白事物的道理没有关系，而是要通过静坐，



扫除私心杂念，从而觉悟到内心原本就有的道理。朱熹不这样，他认为要明白心中的道理，只能去“即物而穷其理”。事物的道理与内心的道理是什么关系呢？朱熹认为，老天爷在产生天下万物和人的时候，把同一个道理都赋予了人与万物，所以，人内心的道理和天下万物的道理都是同一个道理。既然是同一个道理，我为什么要去格物，还不如格心来得方便。朱熹认为，仅仅格内心是不够的，应当七分向内，三分向外。为什么还要三分向外，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内去找寻自己的本心？因为人心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本身有缺陷，所以只是向内去找寻本心是找不全的，还得三分向外找寻。既然天下万物的道理和内心的道理都是天赋予的，都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就没必要全部花在向内找寻上，既可以向内找寻，也可以向外格物。

朱熹特别强调格物必须穷理，要穷尽事物的道理，因为事物的道理要通过深入研究才能完全明白，所以，格物就是要把每一个事物都弄得明明白白，进而穷尽其道理。同样，修身就是要把每件事情都干好，把每天的事情都干到最好。前面说到，浇花、种草、听音乐算不算修身，如果浇花三心二意那不叫修身，就算是读书，如果三心二意，那也不叫修身。如果浇花时，一心一意，想到这个花大概要多少水合适，什么时候浇合适，你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这叫敬业，其中包含了“格物”，包含了“即物而穷其理”，这就是修身了。修身不只是空出时间来读书学习，反省自己，把每天的每件事都尽力做好，并且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是修身。

朱熹说“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那么，为什么通过“即物而穷其理”可以“致吾之知”呢？朱熹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就是说，人心原本就具有众理，因此都有知，而天下的所有事物都有道理，只是由于没有完全懂得这些道理，因此“知有不尽”。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这里的“学者”不只是指读书人，而是指所有的人，只要去接触天下之物，而不只是关注内心，“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依据自己的已知之理，不断地思考，明白天下之物的道理，并且越来越深入，“以求至乎其极”，做到最好，止于至善。“至于用力之久”，最后总会有一天突然豁然贯通，就像王阳明经历了不同凡响的人生在龙场突然悟道一样。经历了长时期的“格物”，“即物而穷其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最后达到豁然贯通，也就达到了“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也就是说，把天下万物的道理都弄明白了，而且你的心也跟明镜似的，是非善恶清清楚楚。这就是“格物致知”。

## 二、“敬”为格物致知之本

讲“格物致知”，要明白天下万物的道理，这里有个态度问题，就是要认真对待，要一心一意，这就是“敬”。前面说过，朱熹认为敬是“涵养本原之功，是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讲的，态度决定一切。

朱熹讲“格物致知”，同时也讲“敬”，甚至他还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什么是“敬”？朱熹说：“‘主一之谓敬’，只是心专一，不以他念乱之。每遇事，与至诚专一做去，即是主一之义。”“敬”就是“主一”，就是“专一”，一心一意，心无旁骛；“不以他念乱之”，不去胡思乱想，不要想得太多，这就是敬业。以这样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

其实，“格物致知”与“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遇到事情，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地去做，这就是“敬”。“格物致知”就是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地去做，只有这样，才是“格物致知”，

如果不是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地去做，那就不叫“格物致知”。所以，“格物致知”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认认真真、一心一意，也就是说，“敬”是“格物致知”之根本。同样，做任何事，如果不是认真去做，三心二意，那就不叫做事。

关于“敬”字，有很多内涵。朱熹除了讲“主一”“专一”为“敬”，还说：“只是要收敛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须要持敬。”这里讲“敬”，就是要“收敛此心”。所谓“收敛此心”，就是讲要收收心，不要这也想做，那也想做，要有所收敛。比如，我们到这里来听课，如果你的脑袋里还装着其他事情，想七想八，尤其是想到听这样的课有什么用，而另一个人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最后你们花的时间一样，用的精力一样，取得的效果却是相差太远。每一天都差那么一点，人与人的差距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人与人的差距，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输在起跑线上，不在于人的智商、情商的高低，也不在于是否要忙得昏天黑地，更不在于是否有人帮忙、运气好坏，最重要的在于做事的时候能否认认认真真、一心一意、“收敛此心”，在于“敬”。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凡事认认真真、一心一意、“收敛此心”，则要靠修养，尤其要从小培养。

中国有句古话叫“3岁看8岁，8岁看到老”。一个人一辈子的德性8岁前就定下来了，所以家长在孩子8岁之前一定要管好，8岁之后不会听你的。10来岁以后的孩子，父母叫向东他偏向西，所以教育孩子要在8岁之前才会有效果。要培养他们认真做事的习惯，甬管做什么事，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收敛此心”，教他们如何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地做事。

关于“敬”，朱熹还说：“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不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恣地放纵，便是敬。”“敬”不是说有个“敬”的样子，装着很认真，很专注，这个不是“敬”。“敬”要由衷的敬畏，不是装模做样地静坐着，耳无闻，目不见，脑袋什么都不想，而是要对每一件事情有敬畏感，老老实实地收敛此心，整齐纯一，不放纵自己，这才是“敬”。

朱熹非常强调“敬”，不仅讲“‘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而且还说：“‘敬’字是彻头彻尾工夫”。什么叫“彻头彻尾”？彻头彻尾就是“成始而成终”，就是自始至终都要“敬”，就是从小学到大学自始至终一辈子都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古代的学问分小学、大学。八岁入小学，教他洒扫应对，待人接物，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了十五岁，则入大学，教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说，入小学，如果不讲“敬”，就不能“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入大学，如果不讲“敬”，就不能“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也就实现不了“明明德”“亲民”。所以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敬”不仅是最根本的，而且是贯穿始终的。

所以，朱熹讲“持敬是穷理之本”。《大学》讲“三纲”“八目”，从“格物致知”开始，而“格物致知”要以敬为本。首先得态度认真，要一心一意，不要有私心杂念，要“主一”。想得太多了，事情就容易做砸；事情做砸了，对谁都不好。不要过多地考虑得失问题，专心专意把事情做好，态度是第一的。否则，若是没有“主一”，书中所讲的道理，他人所讲的道理，就不能成为自己明白的道理；与此相反，若是有了“主一”，书中所讲的道理，他人所讲的道理，就能够明白，就能成为自己的道理。

朱熹甚至还说：“《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也就是说，《大学》从“格物致知”开始，而格物致知最好从“敬”入手，敬最为重要。当今人们说态度决定一切，这种说法与朱熹有

相通之处。中国人做事强调态度，强调“敬”的工夫，朱熹在这个方面讲了很多，花了很多精力。我们今天还说要用心做事，重要的不是在做，而是有没有用心；不能只是看上去忙忙碌碌，却是心不在焉。当今，人人都在做事，一天到晚忙得很，累得很，但用心的却很少，所以是瞎忙活，什么事都没做成，什么事都没做好。只有用心做，一心一意，专心致志，才能把事做成，把事做好，而且精益求精。我们讲工匠精神，其实就是要用心。做事的能力都差不多，差别就在于认真不认真，在于是否一心一意，是否有“敬”。所以，根本就在“敬”字，不在于能力的高低。

### 三、“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朱熹既认为《大学》“三纲”“八目”，以“修身”为本，而修身以“诚意正心”为本，必须从“格物致知”开始，又进一步认为“格物致知”以“敬”为本，所以，他既讲“格物致知”又讲“敬”，尤为重视“敬”。于是，他把二程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看作为学的宗旨，这也就是朱熹工夫论的根本基点。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讲的是修身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涵养，一方面是进学。涵养就是要讲“敬”，要在“敬”中提高自己的涵养；进学则要“格物致知”，在“格物致知”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学问。朱熹对二者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

第一，朱熹说：“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也就是说，涵养与格物穷理二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在格物穷理时，必须认真对待，一心一意，要“敬”，而所谓“敬”，就是要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地格物穷理，而不是什么都不干，先“敬”会儿，然后再格物穷理，也不是先胡乱地把事做了，然后再“敬”。就像我们来听讲座，并不是先认真一会儿，然后再来听，也不是听完讲座后再来认真，而是在听的时候，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听与认真，这二者没法分。所以朱熹说：“以敬为本，敬却不是将来做一个事。今人多先安一个‘敬’字在这里，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这心，莫教放散；恁地则心便自明。这里便穷理、格物。”也就是说，以“敬”为本，并不是把“敬”当作一件事情来做，不能说我正在做“敬”这件事。所谓“敬”，就是在做事时要用心，要认认真真，不要心散了，心不在焉；而用心去做事，就是格物穷理。当然，为了要认真用心地做事，在事前需要先调适一下自己的心情，让自己静一静，但这是“静”，而不是“敬”；只有认真地调适自己的心情，认真地“静”，这才是“敬”。“敬”本身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体现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在做事时始终一心一意，只是有这颗心，用心去做，不要让它散了，所以，用心与做事二者不可分，涵养与格物穷理二者不可分，这也就是朱熹所说“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

第二，朱熹不仅说涵养与格物穷理二者不可分，而且还说“二事互相发”，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既要居敬又要穷理，二者似乎是两件事，居敬是居敬，穷理是穷理，但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而且，居敬与穷理“互相发”。也就是说，要穷理，必须要“敬”，越是能穷理，就越是能够“敬”。我们反反复复地讲做事要认真，做事要认真，但还是认真不起来，那怎么办呢？那就接着做，继续做，事情做多了，自然就会越来越用心。同样，不断地格物穷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不仅明白的道理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能够专心致志，而越是能够专心致志地格物穷理，格物穷理的工夫也就越好，这就是朱熹说的“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二事互相发”。

《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什么意思呢？朱熹解释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也就是说，要成为君子，必须从“尊德性”和“道问学”两个方面入手，提升自己的道德。“尊德性”就是要“存心”，就是《孟子》说的“存其心，养其性”，存养好老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善良心性；“道问学”就是要格物致知，以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朱熹认为，“尊德性”和“道问学”这二者是“修德凝道之大端”，是修养道德的下手处。这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居敬、穷理二事互相发”。当然，有人会问，“尊德性”和“道问学”，哪个更为根本？《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认为，只能说“尊德性”为本，也就是说“涵养”为本，“敬”为本，但是有了本，不等于可以不要那个末，因为二者不可分，“二事互相发”，二者缺一不可。

#### 四、“格物致知”与自然研究

朱熹工夫论既讲“格物致知”，又讲“敬”，并且认为“敬”为格物致知之本，因而较为重视“敬”，但实际上，朱熹较多讲“格物致知”，这是因为以前的儒者不太讲“格物致知”，而且“格物致知”涉及的问题较多，甚至还包括对自然界事物的研究。朱熹的“格物”，既包括向内的对自己心、性、情的体察，也包括向外的，对社会道德、政治乃至自然界事物的考察，所以又与中国古代科技有关系。我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对朱熹关于格物致知与科技的关系有点体会。

朱熹“格物”的范围很广，包含了对自然的研究。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在朱熹看来，“格物”包括研究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等自然界事物，“格物”就是“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道理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物，但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只能去“格物”。

朱熹的“格物”包括对自然界事物的研究。但有人会说儒家研究道德，朱熹除了研究道德又去研究自然界事物，是不是儒家正宗？儒家到底研不研究自然界的東西？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儒家喜欢研究自然界，因为儒家经典中也有许多有关日月星辰、山川地理、鸟兽草木方面的知识。《诗经》不是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吗？假如今天的老师能知道雎鸠是什么鸟，并且把那个鸟的标本搬来给你们上课，结果会怎样？“关关”是鸟的叫声，“在河之洲”，这个河是黄河还是长江，洲是河中的小岛，是哪一个岛？这些知识都是需要讲清楚的。可是，今天的老师没法这样讲。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很关注这些东西，对此很有研究。正是因为儒家经典中有这些东西，引起后人的关注和研究，从而有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且引领中国古代科技在宋代达到了最高峰。

据说孔子也喜欢讲天地日月星辰。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讲“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辰就是天的北极。孔子说，北极不会动，但星星绕着它转，这就是讲为政者要有德性。孔子为什么讲北极而不举其他例子？因为他很熟悉这个天象，而且孔子认为，道德与这个天象很相像。我想象他当时一定带领着学生在夜晚观看北辰，指着天的北面说，北辰就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会观察相当长的时间，看到了周围的星星绕着北辰慢慢地转。有没有这个事实？我想是存在的。今天可能没有人会这样通过观察北辰来讲“为政以德”。朱熹做过这样的事。他给弟子讲“为政以德”，大多时间在讲北辰到底在哪个位置，是指北极星还是北极星附近。为此，大家争吵不休，有的说是指北极星，有的说不是，最后有人说，朱熹家的楼上有一个浑天仪，可以用来观测，从而确定北辰在哪个位置。

朱熹家里居然有一个浑天仪，干什么用的？是用来观测天象的，还是用来讲儒家经典的？

朱熹还说：“至若万物之荣悴与夫动植大小，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皆所当理会。”自然界的动植物有兴有衰，有大有小，这个可以做什么用，那个可以做什么用，车为什么只在陆上走而不可在水上行，船为什么只在水上行而不可在陆上走，这些都有道理，都很重要，因为在朱熹看来，这些道理归根结底都是老天赋予的，与做人的道理是同一个道理。有人说，这些道理与做人没关系；但朱熹认为有关系。明代的王阳明也觉得没关系，他说，他早年听朱熹的，去看竹子，看了很多天，也没有看出做人的道理，结果还得了病。研究自然界事物能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这还可以讨论，但是，研究自然界事物，可以生发出自然科学，这是可以肯定的。

朱熹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饶，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一草一木有草木的道理，麻麦稻粱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土地是肥还是瘦，适合种什么庄稼，这些都有道理，都要去格，都要去研究。

问题是，朱熹为什么会自然界事物感兴趣而进行研究呢？

第一，这与他小时候的兴趣有关。他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出去玩，指着天说，这是天。朱熹居然问道：“天之外有什么东西？”朱熹想象天就像墙壁，当然要知道墙壁之外有什么东西。后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至晚年。宋代科技非常发达，人们除了读四书五经，还会对自然界事物感兴趣，这并不足为怪。朱熹一辈子非常喜欢研究天文，并且懂得很多，应当说，这跟他小时候的兴趣有关。

第二，与儒学所倡导的“博学于文”有关。《论语》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什么书都要读，《中庸》也说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在中国古代，人们还特别强调儒者“耻一物之不知”，以不知一事一物为羞耻。在古人心目中，儒者是无所不知的，什么都要懂，如果你不懂，那就应当感到羞耻。所以要博学，也包括要研究自然界的事物。

第三，注经的需要。儒家经典中有不少包含科技知识的著作，比如《尚书·禹贡》就讲了大禹治水之后，全国分为九个区域以及各个区域的自然、地理情况，包括水利工程、河流、土壤、植被以及贡品的进贡水路等，是地理学著作。《礼记·月令》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月份的不同礼仪作了详细的规定，告诉我们各个季节应该干哪些事。《周礼》有《考工记》，有人说《周礼》的《冬官》丢失了，汉代人就补了《考工记》，其中对各种手工技术规范作了详细的叙述，涉及马车及其各个部件的制作、青铜器物的原料配比和制作、皮革及其制品的制作工艺，等等。其实，在中国古代，儒学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切，不仅仅有道德，也包括科技、农业、医药学等等。朱熹既然要注经，就得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研究。

第四，朱熹研究自然界事物，还与他的为官有关。朱熹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做学问，很少当官，偶尔几次到外面当官，还非常认真。他写的多篇《劝农文》告诉老百姓如何深耕细耙、改良土壤，如何适时播种、不误农时，如何施肥、田间管理，如何兴修水利，如何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包含了丰富的农业科技知识。

作为儒家学者，朱熹不是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却有很多创新的东西。

朱熹的科学创新之一是他认为，地是“气”而悬空在宇宙中。在朱熹之前，中国天文学家赞同汉代张衡的说法，认为宇宙像个鸡蛋，地像蛋黄在中间；至于这个地为什么不会往下坠落，回答是，

这是由于宇宙中有水，这个地浮在水上。但问题是，这个地浮在水上，太阳西下时如何落到水中，早晨又如何从水升起？张衡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宋代人的思辨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朱熹认为，地不是浮在水上，而是悬空在宇宙中，因为宇宙中的“气”旋转得非常快，所以地就能悬浮在中间。这个解释，把地浮在水上的问题解决了，是朱熹在前人浑天说的基础上的创新，后来我们才接受了西方的太阳中心说。

朱熹的另一个科学创新是高山的形成。他认为，山之所以会有波浪的形状，原因在于，山原来在海底，由于海浪而形成了波浪的形状，后来从海底升起。当然，这里猜测的成分多一点，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地是从海底升上来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古代西方人看到很多山上有贝壳，认为这可能是洪水上涨，淹没了高山，后来洪水退去，在山上留下贝壳，这是受基督教大洪水之说影响。中国人则认为，山上有贝壳，是由于山从海底升起。朱熹说：“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又说：“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认为高山是从海底升起而成。现代科学认为，高山的形成在于地质板块的挤压，从板块的挤压中升起。比较接近朱熹的思想。当然，朱熹是依据《周易》的思想，以为能上就会下，有下就会有上，这也是猜想。但是这个猜想比西方所谓大洪水之说先进一些。所以，朱熹关于高山从海底升起而成的说法，受到科学史家们的重视。

朱熹讲“格物致知”，原本主要是就道德修养的工夫论而言，但是，“格物致知”又包括研究自然界的事物，所以朱熹对自然界的事物也有所研究，并有所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朱熹所讲的“格物致知”自明代随着西方科学的进入中国，而越来越多地与自然科学融合起来。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写了一本《农政全书》，并且还提出了“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他认为，传到中国的西方科学，凡是数理化，都可称为“格物穷理之学”。后来，西方的科学著作期刊，其中的science，被翻译成“格物”，“格物”就成了“科学”。这是朱熹的“格物”，包括格自然之物在内，而不是王阳明的“格物”，只是格我们的内心。直到1897年，康有为编著《日本书目志》，其中的“理学门”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最早使用了“科学”一词。我们今天讲在中国“科学”一词的来源，一定要追溯到朱熹所讲的“格物”。

## 五、结论

总之，朱熹的工夫论是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作为修身工夫的宗旨。我们经常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以“修身”为本，修身则以“诚意正心”为本，又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而“格物致知”以“涵养”为本，以“敬”为本，所以，既要讲“格物致知”又要讲“涵养”，尤为要讲“敬”。这就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就是朱熹工夫论的根本基点。

因此，修身应当从“格物致知”做起，尤其是要学习，通过学习，明白做人的道理。当然，学习而明理，不只是读书、不只是向他人请教，更多的是要在工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在做事中学习，无论做任何事，都要看作是学习而明理的过程。与此同时，学习应当认真，一心一意，不能心不在焉，在学习中磨练自己。这样，才能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一边磨练自己，提升自己，修养自己。

从朱熹的工夫论可以看出，学习可以非常广泛。朱熹讲“格物致知”，包括对自然界事物的研究，

也就是说，研究自然界事物应当成为我们为学修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要把今天称为自然科学的部分与人的修身分割开来。从《论语》看，孔子的确很少讲到自然界的事物，但从孔子教学所用的教材看，儒家“五经”包含了丰富的有关自然界事物的知识。我曾经多次建议有能耐的书院在讲授传统儒学时，讲一点自然知识，也可以教一点数学和英语，学数学、学英语需要有认真的态度，也能够磨练人的道德品质。尼山书院还讲“六艺”，教射箭。人们可能不能理解射箭跟道德修养有什么关系。射箭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专注，而且还要讲“反求诸己”，射不中靶子，找自己的问题，这是儒学的东西，是很好的修身方式。所以，修身从“格物致知”做起，从广泛的学习做起，通过认真地学习，明白做人的道理，来加深对儒学的体会，从而修养自己，这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 《闽学研究》稿约

《闽学研究》是经福建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的 CNQ 学术刊物，由福建师范大学主管主办。该刊以闽学为研究范围，以朱子学为核心内容，拟设朱子学、闽学源流、闽学名家、朱子遗迹、闽学新论、八闽人文、序跋与书评等栏目。该刊为季刊。兹向广大作者诚挚约稿，请投稿者遵守以下约定：

- 一，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投给该刊专用邮箱：minxqk@126.com。
- 二，来稿请署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学士学位可省略）及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
- 三，来稿应在正文前附论文摘要 200 字以内、关键词 3-8 个及中图分类号，文后附文章的英文题目、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
- 四，来稿如系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还应注明基金项目的具体名称和项目编号。
- 五，该刊参考文献采用页下注释体例，参考文献和注释均置于当页地脚（脚注），每页编序号，序号用①②③标示。
- 六，请勿一稿多投，来稿在 3 个月内未接用稿通知者可自行处理。
- 七，该刊对所有来稿概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发表将略致稿酬并赠当期刊物四册。

《闽学研究》编辑部

# 闽学刍议

苗圃

(三明学院闽学研究中心, 福建 三明 345000)

**摘要:** 学界对“闽学”一词的出现, 历来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认为出现于朱熹去世后不久; 有的认为最早出现于明代; 还有的认为出现于清代初期的康熙年间。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考察梳理, “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康熙年间, 其最早是作为一个缩写词出现, 而后逐渐在学者之间传播使用。直到清代乾嘉之际, 其内涵才逐步固定下来, 即主要指朱熹及其弟子的学说体系。

**关键词:** 闽学; 朱熹; 考证

何谓“闽学”? 这是闽学研究首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只有对“闽学”一词的出现及内涵进行历史性的文献梳理, 将“闽学”的传承与发展脉络厘清, 闽学研究才能更好地得以展开。

## 一、学界关于“闽学”一词出现的不同观点

关于“闽学”一词最早的出现, 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主流观点认为“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朱熹死后不久。据记载, 南宋末学者王应麟崇尚朱子学, 汤斌与其邻居, 朝夕议论濂洛关闽之异同”。<sup>①</sup>该说法来自于《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宋元学案》主要介绍了宋元时代的各学派源流及其思想。但该书并非成书于宋代。因为《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后开始撰写, 他本人完成的书稿并不多, 他主要搜集资料、创例发凡, 对书进行框架设计。他不久即去逝, 后由其子黄百家及全祖望、王梓材等人继续撰写, 历经 160 余年才最终完稿, 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才刻成醉经阁本, 但此版本毁于战火, 后又由王梓材重新校定付刻, 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成全书, 《宋元学案》遂得以流传。虽然该书附录记载“咸淳元年七月, 除著作郎时, 汤文清公为太常少卿, 与先生邻墙居, 朝夕讲道, 言关、洛、连、闽、江西之异同”<sup>②</sup>, 但这段文字并非宋代学者所写, 而是出于《宋元学案》编纂者之手。很显然“闽”在这里指称朱熹的学说思想。况且在此文字之后, 有全祖望(1705—1755)作的《宋王尚书画像记》, 曰: “先生之学, 私淑东莱, 而兼综建安、江右、永嘉之传。”<sup>③</sup>这条材料反而说明, 全祖望是用“建安”而不是用“闽”指代朱熹及其思想学说。因此, 不能用《宋元学案》中的上述文字来证明“闽学”这一词语出现于朱熹死后不久, 而只能说明清代前期学者对朱熹的学说开始用“闽”来代称。

也有学者认为, 直到明朝初年才出现闽学之称, 到“明初的宋濂, 才有了‘濂、洛、关、闽四

---

**基金项目:** 2018 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朱熹易学方法论研究》(FJ2018X006 西部扶持); 2018 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朱熹易学方法论研究》(JAS180456)。

**作者简介:** 苗圃, 男, 山西太原人, 三明学院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博士。

① 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第 2 页。

②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第四册 卷八十五《深宁学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年, 第 2866 页。

③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第四册卷八十五《深宁学案》, 第 2867 页。



夫子’的说法。另据《明史·解缙传》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建议修书，书的内容应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可见，从明代开始，已经普遍使用‘闽学’这个概念了。”<sup>①</sup>从上述宋濂和解缙的材料来看，可以明显看出宋用了“四夫子”，也就是说用“闽”来指称朱熹；而从解缙的上书内容来看，也只是用“闽”来代称朱熹。因此，二人的说法，也只是表明用“闽”代称朱熹个人，并未谈及“闽学”。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人陈鼎所著《东林列传》。在其《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写道：“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sup>②</sup>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闽之学”一词最早在明代才出现。传主高攀龙虽然为明代学者，但《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却是清康熙年间人。陈鼎出生于1650，卒年不详，康熙皇帝出生于1654年，陈鼎出生时间与康熙相差4岁，陈鼎生活于康熙朝，可见《东林列传》的成书时间，确定在康熙朝无疑。朱元璋下诏的史料出于康熙年间历史学家陈鼎，这说明是清初康熙朝的陈鼎而不是明朝的朱元璋将“朱子之学”与“闽之学”相关联。正如《明史》的正式修纂也从康熙年间开始，至乾隆朝才完成。

从上述几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并不能说明“闽学”一词在南宋或者明代出现并使用。而只能说明大约在清朝康熙年间，一些学者用“闽”这一地理称谓来指称朱熹，他们将“闽”与“濂、洛、关”并列，以分别指称朱熹、周敦颐、二程、张载，并且随着其著作的传播，而逐渐被人们所认可使用，并在这些地名后缀以“之学”二字，以分别指称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闽学”这个概念却并未形成。

## 二、“闽学”一词的文献考证

“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嘉靖年间杨应诏所著《闽学源流》。杨应诏，生卒年不详，他于嘉靖辛卯(1531)中举。在《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一《史部·传记类存目三》中有记载：“《闽学源流》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杨应诏撰。应诏，建安人，嘉靖辛卯举人。是书历载杨时以后诸儒，终于蔡清。各志其言行，详其传授，凡百九十五人。”<sup>③</sup>从该作的书名，可以看出，“闽学”在这里指从宋代的杨时到明代的蔡清等闽地学者的学术思想传承脉络体系。《闽学源流》是目前已知文献中，最早出现“闽学”一词的著作。

而《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史部中云：“《闽学源流》十六卷，明杨应诏撰，嘉靖四十三年建安杨氏华阳书院刻本，作《闽南道学源流》，版心书名简称《闽学源流》。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北图有缩印微胶卷。”<sup>④</sup>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杨应诏《闽学源流》的书名，是对《闽南道学源流》书名的简称，“闽学”是“闽南道学”的简称，“闽学”在明代并未形成固定的思想学说体系概念。

直到康熙年间，福建晋江人蒋垣在其所著《八闽理学源流》卷二中将“闽学”作为学术流派，并介绍其学说的传播过程，其说为：“朱门受业最多，最知名者黄干、李燔、张洽、李方子、黄颢、蔡沈、辅广……当时，杨、胡、林、朱、黄、蔡之学盛行于江之东南。至宁宗年间，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辅广、李燔之学授教生徒，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则闽学传之西蜀矣。理宗时，

① 卢美松：《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1页。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54页。

④ 杜泽逊：《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31页。

杨惟中建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又姚枢隐于苏门，以道学自任，刊《小学》《四书》及蔡氏《书传》、胡氏《春秋传》，而闽学至于河朔矣。此八闽道学留传之大概也。”<sup>①</sup>在蒋垣这段叙述中，“闽学”在这里是指朱熹及其弟子的学说。

张伯行担任福建巡抚期间（1707—1709），即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在福州修建东南学府鳌峰书院，并作《鳌峰书院记》，其记中说到：“闽中素号海滨邹鲁。盖自龟山载道而南，三传至考亭，而濂洛之学大著，其渊源上接洙泗，由宋迄今，闽士蔚兴，与中州埒。圣天子崇儒重道，于龟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御制扁联表扬祠宇。——不佞欲与士之贤而秀者，讲明濂洛关闽之学，以羽翼经传，既表章其遗书使行于世。”<sup>②</sup>张伯行的这段记中，将“濂”“洛”“关”“闽”并列，显然“闽之学”是指朱熹的学说思想体系。

从蒋垣和张伯行的著作来看，直到康熙年间，“闽学”或者“闽之学”才成为以朱熹为代表的学说思想体系，但在此期间，“闽学”一词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它或指朱熹的学说思想，也可包含其弟子的学说思想。而前文提到的《宋元学案》《明史》和《东林列传》，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均在康熙朝，由此，也可以证明“闽学”一词的出现最早应在康熙年间。

如果以“濂”指江西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以“洛”指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关”指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那为何以“闽”来指称朱熹的学说呢？而朱熹的祖籍是徽州，并非福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卷一中作了很好的说明：“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然朱子徽州人，属吴郡，乃独以闽称，何也？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sup>③</sup>蒋垣认为，用“闽”指称朱熹及其思想学说，其原因在于朱熹出生于尤溪，师承于闽中诸先贤学者，且一生多数时间在闽中为官、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因此，用“闽”这个地域空间的词来指称朱熹及其学说，也就顺其自然。

此后，“闽学”一词逐渐被用来指称朱熹及其学说思想体系，并在当时的学者间流传使用。但是这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康熙年间“闽学”一词虽然出现并开始加以使用，但是其内涵并非专指朱熹及其思想学说。康熙、雍正年间朝廷重用李光地，李光地是籍出闽地的理学名臣，著有《朱子全书》。李光地之孙李清馥著述颇丰，著有《闽中理学渊源考》《道南讲授》以及《闽学志略》等。其中的《闽学志略》一书，虽然出现“闽学”一词，但在此书中，“闽学”一词并非专指朱熹一脉及其学说。《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三《史部·传记类存目五》中就明确指出：“《闽学志略》十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国朝李清馥撰。清馥有《闽中理学渊源考》，已著录。是编取自唐迄明闽中之有关讲学者，人各系传，以志其略。盖仿汤斌《洛学编》之例，大旨以朱子为宗。朱子以后传其教者皆录之。朱子以前则自欧阳詹以后亦仿斌例为前编。然隐逸之流似不在讲学之例，收之稍滥。”<sup>④</sup>可见，该书中“闽学”一词指从唐代开始到明代之间在闽地进行学术研究及讲学的学者，虽然包括朱子及其弟子的学说，但并非单指朱子及其弟子学说。清代康雍乾之际，“闽学”一词已经被学界采用，但直到乾隆初期，李清馥的“闽学”一词，尚未纯粹用于指称朱子一脉的理学。

到了乾嘉年间，“闽学”一词的内涵就逐渐固定下来，用来专指朱子及其弟子一脉的学说体系。

① 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② [清]游光铎：《鳌峰书院志》，许维勤点校注释，福州：海风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③ 卢美松：《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1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570页。

这从乾嘉之际福州名士林希五(1744—1811)《古文初集》序中找到证据。林希五,字雨化,深受朱子学说的影响,一生服膺朱子之学,晚年自定诗文稿集,于嘉庆十一年(1806)请福州名士林芳春为其文集作序。其序曰:“一人倡之,必有从而和之者,庶闽学之复兴乎?近日士人以讲习为讳,想皆怨于南宋伪学、明代东林而然。然学之不讲,圣人以为忧,况吾辈乎?且所恶于讲习者,谓其伪也,岂可并其真者而不为乎?吾愿先生为吾闽倡,勿但学八家,而以子朱子为师念念为已。年弥高而德弥劭,他日大集留传,皆曰考亭之嫡派也,岂不美哉?”<sup>①</sup>序中提到“闽学之复兴乎”,可见,在嘉庆年间,“闽学”一词就逐渐固化为专指朱熹及其弟子的思想学说。

从以上文献来看,“闽学”这两个字大约在康熙年间逐步合成一个词,乾嘉之际逐渐被学者所用。此后,学界言“闽学”必关联着朱熹及其学说思想的传承。从以上对“闽学”一词的文献考察来看,“闽学”一词有两种内涵:一种是指朱熹的学说思想;另一种是指朱熹及其弟子的学说思想。

当代著名学者高令印在其著作《福建朱子学》中,对“闽学”的内涵作了较为权威的定义。他认为:“闽学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理学家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朱熹及其门人主要活动于福建,故其学说称为闽学。闽学是相对于其他地域性的学派如濂、洛、关、浙东、江西等学派而言的。闽学是理学,它发端于南宋初年福建理学家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等人,朱熹通过他们承接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庞大的完整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由此一般把朱熹作为闽学的创始者和领袖。由于闽学与朱子学都是以朱熹为首的学派,通常把闽学和朱子学等同起来。”<sup>②</sup>从高令印对“闽学”的定义,可以看到该定义不仅将朱熹及其弟子的学说思想纳入“闽学”,而且将其后理学家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也囊括在内,这一定义赋予了“闽学”更加开放的内涵。

从以上对“闽学”文献资料的梳理来看,从康熙朝到乾嘉之际直到当代学者所指的“闽学”,其内涵大致有三:一是指朱熹的学说思想;二是指朱熹及弟子的学说思想;三是指朱熹及其弟子以及传承和发展朱子学的理学家的学说思想。

如今,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早已不仅仅局限于闽地,其传播与研究已经面向全国甚至全球,未来“闽学”学说体系的内容还会不断丰富,唯有如此,“闽学”的学术研究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闽学”的学统脉络才能得到传承,并历久而弥新。

<sup>①</sup>《林雨化诗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sup>②</sup>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

# 蔡献臣生平事迹与作品系年

王石堆 陈庆元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 凡例

- 一、本文对蔡献臣的生平事迹及作品进行系年。
- 一、蔡献臣是理学家, 主王阳明“致良知”说, 凡涉及理学处, 稍加说明。
- 一、与蔡献臣生平活动相关的亲友附带及之, 重点依次是: 家族成员、姻亲、同年友、本邑本府友人、闽南其他友人、同官。
- 一、姻亲及友人, 略交代里籍, 科第职官。凡福建籍, 均省“福建”二字。
- 一、《清白堂稿》卷十一有“四六启”一百余篇, 送往迎来官场应酬色彩明显, 除少数与乡人交集之作, 其余概不列入。代他人所作, 一般也不列入。
- 一、为省篇幅, 本文不作详细考证; 书证尽量减少。将来另撰《蔡献臣年谱新编》再行补缀。

## 明世宗朱厚熹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1563) 一岁

- 二月, 十一日生。同安县浯洲 (今金门县) 平林 (琼林) 蔡氏十六世。
- 是岁, 王氏姑 (1525-1597) 三十九岁。
- 是岁, 王世贞三十八岁。世贞 (1526-1590), 字元美, 号凤洲, 太仓 (今属江苏) 人,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 是岁, 父蔡贵易二十六岁。贵易 (1538-1597), 字尔通, 号肖兼。金门琼林蔡十五世。隆庆二年 (1568) 进士, 官至贵州按察司副使、督学。
- 是岁, 池浴德二十五岁, 浴德 (1539-1617), 字仕爵, 号明洲, 同安县嘉禾屿 (今厦门本岛) 人。
- 是岁, 母黄氏 (1541-1628) 二十三岁。
- 是岁, 柯凤翔二十三岁。凤翔 (1542-1619), 字志德, 号桐冈, 号三槐, 同安从顺里人。万历十七年 (1589) 进士, 官至两浙都转运使。
- 是岁, 郭日烜十九岁。日烜 (1545-1592), 字宗实, 别号旭东, 同安人。万历十七年 (1589) 进士, 官至安宁州知州。
- 是岁, 李维楨十七岁。维楨 (1547-1626), 字本宁, 号翼轩, 京山 (今属湖北) 人。隆庆二年 (1568) 进士, 选翰林庶吉士, 除编修。官至尚书。
- 是岁, 李光缙十五岁。光缙 (1549-1623), 字守谦, 号衷一, 晋江人。万历十三年 (1585) 解元。

项目基金: 福建省社科规划基础研究后期资助项目《金门诗人年谱四种》(FJ2018JHQZ001)

作者简介: 王石堆 (台籍), 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2 级博士生。

陈庆元, 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是岁，蔡懋贤十四岁。懋贤（1550—1591），字德甫，号恂所，同安县浯洲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二甲第五人。官至刑部主事。

是岁，汤显祖十四岁。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遂昌知县。

是岁，蔡守愚十二岁。守愚（1552—1621），字发吾，献臣族兄，同安人。万历十四年（1586）成进士，官至云南左布政使。

是岁，王道显九岁。道显（1550—1616），字瞻明，同安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献臣表兄。

是岁，何乔远六岁。乔远（1558—1631）<sup>①</sup>，字稚孝，号匪莪，何炯子，晋江人。

是岁，蒋孟育六岁。蒋孟育（1558—1619），字道力，同安县浯洲人，万历十七年（1589）以龙溪籍中进士。

是岁，叶向高四岁。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三次入阁为首辅。

是岁，潘洙二岁。洙（1562—1620），字士鼎，号鹏江，晋江人。万历十六年（1588）解元，次年成进士。

是岁，蔡鼎臣生。鼎臣，初名献襄（1563—1625）<sup>②</sup>，字体谟，号弼台。献臣父贵易仲兄贵守子，献臣同祖弟。

是岁，池显京生。显京（1563—？），字致夫，号念苍，浴德嫡配傅氏所生。

###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 二岁

是岁，父蔡贵易、岳丈池浴德乡试中式。此前，贵易名其斋曰“肖兼”。

是岁，长侄蔡绍芳生。绍芳（1564—？），字隽卿，号桂斋。蔡贵易长子蔡献鲁，字体道，号恪庵。献鲁有二子，长为绍芳。

###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 三岁

是岁，池浴德成进士。

是岁，陈基虞生。基虞（1565—1642），字志华，号宾门，同安县浯洲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

###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 四岁

是岁，次侄蔡绍彭生。绍彭（1566—1611），字信卿，号钟兆。蔡献鲁次子。

是岁，苏茂相生。茂相（1566—1630），字弘家，号石水，茂杓兄，晋江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① 明何乔远卒于崇祯四年辛未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1632年2月10日；按传统纪年，辛未为1631年。

② 明蔡献臣《太学弼台弟暨配贞勤周孺人墓志铭》：“而余生先一月，又各只身如同胞然……寿仅六十三耳。”（《清白堂稿》卷十七，明崇祯刻本），蔡献臣与鼎臣同年生，献臣月份大；鼎臣卒年六十三，时天启五年（1625）。

### 明穆宗朱载屋隆庆元年丁卯（1567） 五岁

是岁或次岁，以中表弟谒表兄王道显妇黄氏。

是岁，张廷拱生。廷拱（1567-1633），字尚宰，号辅吾，同安县大嶝岛（1915年金门建县，属金门县；今属厦门市翔安区）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大同巡抚。献臣四子蔡猷（原名孚光）娶张廷拱女为妇。

### 隆庆二年戊辰（1568） 六岁

是岁，蔡贵易成进士，授江都知县。贵易母卒，抚榱归葬，故未之任。

是岁，李文简成进士。

按：李文简，字志可，号质所，同安人。官至南户部山西司郎中。

又按：戊辰科同安县成进士者十八人：黄凤翔（第二人）、李熙、王任重、李廷益、杨道会、萧腾凤、王用汲、泰舜翰、颜容舒、史朝铉、黄一龙、黄德洋、洪邦光、李文简、叶明光、蔡贵易、庄有临、刘应望。

### 隆庆四年己巳（1569） 七岁

是岁，丁启浚生。启浚（1569-1636），字哲初，一字亨文，日造子，德化籍，晋江人。启浚母，王慎中女。献臣三子蔡学光妇翁。

### 隆庆四年庚午（1570） 八岁

是岁或稍晚，始为制举文。

是岁，父服阙，补崇德知县。

是岁，许獬生。獬（1570-1606），初名行周，改名獬，字子逊，人称“钟斗先生”，同安县浯洲人。

### 隆庆五年辛未（1571） 九岁

是岁，服除，蔡贵易补浙江崇德县知县。

###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元年癸酉（1573） 十一岁

是岁，癸酉科乡试解元苏浚；郭日烜成举人。

是岁，张燮生。燮（1573-1640），字绍和，于垒父，龙溪县（今漳州）人。

### 万历二年甲戌（1574） 十二岁

是岁，祖父蔡标卒。标，字宗德，又字懋修，号兼峰，琼林蔡十四世。

是岁，王志道生。志道（1574-1646），字而宏，号东里，志逵、志远弟，志超兄，漳浦人。

### 万历四年丙子（1576） 十四岁

是岁，父为崇德知县。郭日烜公车过之，献臣以童子侍坐。

是岁，父贵易分校浙闾，献臣识林祖述于弱冠；祖述过语溪，因得相识。

是岁，蔡复一生。复一（1576-1625），字敬夫，一字元履，同安县浯洲蔡厝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二十三年（1595）进士。除刑部主事，官至川贵总督，兵部右侍郎。

是岁，何乔远成举人。

### 万历五年丁丑（1577） 十五岁

是岁，随父宦于金陵。前此，族兄蔡守愚为诸生，蔡贵易奇之，延至金陵，与献臣相切劘。

是岁前后，与浯洲阳翟陈志华游，因获交于志华父陈廷佐，为忘年。

### 万历七年己卯（1579） 十七岁

是岁前后，一再侍晋江苏浚，必以所学、所疑质，浚曰：“孺子善问，可教也。”

### 万历八年庚辰（1580） 十八岁

是岁，随从父贵易宦南都，得侍同邑前辈李文简先生。

### 万历九年辛巳（1581） 十九岁

是岁，弃《易经》制义，参诸家之义为《诗经》制义文。

是岁，别晋江何乔远；一别十年之久。

按：参见万历十八年（1590）。

是岁，在京完婚，配为池浴德女。

### 万历十年壬午（1582） 二十岁

是岁，归自金陵。

是岁，道试首拔。

是岁，父蔡贵易为宁波知府。

是岁，王志远成举人。

### 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 二十一岁

是岁，从父蔡贵易游宦宁波，贵易为购诸大家训诂制义，延王朝英与献臣切劘《诗经》制义文。

是岁，黄一龙为癸未科乡试第八人。

### 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 二十二岁

是岁，陪侍父贵易在宁波，南归，途中作《建溪夜泊有怀》。经仙游，游九鲤湖。归家，病症，

蔓延几一月。

按：此诗为《清白堂稿》系年最早之诗，五律。

是岁，作《与王瞻明司理长兄》。

按：王瞻明，即王道显。已见。

是岁，袁茂英寄书献臣，献臣作《与袁文海行人》。

按：袁文海，即袁茂英。茂英，字文海，浙江慈溪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布政使。

是岁，庶祖母杨氏卒。

按：杨氏（1506-1584），蔡标妾。

### 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 二十三岁

是岁，结识晋江林学曾，因知其人其文。

是岁，长子蔡谦光生。谦光（1585-1636），字哀卿，号六吉。

是岁，蔡守愚、蔡懋贤成举人。

### 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 二十四岁

是岁，蔡守愚成进士，谒选为南仪制司主事。

是岁，林汝韶成进士。

### 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 二十五岁

是岁，作《里妇词》。

按：此诗是集中五古最早之诗。七古系年最早为《送袁君学大行册封周藩便道归越己丑燕都》，此诗之前有《秋夜歌》《长干行》二诗，疑此二诗作于己丑之前。

###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二十六岁

是岁，在南京，居中馆驿，蔡贵易延海宁陈愈嘉授经，时同业者，有韩城忽子春、子秋，及兰州段钦、段镗兄弟。先生颇刮目献臣。

是岁，戊子科乡试中式，第二人。解元为晋江潘洙；丁启浚成举人。是科涪洲中举者八人：蔡献臣、陈基虞、蒋孟育、赵维藩、黄华秀、黄华端、张继贵、吕大楠。称“八鲤渡江”。

按：《祭清远李太师母文》：“戊子之役，复为广文先生所摈去，吾师拔之弃置之中，而举之贤书之右。”（《清白堂稿》卷十六）

是岁，作《题西山岩》。

是岁，将上公车，谒叔祖蔡乔，乔卧床褥曰：“孺子有立也！”

是岁，结识王世贞长子王士骐。

是岁，池显方（1588-?）生。显方，字直夫，号玉屏子，浴德子，显京弟。卒于明清鼎革之后。

###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 二十七岁

是岁，成进士，观政秩宗，选南京刑部主事。作《赋得谒帝承明庐》《同卫简吾严一醇安我素饮



卓月波第醉余步月长安市》《金台答陆宪峰令尹己丑》。己丑科福建三十一人，浯洲人五人：蔡懋贤（二甲第五名）、蔡献臣（二甲第六名）、陈基虞、蒋孟育（入龙溪籍）、黄华秀（入南安籍）。称“五桂联芳”。

按：己丑科泉、漳二十三人：诸葛表（以下晋江）、金时舒、邓镛、庄懋华、陈庭诗、潘洙、丁日近、黄华秀（以下南安）、傅宾凤、李灏（安溪）、蔡懋贤（以下同安）、蔡献臣、郭日烜、柯凤翔、陈基虞、曾伟芳（惠安）、蒋孟育（龙溪）、王志远（以下漳浦）、蔡杲、黄季成、黄一龙（以下海澄）、温如璋。

是岁，作《送袁君学大行册封周藩便道归越己丑燕都》《题椿萱并茂册赠阎比部父母》。

是岁，作《拟与李本宁大参》《谢李本宁大参翰贶之及》。

按：李本宁，即李维楨。已见。

是岁，作《送周中岳年兄请告还楚》。

按：周中岳，即周家栋。家栋，黄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

是岁，作《恳乞励精图治以光圣德以释群疑事疏》，署名“新选南京刑部主事蔡献臣”。神宗多年不上朝，此疏以为“皇上一日未出，疑未歇也”（《清白堂稿》卷一），又作《拟南京九卿恭候圣躬万福因轸时艰输忠悃疏》。

是岁，受知于太仓王世贞凤洲先生。作《上王凤洲司寇》，略云：“献臣么么无似，自韶年即知世间有先生，鸿裁巨笔，为学士斗山。总角稍得读所为文，心艳而好之，惟恐不得当也。去岁，不自意附长公骥尾称昆弟，又得备员属吏事先生署中，先生奖借开诱，溢于分涯，十余年所企慕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清白堂稿》卷九）

是岁，父崇德知县任满。

是岁，叔祖蔡乔卒。

按：蔡乔（1507-1589），字宗达，以字行，晚号眉山，献臣祖标之弟。少受举子业，不得志于有司。

## 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 二十八岁

五月，五日，在南都泛舟，作《庚寅五日同诸同年泛舟》。

夏，值署，作《夏值白云署》。

九月，作《早秋入直书怀》；九日，游牛首山。作《九月游牛二首》。

是岁，王世贞予告，献臣为作《送王凤洲司寇予告二首》。

是岁，作《送郭希宇之南银台》。

按：郭希宇，即郭惟贤。惟贤，号希宇，晋江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户部左侍御。

是岁，作《送蔡涓泉司务奏最入都》。

按：蔡涓泉，即蔡如川，号涓泉，晋江人，举人，官至寻甸知府。

是岁，作《寄酬何稚孝》，略云：“诵君诗句感君谊，契阔十年意岂二？”（《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送郭希宇符丞之南银台》。

按：郭希宇，即郭惟贤。已见。

是岁，作《别潘士鼎时以校艺入南》。

按：潘士鼎，即潘洙。已见。

是岁，作《送陈次岩蜀皋》。

按：陈次岩，即陈勛。勛，字世勉，号次岩，宁德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是岁，作《周中岳年兄读书习射诗以问之》。

按：周中岳，即周家栋。已见。

是岁，作《〈诗经制义〉自叙》，略云：“庚寅，案牍之暇，检篋中草得六十八首，不忍弃，因梓之。”

是岁，作《〈南都已丑会例〉序》。

是岁，作《送孙司狱之灵山所幕序》。

按：孙司狱，即孙一谦。一谦，连江人。万历十六年（1588）任南刑部司狱。

是岁，作《祭清远李太师母文》。

是岁，王世贞卒。

## 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 二十九岁

三月，上巳，集陈文烛衙，作《辛上巳集陈五岳廷尉衙》。

按：陈五岳，即陈文烛，文烛（1525-？），字玉叔，号五岳山人。沔阳（今属湖北）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卿。

五月，作《五日送王中溪守顺德》。

是岁，作《早起恤囚》。

是岁，在南都，作《南都同年会祭王凤洲大司寇文》。略云：“唐宋以来，颓澜谁起？我明启运，淳发何李。迄公兴嗣，鹰扬虎视。上窥坟典，下步风骚。先秦西京，错落楮毫。雌黄群品，旗鼓时髦。”（《清白堂稿》卷十六）又作《南京九卿会祭王凤洲文代》。

按：王凤洲，即王世贞。已见。

是岁，汤显祖因谏遭贬，献臣作《送汤若士祠部谪谪》，略云：“峥嵘何李后，谁为出群才。夫君躯干小，意气何崔嵬。”（《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薛道彦入楚，为作《送薛道誉提学入楚》。

按：薛士彦，字道誉，号钦宇，云霄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督学秦楚，历任广西、云南左右布政使。

是岁，作《送张孺愿太学还四明》。

按：张孺愿，即张邦侗。邦侗，字孺愿，号越门，时彻（1500-1577）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以父荫官光禄署丞。

是岁，作《送董仲恭博士守钦州》。

按：董仲恭，即董廷钦。廷钦，字仲恭，号海门，闽县（今福州）人。万历七年（1579）举人，时为南京同子博士，官至钦州知州。

是岁，作《读〈要语·密箴〉序》。

按：《要语》，薛瑄撰；《密箴》，蔡清撰。薛瑄（1389-1364），字德温，号敬瑄，谥文清。河津（今属山西）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官至礼部侍郎，翰林学士。蔡清（1453-1508），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人。谥文庄。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

是岁，作《〈南都掾史同试录〉后序》。

按：春试，简二十有七人。

是岁，作《上杨复所老师》。

按：杨复所，即杨起元。起元（1544-1599），字贞复，号复所，归善（今属广东）人。隆庆元年（1567）解元，万历五年（1577）进士，选庶吉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是岁，在金陵，以所刻三册赠李光缙，并作《与李衷一解元》。

是岁，作《与祝石林休宁年兄》《又与祝石林年兄》，倡导“先明诸心而后知所往之说”（《清白堂稿》卷九）。

按：祝石林，即祝世禄。世禄，字延之，号无功，又号石林，江西德兴（或作鄱阳）人。万历十七年（1598）进士，授休宁知县。

是岁，作《辛卯祭胡寅宾知县文代家大人》。

是岁，黄一龙卒。一龙（?-1591），字鳞伯，文豪子，海澄县（今龙海市海澄镇）人。

##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 三十岁

是岁，转南兵部车驾职方郎中。以思亲请告，途中转南吏文选郎。

冬，父蔡贵易以黔藩入贺，时献臣以南铨告归，于浙江崇德不期而遇。贵易于金陵题“谨佩师训，渐去童心”诫蔡谦光，献臣因作《金陵诫子》。

是岁，放归调摄，作《与周中岳年兄》《答倪的山老师》《请急上孙立峰太宰》《上朱淡庵中丞》《与戴今梁侍御》《与蒋兰居廷评》。

按：孙立峰，即孙鑰。鑰（1525-1594），字文中，号立峰，浙江余姚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吏部尚书。

又按：朱淡庵，即朱天球。天球（1528-1610），字君玉，号淡庵，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

又按：戴今梁，即戴燝。燝（1561-1627），又名今梁，字享融，长泰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

又按：蒋兰居，即蒋时銮。时銮（1548-?），字德夫，号兰居，漳平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文选郎郎中。

是岁，游南京燕子矶，作《燕矶观鱼》。

是岁，何乔远调仪曹，为作《喜何稚孝调仪曹却寄》。

是岁，作《送王麟泉司寇予告还闽》。

按：王麟泉，即王用汲。用汲（1528-1593），字明受，号麟泉，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谥恭质。

是岁，作《又上杨复所老师》。

是岁，作《同乡祭祠部蔡调吾公》。

按：蔡调吾，即蔡时鼎。时鼎（1550-1592），字台辅，号调吾，漳浦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

是岁，作《祭伯母许太安人文》。

按：许太安人（1515-1592），蔡希旦妇，蔡守愚母。

###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 三十一岁

是岁，作《溪行》《早发崱峡》。

是岁，作《外曾祖梧圃黄公暨配蔡孺人墓志铭》。

按：梧圃黄公，即黄江。江（1489-1562），同安浯洲人。嘉靖三十年（1551）拔贡，官教谕。

是岁，代父蔡贵易作《赠主事巾溪公暨配许安人墓志铭代家大人》。

按：巾溪公，即蔡希旦。希旦（1511-1560），字可久，号巾溪，守愚父同安浯洲人。以守愚贵，封四川授察使。

是岁，代父蔡贵易作《祭大司寇陈我渡公文代家大人》。

按：陈我渡，即陈道基。道基（1519-1593），字以忠，号我渡，同安人移居晋江。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是岁，作《祭王表嫂陈氏文》。

按：陈氏（1554-1593），献臣表兄王道照之妇。

###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 三十二岁

是岁，作《送王瞻明少参表兄入滇》二首。

按：王瞻明，即王道显。已见。

是岁，作《洪芳洲侍郎予祭葬》，题下注：“洪以冤死，子照磨君为之请。”

按：洪芳洲，即洪朝选。朝选（1516-1582），字舜臣，号芳洲，同安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被诬至死。献臣另作有《与王带如提学请洪司寇乡贤公启》。

是岁，作《蔡童子畅过予山园论文口占为赠》。

是岁，作《贺王师斋封君举曾孙序》。

按：王师斋，即王三锡。三锡（1521-?），道显父，献臣姑父，同安大嶝人。以子贵，封云南布政使司右参议。

是岁，作《送曾邑簿还泰和序》。

按：曾邑簿，即曾一瓿。一瓿，泰和（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九年（1591）任同安县主簿。

是岁，作《与邹南皋南比部书一》。

按：邹南皋，即邹元标。元标（1555-1624），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

是岁，作《叔祖眉山公暨配陈氏墓志铭》。

按：叔祖眉山公，即蔡乔。已见。

是岁，作《会祭洪宾吾观察使》。

按：洪宾吾，即洪邦光。邦光（?-1594），字世龙，号宾吾，同安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贵州按察使。

是岁，张燮、蔡复一、徐銮成举人。

###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 三十三岁

秋，谒补吏部文选司郎中。

是岁，过山东汶上，作《汶上路凤冈太守招饮见其冢孙赋谢》。

是岁，王华明抱所作制义至延津（今南平市延平区）求序，为作《〈古谭八面锋稿〉序》。

按：王华明，将乐县人。诸生。

是岁，邹元标赠《纪善新编》，献臣作《与邹南皋书二》。

是岁，蔡复一、曹学佺、徐銮成进士。

是岁，作《与何匪莪二》。

是岁，须次都下待选五十余日，作《寄汤若士遂昌》，言汤显祖为遂昌知县五年如一日，循良之政，为两浙之冠。

是岁，作《与周海门》。

按：周海门，即周汝登。汝登（1547-1629），字继元，号海门，浙江嵊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工部尚书。王阳明再传弟子。

### 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 三十四岁

是岁，任吏部文选司郎中。

八月，作《祭同年傅太行验封文》。

按：傅长儒（？-1595），号太行。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南吏部郎。

是岁，过山东汶上，作《重过汶上路太守》。

秋，作《秋夕同苏弘家户部王仲绍茂才集何稚孝仪部宅》。

是岁，作《南都纪游》。

是岁，作《题〈旻质甫山人诗草〉》。

按：旻，字质甫，松陵人。

是岁，黄景昉生。景昉（1596-1662），字太稚，一字可远，号东厓，晋江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曾为蔡谦光《干云斋诗初集》作序。

###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 三十五岁

正月，二十六日，父蔡贵易卒。

是岁，三子蔡学光生。学光（1597-？），字敬卿，号壮如。

是岁，作《上杨复所少宗伯座师》。

是岁，作《送周继元验封观察粤海》《周海门司封擢宪赠行序》。

按：周继元，即周汝登。已见。

是岁，作《征兵得尘字》，略云：“端居祇切忧时志，欲解吴钩赠所亲。”（《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是岁，作《送郭邑薄士瀛之德藩》。

按：郭士瀛，安徽桐城人。万历中为同安主簿。

是岁，作《答郭希宇开府》。

按：郭希宇，即郭惟贤。已见。

是岁，作《答蔡元履比部》，请蔡复一留心性命之学。

是岁，许獬、张廷拱成举人。

是岁，王氏姑（1525-1597）卒，为作《祭姑端懿王恭人文》。

按：王恭人，献臣父贵易姐，王三锡妇，献臣之姑、道显、道照之母。

##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 三十六岁

是岁，胡凤宾吊赴蔡贵易，为作《崇德胡凤宾上舍赴吊先观察公赋谢》。

是岁，岳翁池浴德年六十，作《奉常池明洲妇翁六帙寿序》。

是岁，作《挽王鸣环表侄诗有序》。

按：王鸣环，外兄王当世子，同安人。初，当世为鸣环约婚姻献臣女。

是岁，作《答汪云阳郡伯论上广平仓》。

按：汪云阳，即道亨。道亨，字云阳，怀宁（今属安徽）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时为泉州知府，官至宣府巡抚。

是岁，作《寿邑侯新安洪含初侍冬初度》《与洪含初令君论许家离婚书》《又答洪含初令君》《与洪家劝出许廷基书》。

按：洪含初，即洪世俊。世俊，字用章，号含初，歙县（今属安徽）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时为同安知县。

又按：此三篇书牋讨论民间嫁娶律令。

是岁，黄华秀卒。作《祭同年黄居约侍御文》。

按：黄居约，即黄华秀。华秀（？-1598），字居约，号桂斋，祖籍同安县浯洲西园。西园黄氏迁南安县石井，至华秀已四世。

是岁，作《祭王日近表兄文》。

按：王日近，即王道照。道照（1552-1598），字恒甫，号日近，三锡季子，道显季弟，献臣表兄，同安人。与兄道显称“王氏二难”。

## 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 三十七岁

十二月，初九日，合葬父与叶安人（1642-1660）。

是岁，为张廷拱作《题张尚宰〈就正草〉》。

是岁，为张廷拱父张南阳作《贺张南阳荣寿序》。

是岁，作《贺谢淦川邑簿台奖序》。

按：谢淦川，即谢与源。与源，号金川。泗州（今江苏泗县带）人。贡生，时为同安县主簿。

是岁，作《答骆台卿》。

按：骆台卿，即骆日升（1573-1623），字启新，号台卿，惠安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副使。

是岁，作《答沈泰垣提学》。

按：沈泰垣，即沈傲焜。傲焜（1554-1631），字叔永，号泰垣，嘉定（今属上海）人。时为福

建提学，官至工部尚书。

是岁，作《祭苏新郭秀才》。

按：苏新郭，即苏震亨。已见。

是岁，所作制义集《解颐草》刻于南京坊间。

按：计六十八篇。诸生时作。

##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 三十八岁

是岁，营造狮山先莹，作《狮山先莹封石告成有作》二首其二：“遗言犹在耳，莹对碧浯间。试上新阡望，戴洋松色来。”（《清白堂稿》卷下）

夏，服阙，补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携长子谦光北上，经古田县水口水驿，遇雨，作《阻雨晚抵水口水驿》：“村酒劳役夫，惭非济川质。世途良坎坷，何如扫一室。”（《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奉诏陈情恳乞天恩复父职以广皇仁疏》，题下署名“礼部主客司郎中蔡献臣”。

是岁，蔡复一入都，献臣作《喜蔡敬夫比部入都兼读新诗》。

是岁，作《庚子答铨问八条》。

按：八条细目：正人不可不亟录；方面不可不内转；部属不可不精拔；推知不可不部转；林泉不可不起用；拟部不可不填补；兼衔不可不痛割；地方不可不体悉。

是岁，金陵坊间刊行蔡献臣《解颐草》，凡六十八首，皆诸生时作。

是岁，作《庚子冬廷杖纪事》。

是岁，长子蔡谦光成婚，妇翁为漳浦林汝韶。汝韶（？-1607），字君纶，号光璧，士章次子，漳浦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大同巡抚。

是岁，卢若腾生。若腾（1600-1664），字闲之，一字海韵（海运），号牧州，同安县浯洲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兵部主事。

##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 三十九岁

是岁，作《送徐奕开进士转饷云中便道省觐》。

按：徐奕开，即徐缙芳。缙芳，字奕开，晋江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是岁，作《送曹能始大理还金陵》。

按：曹能始，即曹学佺。学佺（1575-1646）<sup>①</sup>，字能始，一字尊生、雁泽，侯官（今福州）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右参议。

是岁，作《送何公露观察浙江并期长君延陵恩赦》。

按：何公露，即何湛之。湛之，字公露，号矩所，江宁（今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四川参议。

是岁，作《别王宪葵光禄王为仪郎疏请册立礼成晋卿勋寺告归》。

按：王宪葵，即王纪。纪，字惟理，号宪葵，山西芮城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是岁，作《议处贡夷利玛窦疏万历》。

<sup>①</sup> 曹学佺生于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公历已入1575年。

是岁，作《题年友林志唯兄〈警语〉》。

按：林志唯，即林学曾。学曾（1547-1634），字志唯，号省庵。晋江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户部尚书。

又按：《警语》，即《史评警语》。

是岁，作《查革通事孙光范等公移》《查革通事张可扬公移》。

是岁，作《与邹南皋书三》。

是岁，作《答叶台山少宗伯书》。

是岁，作《答鄞杨明叔茂才》，论制义平与奇。

按：杨明叔，鄞（今浙江宁波）人。诸生。

是岁，作《会奠赵澱阳首相文》。

按：赵澱阳，即赵志皋。志皋（1523-1601），字汝边，号澱阳，浙江兰溪人。隆庆二年（1668）廷试第三人。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居首辅。

是岁，作《会祭大宗伯林璧东姻翁文》。

按：林璧东，即林士章。已见。

是岁，作《乡同年会奠邓同卿纯吾老师文》。

按：邓同卿纯吾，即邓鍊。鍊（1552-1599），字文纯，号纯吾，江西南城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福建按察使，献臣为所取士。官至太仆卿。

是岁，作《礼寅会奠梅夫人徐氏文》。

是岁，许獬为辛丑科会元，殿试二甲第一名。张廷拱成进士。

## 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 四十岁

是岁，转仪制郎。

是岁，请罢矿税，作《拟九卿请信敕谕疏》。

是岁，作《拟九卿请信敕谕疏》《拟礼部论黄河水竭疏》《题催回夷玉价疏》《省直历满应试通例疏》《拟覆习仪班次疏呈大宗伯冯》《又拟覆习仪班次疏》《循职掌除旧例恳乞圣明特赐详夺以重明旨以存祖制疏》《礼官守礼蒙诟乞赐罢斥以谢言路疏》。

是岁，作《石田说》。

是岁，作《复议公主子孙轮荫疏》《覆孝女张寿姑割股旌奖疏》《覆南京礼部考选局儒疏》《覆晋府恳恩恤寡以全孀节疏》。

是岁，作《壬寅河工钱粮议》《壬寅朝班纪事》。

是岁，作《又移鸿胪寺主簿厅论张可扬公移》《议覆邓范二通事案呈》《行户部催赏贡夷钞锭咨》《回复内承运库项物不堪公移》《准补恩贡通行》《广灵王请封长孙议呈右堂郭》。

是岁，作《与黄钟梅开府书》《与黄钟梅宫傅书》。

按：黄钟梅，即黄克缵。克缵（1543-1628），字绍夫，号钟梅，晋江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此时为山东布政使，官至工部尚书。

是岁，与同年马经纶论李贽，欲救无门，作《答马诚所侍御同年》。

按：马诚所，即马经纶。经纶（1562-1605），号诚所，通州（今北京通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



进士。官至监察御使。

又按：是岁李贽被逮。

是岁，作《与陈毓台右都》。

按：陈毓台，即陈用宾。用宾（1550-1617），字道亨，号毓台，晋江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云南巡抚。

##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 四十一岁

是岁，作《执奏崇世子顶补额妾疏》《覆朝鲜请封世子疏四》。

是岁，作《覆鲁监请给关防疏》《会覆生员凌辱郡守等官疏》《催三省考官疏六》。

是岁，作《拟部院请勘楚藩交讦疏呈右堂郭》《拟部院科会覆楚藩交讦疏呈右堂郭》《拟部院会覆楚府遣官疏呈左堂李右堂郭》。

按：右堂郭，即郭正域。正域（1554-1612），字美命，江夏（今武汉）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时为礼部右侍郎，因“勘楚案”等遭弹劾，罢官。

是岁，作《执奏襄府为弟请封疏》《覆代府广灵王改封长孙疏》《覆淮府俯赐母封疏》。

是岁，作《襄府请封说堂帖》《名封循环簿移内阁》《管理奏乞代行礼仪咨都察院》。

是岁，作《烧毁四书书经删正等书札各提学》。

是岁，作《申饬宗室奏请期限札付》。

是岁，读叶向高《苍霞草集》，作《答叶台山少宰书》，略云：“读《苍霞集》，纵横变化，无不如意，真子长授简、子瞻操觚，无论压倒一世，即郭宗伯公最号沉劲有古学，然终觉有板意在，读者以为当让一筹矣，不肖何敢言哉？”（《清白堂稿》卷九）

是岁，作《答吴彻如比部》，以为士风之坏，其根源在提学官岁考不严。

按：吴彻如，即吴正志，宜兴（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光禄寺丞。

是岁，任职已四载，久有去志，作《上李光左宗伯揭帖》。

是岁，作《礼部公祭冯琢庵大宗伯文》。

按：冯琢庵，即冯琦。琦（1588-1603），字用韞，号胸南，又号琢庵。山东青州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是岁，姑父王三锡卒。是岁夏三锡曾贻书献臣。

##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 四十二岁

是岁，作《选娶内助妾媵议呈左宗伯李》《万寿贺礼议上首相沈》。

是岁，作《清理宗室设官议》《遵旨查拟宗正疏》《执奏秦藩违例请封疏》。

是岁，作《拟驸马习礼已满疏呈左堂李》。

是岁，乞养老母去职出都。出都前作《祖妾孤贞难泯微臣遵例直陈乞赐旌表以裨风化疏》，略云：“杨氏系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故民杨礼室女，嘉靖二十二年，氏年十八，聘归臣故祖台州府通判蔡宗德为妾，善事臣曾祖、曾祖母，以孝谨称。”（《清白堂稿》卷二）旌表庶祖母杨氏。

按：《旌表庶祖妾贞节杨氏传》：“甲辰，献臣以仪郎擢备兵常镇，将出都，特上祖妾孤贞难泯一疏，事下按台勘覆具奏，乃得照例旌表贞节云。”（《清白堂稿》卷十三）

是岁，作《答方岱阳按台甲辰》，以为祖妾杨氏旌表赐匾，岱阳有力焉。

是岁，过黄汝贞，作《夜饮黄贞父令君赋谢》。

按：黄贞父，即黄汝亨。汝亨（1558-1626），字贞父，号寓庸，仁和（今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是岁，升常镇兵备大参，过家。作《铅山道中望分水关有作》，略云：“昔我朱夏出关去，吏部明日称南京。今我秋深入关来，江南使者衣绣行。辞家为期隔年别，一客长安四度正。”又作《度分水关》《建州山行即事》《过温陵晤何稚孝仪部》；又作《过家赠内》，略云：“曹事凭职掌，达官仕非誉。五年无余禄，半年无尺书。缝衣准畴昔，长短故不如。幸得移一官，奉敕领中吴。”（《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按：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今四年整，故曰“四度正”。

是岁，过湖北麻城，作《过麻城吊李卓吾》八首。

按：李卓吾，即李贽。贽（1527-1602），字卓吾，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进士，官至姚安知府。

又按：献臣还作有《书李卓吾〈党籍碑〉后》，作年不详。

是岁，赠邹元标会试、金榜各一册，并作《与邹南皋寅长书四》。

是岁，作《答陈玉海庐陵》，以为“闽人素号迂直无伎俩，而不佞又迂直无伎俩之尤者。”（《清白堂稿》卷九）。

是岁，作《答李斗野帘宪》。

按：李斗野，即李焘。焘（1544-1625），字若临，号斗野，河源（今属广东）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泉州推官。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

又按：李焘为蔡贵易莫逆，献臣总角蒙其教泽。

是岁，作《祭封少参王师斋丈翁文》。

按：王师斋，即王三锡。三锡（1524-1603），字师斋，一作思斋，道显父，献臣姑父，同安人。以道显贵，封云南布政使司右参议。

##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 四十三岁

正月，初九日，赴常镇兵备，过浙江崇德，作《赴常镇任谒先府君崇德四知祠文》。

按：往昔蔡贵易擢南曹户，而却徽商油商之馈于姑苏，商民于崇德建兹祠以祀之。

是岁，常镇兵备任上，足迹多在润州（镇江）。

是岁：《驳人命首抵从徙议》。

是岁，与民约法三章，作《常镇小约》及《〈常镇小约〉题言》。

是岁，作《答王损庵乙巳》，以为王肯堂《义府》一书为圣经之羽翼，后学指南。

按：王损庵，即王肯堂。肯堂（1552-1639），字宇泰，号损庵，金坛（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参政。

是岁，冯时可赠著作，作《答文所廉使》。

按：冯文所，即冯时可。时可，字元成，号文所。华亭（今属上海）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贵州布政使参政。

是岁，作《祭陆平泉大宗伯年九十七》。

按：陆平泉，即陆树声。树声（1509-1605），字与吉，号平泉，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十年（1531）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四十四岁

秋，观兵杨舍，谒赵与治于石桥里。

是岁，作《风化事行武进丹徒八县》。

是岁，作《苏紫溪〈易经生生篇〉序》。

按：苏紫溪，即苏浚。浚（1541-1599），字君禹，号紫溪，晋江人。万历元年（1573）解元，五年（1577）进士，官至广西参政。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易经〉生生篇》六卷。

是岁，为王鏊作《王文恪公〈〈诗经文粹〉序》。

按：王文恪，即王鏊。鏊（1450-1524），字济之，别号守溪，人称震泽先生，吴县（今属江苏）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文渊阁大学士。

是岁，为顾宪成作《题〈顾泾阳选义〉序》。

按：顾泾阳，即顾宪成。宪成（1550-1612），字叔阳，号泾阳，人称东林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四年（1576）解元，八年（1580）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

是岁，为族兄蔡守愚作《发吾兄〈百一斋制义〉序》。

是岁，作《浚九里青旻山塘河记》。

按：九里青旻，在今江苏江阴。

是岁，在无锡，作《与徐州仓胡瞻明户部》，言日走镇江、无锡、苏州间。

按：胡瞻明，即胡廷晏。廷晏，字瞻明，漳浦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陕西巡抚。

###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 四十五岁

是岁，以常镇兵备道大参加衔湖广按察使。

是岁，作《风化事行武进丹徒八县》《清屯审甲以苏运苦事呈文》《答苏州申相公及诸绅论限田》。

是岁，作《杨待御〈得英录〉后序》。

是岁，欲辞归，次丹阳，作《上周抚台揭辞留任丁未》，以为常镇道务虽简，人情难调。

按：周抚台，即周孔教。孔教（1548-1613），字明行，号怀鲁。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至右金都御史。

是岁，作《与王缙山编修》。

按：王缙山，即王衡。衡（1561-1609），字辰玉，号缙山，太仓（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殿试第二人，授翰林编修。

是岁，作《答邹愚谷》，以为近来吴与会稽书画，以邹迪光、董其昌为宗匠。

按：邹愚谷，即邹迪光。迪光（1550-1626），字彦吉，号愚谷，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湖广提学副使。

是岁，作《与叶台山阁老》。

是岁，作《明乐安王府教授方北叶公墓志铭》。

按：方北叶公，即方恒荫。恒荫（1513-1603），字春干，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历缙云训导，余杭教谕、乐安教授。

是岁，林汝韶卒。

###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 四十六岁

是岁，作《详吴复庵崇祀乡贤》《常州各营战船改造楠木呈》。

是岁，作《合刻〈范文正公忠宣公集〉序》。

是岁，作《顾泾阳〈小心斋札记〉序》。

按：顾泾阳，即顾宪成。已见。

是岁，作《刻方本庵〈心学宗〉序》。

按：方本庵，即方学渐。学渐（1539-1629），字达卿，号本庵，人称明善先生。安徽桐城人。领乡荐，弃去。讲学东林书院。

是岁，作《上王荆石相公戊申》，以为王锡爵文“迁史坡仙，千古颀颀。至于奏疏之妙，真足使人主览之动容。”（《清白堂稿》卷十）

按：王荆石，即王锡爵。锡爵（1534-1616），字元驭，号荆石，王衡之父，太仓（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一年（1583）会元，殿试第二人。内阁首辅。

是岁，作《祭少参林光璧亲翁文》。

按：林光璧，即林汝韶。已见。

###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 四十七岁

冬，由常镇兵备按察使降调，作《闻言惕衷敬陈楚事始末以剖白心迹以挽回世道疏己酉》，略云：“赤敕下部院，将臣先赐罢斥，仍将臣疏宣示中外，使知楚事之论以臣为正，异日国家善类亦不至一网打尽。臣无任陨越俟命之至。”（《清白堂稿》卷二）署名“常镇兵备按察使蔡献臣”。

按：献臣中察，当追逆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楚王案。

冬，归家，过浦城车盘驿，作《车盘驿读谢绎梅尚书壁间韵》。

按：谢杰（1538-1604），字汉甫，号绎梅。长乐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户部尚书。

是岁，作《又和王阳明先生韵》。

是岁，作《溪行咏涧底松》，略云：“所贵有贞心，鱼龙不敢吞。”（《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示劝惩以隆孝治事行县》。

是岁，作《与蒋兰居奉常》。

是岁，以所刻四册赠秦钟震，作《答秦耻壘》。

按：秦耻壘，即秦钟震。钟震，字伯起，晋江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知府。

是岁，作《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小峰赵公墓志铭》。

按：小峰赵公，即赵与治。与治（1520-1605），字道隆，号小峰，江阴（今属江苏）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

是岁，作《四川按察使省庵王公墓志铭》。

按：省庵王公，即王继明。继明（1545-1608），字用晦，初号东野，改号省庵，浙江温州人。

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

是岁，作《祭王缙山》。

按：王缙山，即王衡。已见。

##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 四十八岁

正月，元日，归家，过仙游枫亭，因忆万历十三年（1585）游九鲤湖事，作《余乙酉秋游九鲤两日夜不得梦今二十六年矣庚戌元日暂憩枫亭因和林楚石黄门韵》。

按：林材，字谨任，号楚石，闽县（今福州）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南京通政使。

九月，同从弟鼎臣，三儿学光、四儿孚光等谒董水先人茔墓，侄蔡绍芳等从浯洲至，同往；作《庚戌九日同体谩弟学孚二儿展谒董水先茔适世卿侄偕李兴东浮海至》。

是岁，作《送切叶恭游燕兼简吴亮恭》。

按：吴亮恭，即吴宓。宓，字亮恭，显之子，漳浦人，漳州“玄云十三子”之一。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中书舍人。

是岁，池显京罢公车，坊贾行其《诗义》，显京持示献臣。

是岁，作《李邑侯〈正俗编〉序》。

按：李邑侯，即李春开。春开，字晦美，号青岱。万历二十五年（1598）举人，三十七年（1609）任同安县知县。

是岁，作《壬寅差琉球纪事》。

是岁，作《答李衷一解元庚戌》，略云：“抵舍以来，侍亲课子，差慰本图。暇则考览宋儒诸书，而时发之举业及问举业者，了不关出山事。”（《清白堂稿》卷九）

是岁，作《邑侯李青岱地课奖励序庚戌》。

按：李青岱，即李春开。已见。原题作“庚子”，误。庚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春开万历三十七年（1609）任同安知县。此序云：“邑侯李公以建武世家来莅吾同，未浹岁也。”（《清白堂稿》卷五）三十七年莅同。至今岁未“浹岁”，故改正为“庚戌”。

是岁，作《送刘起田学博谕蓝山序》。

按：刘起田，即刘章。章，号起田，陆川（今属广西）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为同安县训导，调蓝田县教谕。

是岁，作《明昭勇将军惠潮参将榕斋邵公暨配淑人吴氏墓志铭》。

按：榕斋邵公，即邵应魁。应魁，字伟长，号榕斋，同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官至惠潮参将。

##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 四十九岁

二月，八日作《书城南别业示谦光儿》。

春，潘洙过同安城南，献臣出制议稿，与之论制义之奇正。

九月，与同安知县李春开游西山，作《九日同李令君游西山岩喜雨有作》。

是岁，蔡复一擢湖广参知，得备兵，将之镇澧阳，献臣作《送蔡敬夫大参入楚》。

是岁，作《〈许钟斗太史遗集〉序》。

按：许钟斗，即许獬。已见。

是岁，为内弟池显京作《池致夫〈迈征堂诗义〉序》。

是岁，作《挽林玉吾大参》。

按：林玉吾，即林玉材。玉材（1533-1611），字以诚，号玉吾，同安人。初学《易》，改治《春秋》。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山西参政。

是岁，作《挽朱淡庵司空宫保》。

按：朱淡庵，即朱天球。已见。

是岁，潘洙年五十，为作《潘鹏江年兄五十画像赞》。

是岁，作《答薛青雷》。

按：薛青雷，即薛三才。三才（1555-1619），字仲孺，一字青雷。定海（今浙江镇海）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兵部尚书。

是岁，作《祭隼卿侄孙文》。

按：隼卿，即蔡绍英。绍英（1566-1611），字隼卿，号肖桂，又作少桂。

##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 五十岁

正月，献臣编选《仕学全稿》，并作《〈仕学全稿〉自序》及《又题〈仕学全稿〉》。

按：万历十八年（1590）庚寅之后为《仕学稿》，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之后作《仕学续稿》。

又按：《仕学全稿》刻于是岁。

又按：据《〈仕学全稿〉自序》及《又题〈仕学全稿〉》，又有《仕学续稿》。《全稿》《续稿》又细分为《金陵稿》《燕台稿》《吴中稿》《东山稿》四稿。四稿疑有单行本。

正月，二十九日，长孙蔡有则生。献臣作《壬子正月廿九日定儿举孙》。

按：蔡有则（1612-1629），字思鞠。定光（甘光）子。十三岁入泮，早夭。

正二月间，定光（甘光）妇陈氏卒。献臣作《悼次儿妇陈氏》。

二月，十一日，五十初度，作《壬子二月十一日初度放歌》，略云：“我今五十初度至，母氏行年七十二。三吴观察中谗归，高堂供养百不备。老妻拮据走朝昏，臧获空复饱饕餮。四男两女无金诒，婚嫁未毕朱陈村。谦定二儿初游泮，跃冶之金未受锻。学儿十六资太慵，童孚颇慧尤耽玩。”（《清白堂稿》卷十二上）又作《壬子生朝忆隼卿侄》。

按：此时有四男二女一孙。谦光、定光（即甘光）已入泮。

又按：隼卿，即蔡绍英。已见。

二月，丁启浚有诗贺献臣五十初度，献臣作《丁亨文吏部诗赠五十初度依韵赋谢》。

九月，宿同安观音阁，作《深秋宿西山观音阁壬子》。

按：献臣曾读书于此山中。

十一月，作《至日寄吉水邹尔瞻》。

按：邹尔瞻，即邹元标。已见。

是岁，丁启浚起考功，还朝，献臣作《喜丁亨文吏部召起考功》《寿丁亨文吏部兼趣还朝》。

是岁，内弟池显京北上会试，为作《送内弟池敬夫孝廉计偕》。

是岁，何乔远次子九云中举，为作《寄怀何稚孝并贺次郎得举》。

按：何九云，字舅梯，乔远次子，晋江人。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

十一月，作《哭顾泾阳少卿》。

按：顾泾阳，即顾宪成。已见。泾阳生前，献臣曾为之作《顾泾阳〈小心斋札记〉序》。

是岁，作《读林次崖先生集有感壬子》《〈林次崖先生集〉序壬子》。

按：林次崖，即林希元。已见。

是岁，作《又游西山岩》四首。

是岁，作《读诗漫兴》二首，其一：“思献论文喜浅粗，尧夫饮酒贵轻淳。解人一往成千载，妙理诗篇说却真。”（《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是岁，作《合邀李青岱令君梵天寺既陟轮峰复醉夜月时将有人覲之行》。

是岁，应知县李春开之邀，撰《同安县志》，并作《〈同安县新志〉序》。参与者有本邑林燧卿、苏庸谨、蔡大腾等。

是岁，李春开年五十，为作《寿邑侯李青岱五秩序》。

是岁，为同安张炜作《刻张伯弢〈近艺〉序》。

按：张伯弢，即张炜。炜，字伯弢，号鲁斐。同安县人。

是岁，为岳母傅宜人作《池岳母傅宜人七十偕寿序》。

是岁，作《重建大轮驿记》。

按：大轮驿，同安县驿站。

是岁，作《呼鹤鸣把总修船记》。

按：呼鹤鸣，武举人，浯屿寨把总。

是岁，作《同安溪南蠲税功德碑》。

是岁，作《寄徐海石仆少》，略云：“老母春秋七十二矣，不肖罪废之余，菽水承欢，已不复为谒补计。”（《清白堂稿》卷十）

按：徐海石，即徐兆魁（1550-1635），字廷策，号海石，东莞（今属广东）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是岁，作《与钟赞宇老师》，略云：“小儿谦光、定光，已滥游泮。顷次豚新举一孙，而老母年七十二，尚能视孙燥湿，差为慰意。”（《清白堂稿》卷十）

按：钟赞宇，即钟万禄。万禄，字懋功，号赞宇，清远（今属广东）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十六年（1589）为福建同考官，拔献臣闽闱之中。

是岁，张玮为新科解元，献臣作《与张二无解元》，以为：“今之人当其为士时，读举业、取青紫，足吾事矣，非有明师良友之教诏也，无论道德二字，尽错认富贵当作功名，遂误了一生人品。故立志必自入官始。”（《清白堂稿》卷十）

按：张二无，即张玮，字席之，号二无，武进（今属江苏）人。万历四十年（1612）江南解元，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是岁，作《赠邑侯李青岱入覲奏最序》。

按：李青岱，即李春开。已见。

是岁，以为林希元当入配邑朱子祠，作《与李碧海屯道论林次崖配祠书》。

是岁，作《祭李振日秀才文》。

按：李振日，同安人。秀才，曾作《同安赋》。

是岁，作《祭同年刘邻苍宪副》。

按：刘邻苍，即刘梦松。梦松，字国夏，号邻苍，存德子，梦邹弟，同安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副使。

是岁，作《祭蒙阴署教昭字兄文》。

是岁，作《祭亲姆丁孺人文》。

按：丁孺人，王姓，丁启浚、启汴之母、王慎中女，晋江人。

是岁，长女卒，献臣为作《祭丁室亡女文》：“我旬日前视汝，汝欲我留，我初不以为意。及疾亟，犹欲速我一来，何期倍道驰至，而汝已不及诀乎。”（《清白堂稿》卷十六）

按：献臣长女适晋江丁启汴。年仅三十，无子。

###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 五十一岁

九月，祷雨同安天马山，作《癸丑季秋祷雨豪神庙遂陟天马山请水》诗；又作《癸丑秋南郊街祷雨文》《癸丑秋豪神庙祷雨文》《豪山祷雨纪事》。

是岁，三儿学光年十七，加冠。献臣作《训学儿加冠二首》。

是岁，有诗训次子定（甘）光，作《示定儿》，略云：“如何甘自弃，少小慕豪奢。不惜兴文误，还愁责忘差。”（《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送闵昭余宪副入吴兴送闵昭余宪副入吴兴》。

按：闵梦得（1565-1628），字翁次，一字禹锡，号昭余，乌程（浙江吴兴）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兵部尚书。

是岁：《哭薛玄台国子》。

按：薛玄台，即薛敷教。敷教（1554-1610），字玄台，武进（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光州学正。“东林八君子”之一。

是岁：《铜鱼亭成邀林负苍陈宾门张辅吾三君夜坐》。

按：铜鱼亭，在同安县。

又按：林负苍，即林应翔。应翔，字源澠，号负苍，又号止岩，人称念不先生。同安县中左所（今厦门岛）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东副使。

又按：陈宾门，即陈基虞；张辅吾，即张廷拱。已见。

是岁，侄蔡绍芳年五十，献臣作《寿世卿侄五十》，略云：“汝今五十我加一，犹忆韶龄共颀颀。”（《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是岁，作《谢司训还建州》。

按：谢司训，即谢孔教，建州（今建瓯）人。时为同安司训。

是岁，作《〈四书破愚录〉序》。

按：《〈四书〉破愚录》同安知县唐尤冈撰。尤冈，浙江上虞人。

是岁，编就《〈诗经〉仕学稿》，作《〈诗经仕学稿〉自叙》。

按：《〈诗经〉仕学稿》梓行于是岁。

是岁，作《〈仰紫堂问业〉序》。



按：《仰紫堂问业》为课艺诸生之集，梓行于是岁。

是岁，表兄王道显年六十四，为作《寿王瞻明宪长六十四》《表兄王瞻明廉宪寿序 癸丑》。

按：王瞻明，即王道显。已见。

是岁，作《浯屿把总翁晓旻去思碑记》。

按：翁晓旻，即翁元辅。元辅，字孝揆，号晓旻。由松江金山卫指挥使擢升浯屿寨把总。

是岁，作《寄东林高景逸年兄书》，与之论东林，以为东林之名，几与朱子争高，而名虽赫，而道未大行。

按：高景逸，即高攀龙。攀龙（1562-1626），字云从，更字存之，号景逸。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是岁，作《烧臂偈有序》。

是岁，作《林次崖先生配祀朱祠告文代》。

##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 五十二岁

正月，上元，作《上元日家方伯兄赴邑宾之招赋赠》。

四月，读邵雍诗集，作《初夏园居雨余读〈击壤集〉》，略云：“积雨山斋一事无，诵诗偏爱邵尧夫。三春忽过成初夏，小道遍参不碍儒。”（《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五月，五日，与陈基虞等游同安梵天寺，作《五日同洪春寰陈宾门邀兰溪赵玄枢世兄于梵天寺晚登罗汉峰》。

八月，六日，巨风暴雨。《甲寅秋松叹》略云：“八月六日天降威，飘风晨卷檐溜飞。须臾城市变成海，古榕苍松倒十围。千山万树入望尽，半作十字相撑支。”（《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九月，长婿丁启汴远来，作《丁亨中贤坦深秋远顾情见乎词》。

按：丁启汴（1584-1628），字丁亨，启浚弟，晋江人。献臣长女适启汴。

十二月，作《岁暮望洋庵作》。

冬，作《甲寅冬望寿苏文所七十一》。

按：苏文所，即苏思义。思义（1544-1629），字文所，同安人。幼而好学，晚称诗，隐士。

冬，岳翁池浴德作寿；与池显方登嘉禾屿洪济山绝顶。献臣作《甲寅冬寿奉常池岳翁七十六》《池直夫内弟邀登洪济山绝顶》。

是岁，游同安小嶝岛，寻访宋遗民丘葵遗迹，作《访小嶝山丘吉甫先生旧宅》《快坐丘吉甫钓矶山海环静是此山最胜处下有石棋盘题字先生笔》。

按：丘葵，字吉甫，同安县小嶝岛（1915年金门建县属金门县，今属厦门市翔安区）人。宋亡，不仕，讲学家山。

是岁，作《喜林志唯吏部奉常得命》。

按：林志惟，即林学曾，已见。

是岁，作《郭复庵远顾敝庐旋当还朝赋赠并谢》。

按：郭复庵，即郭如楚，字樾甫，号复庵，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太仆寺卿。

是岁，作《戏赠杨心空道人》。

是岁，为陈基虞父陈廷佐作《寿陈仰台封翁七八帙》。

是岁，作《清理宗室设官议甲寅》。

是岁，作《仪曹二难存篇》并《自序》。

按：《仪曹二难存稿》五卷，梓行于是岁。

是岁，作《黄邑侯〈南岳社稿〉序》《与黄鲜生请启》《寿邑侯黄鲜生序》《腊月寿黄鲜生邑侯》。

按：黄邑侯，即黄文星。文星，字鲜生，潜山（今属安徽）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同年冬为同安知县。

是岁，作《癸卯北场纪事》《癸卯妖书纪事》。

是岁，作《〈勘楚纪事〉引》《癸卯勘楚纪事》《勘楚纪余》。

按：《癸卯勘楚纪事》梓行于是岁。

是岁，作《折柬名抄纪事》。

是岁，作《〈兴学广义簿〉引》。

是岁，作《少泉苏公暨配李氏合葬墓志铭》。

按：少泉苏公，即苏商霖。商霖（1519-1576），字德说，号少泉，同安人。

是岁，黄凤翔卒，作《挽黄仪庭大宗伯二律》。

##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 五十三岁

正月，作《岁首春前咏瓶梅作》。

三月，后店祭扫伯父归，游同安端云岩，作《重游端云岩记》。

春，作《望洋庵春夜》《立春日祭仲吾少仲二茂才携酒过访望洋庵》《蔡少仲之黄甘寻小史启儿戏赠》《乙卯步元夕作》《送体谟弟肆业成均》。

秋，作《乙卯立秋日闻乡试加额》。

秋，修筑海丰岸堤，作《秋晦游宿石空岩时有海丰筑岸之役》。

冬，补浙江按察司宁绍巡视海道右参议。出古田，作《滄峡道中咏松》；过武夷山，作《望武夷》，略云：“遥望武夷君，岩壑秘深窈。髭须亦已颁，闻道苦不蚤。”（《清白堂稿》卷十二上）出分水关，作《岁暮奉母出分水关依己西冬入关韵》《车盘驿和叶少师韵》。过江西铅山鹅湖书院，作《过鹅湖书院和朱陆三先生韵》。

是岁，作《喜陈蠡源左辖入闽》。

按：陈蠡源，即陈道亨。已见。

是岁，赠董应举仪曹时所作《存稿》《与董见龙吏部乙卯》；又作《董见龙考功予告奉讯》，书之扇头相赠。

按：董见龙，即董应举。应举（1557-1639），字崇相，一字见龙，闽县人，家连江。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工部郎。

是岁，韩仲雍为福建巡海道副使，献臣作《贺韩少参璧哉新擢海宪》。

按：韩仲雍，字璧哉，高淳（今属江苏）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福建按察使司按察副使、巡海道副使。

是岁，作《再和王阳明先生韵》。

是岁，从弟蔡鼎臣肆业成均，献臣作《送体谟弟肆业成均》。

是岁，为陈基虞父陈廷佐作《寿封廷评陈仰台翁开八帙序》。

按：陈仰台，即陈廷佐。廷佐（1546-1621），字时守，号仰台，同安县浯洲人。诸生。以子基虞封大理寺评事。

是岁，丁启浚新命下，作《答丁哲初吏部》《赠丁亨文选郎初度时新膺铨命》。

是岁，作《送黄鲜生邑侯入覲序》。

##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 五十四岁

是岁，在浙江按察司、巡视海道右参议任上，尝驾一叶轻舟，视师于惊风骇浪之中。

四、五月间，浙东官军在浙东洋面击退倭船，保障浙海安全，为作《外洋攻击倭船申文》。

五月，张燮过宁波，献臣招饮娑萝园，疑作有《娑萝园夜集张绍和时五月四日也》（诗佚，题笔者所加）。

按：据张燮《蔡体国招饮娑萝园夜集时五月四日也》（《霏云居续集》卷十六）。

秋，游四明陈育王寺，寺中苏东坡碑为献臣父蔡贵易重勒，有《秋日邀周南阳宪副、林槐亭提学游阿育王寺，观金塔舍利，寺有娑罗树二株，是先大夫守四明时移种金陵，苏东坡碑是先大夫重勒，感怀有作》诗。

秋：《谒祀先府君四明平政祠文》。

秋、冬间，作《长歌送万九云学博赴公车》。

按：万九云，即万德鹏，字九云，宜兴（今属江苏）人。举人，万历末年为同安县教谕。

十二月，在明州过除夕，作《丙辰四明除夕作是日立春》。

是岁，作《蛟关视师闻警》《钱塘江上作》。

是岁，作《曹娥江谒孝女庙》。

是岁，作《踏雪访虞长孺铨部不遇遂入越州》。

按：虞长孺，即虞淳熙。淳熙（1553-1621），字长孺，浙江钱塘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吏部郎中。

是岁，过西兴，作《渡西兴忆三十年前》。

是岁，作《申严保甲以清盗源行宁波府》《定卑官委署例以示体悉杜营钻事行府》《置簿纪过以嘉与维新事行宁波府》《覆照制帮差以苏烦役申文》《申禁擅受民词以肃吏治行宁波府》。

是岁，作《〈陈文定公年谱纲目〉序》。

按：陈文定，即陈敬宗。敬宗（1377-1439），字世光，号淡然居士，慈溪（今属浙江）人。明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

是岁，作《题王罔伯诗后》。

按：王罔伯，即王士骥。士骥，字罔伯，号淡生，太仓（今属江苏）人，世贞长子。万历十年（1582）江南乡试第一，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

是岁，作《待御林道卿生圻记》。

按：林道卿，即林祖述，号槐亭，鄞县（今属浙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广西提学僉事。

是岁，作《答薛青雷》。

是岁，作《与徐云林新令尹》。

按：徐云林，即徐应秋。应秋，字君义，号云林，浙江衢州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任同安知县。四十七年（1619）移剧县莆田。

是岁，作《海道祭沈蛟门相公文》。

按：沈蛟门，即沈一贯。一贯（1531-1615），字肩吾，又字不疑，号龙江，又号蛟门，鄞（今浙江宁波）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中为首辅。

是岁，作《寄祭王瞻明廉宪表兄文》。

按：王瞻明，即王道显。已见。

是岁，作《醉歌寄徐耀玉职方》。

按：徐銮（？-1616），字鸣卿，又字耀玉，漳州卫人。漳州“玄云十三子”之一。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兵部职方郎。

是岁，徐銮卒。作《挽徐鸣卿职方》。

##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 五十五岁

正月，元日，在四明（今浙江宁波），作《丁巳元日四明试笔时年五十有五》，略云：“去年藩署肃朝冠，此日明州五夜阑。”（《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春，作《答丁司空改亭》。

按：丁司空，即丁宾。宾（1542-1632），字礼原，号改亭，浙江嘉善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

春，作《答郭青螺大司马丁巳》，略云：“不意向衰之年复有衡文之役，即嘉、湖二郡，遂费半载拮据，然后知此官之难，任劳任怨，未易为也。矧浙又难之难乎？立春之日，即拟渡西陵校越、明，以次而周浙东诸郡。”（《清白堂稿》卷十）

按：郭青螺，即郭子章。子章（1542-1618），字相奎，号青螺，江西泰和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兵部尚书。

春、夏间，作《镇下关添将分兵议》《添将分兵问答》。

春、夏间，作《与苏石水开府》，略云：“船不坚则不可与出海，器不精则不与可应敌”（《清白堂稿》卷十）

按：苏茂相，即苏弘家。已见。

夏，升任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

是岁，作《浙学道钦条演义行十一府》。

按：《浙学道钦条演义》一册，梓行于是岁。

是岁，作《正名维风行宁绍府》《总送额外遗才以广搜罗行十一府》《武林书院恳恩增额行杭州府》。

是岁，作《谒祀先府君四明报恩新祠文》。

按：祠建于宁波龙桥门内。

是岁，往嘉兴科试，谒崇德四知祠，作《科试嘉兴谒祀崇德四知祠》。

是岁，作《示浙东六郡士》《〈浙江丁巳岁荐齿〉序》。

是岁，作《游兰亭》二首。

是岁，游普陀山，作《登盘陀石》《礼潮音洞》。

按：盘陀石、潮音洞，在浙江普陀山。

是岁，作《嘉陆伯生枉顾四明》。

按：陆伯生，即陆应阳。应阳（1542-1627），字伯生，清浦（今属上海）人。布衣，书法家。

是岁，与丁启浚夜话，作《浙江驿舟中共丁亨文馆卿夜话》。

是岁，作《镇下关分将添兵议》《添将分兵问答》。

是岁，粗悟致良知之说，作《致良知〈四书〉摘》并《序》。

是岁，作《王弘台少方伯视海序》。

按：王弘台，即王应干。应干，字弘台，又作洪台，睢宁（今属江苏）。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杭严道。

又按：此以论巡海道总之责不外御将、治兵、清饷三项。

是岁，作《寄奠钟赞宇老师文》。

按：钟赞宇，即钟万禄。已见。

##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五十六岁

夏，定科宁波，作《科试四明谒祀先府君报恩祠文》。

夏，科试台州府，适献臣祖蔡标为郡佐六十年，邓文光为作《书戊午天台试士图》。

夏、秋间，科试四明，作《行余姚孙月峰尚书乡贤碑诋矿》《送薛屠二学道名宦行杭州府》《送谭叶二海道名宦行宁波府》《〈两浙观风校士录〉后序》。

秋，作《节俭训示浙江戊午新科》《〈戊午浙江岁荐齿录〉序》《〈浙江戊午同年齿录〉后序》《〈丁戊浙英录〉序》；又作《闻浙学误简有作》。

按：献臣为提学副使期间，“素性怜才，每郡搜遗生童试卷，无论取与不取，一一批评，发府给领”（《赴任就道夙疾陡发恳乞天恩允放以安愚分疏》，《清白堂稿》卷二），以至心力颇殚，精神之耗几尽。

十月，吏部题奉钦依蔡献臣升光禄寺少卿。

冬，告病。奉母自浙江归家。途中作《度分水关大安作》《浙还车盘道中作》，后一诗略云：“三年作越游，强半坐文署。拮据故纸堆，宵且不遑住。既竣省试役，复讨贤达故。”（《清白堂稿》卷十二上）又作《太平驿道上溪行》。

是岁，池浴德卒，为作《祭池明洲岳翁太常文》。

按：池明洲，即池浴德。已见。

是岁，作《挽李叔玄奉常》。

按：李叔玄，即李开藻。开藻，永春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大同巡抚。

##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 五十七岁

春，奉母归家。时黄太夫人年七十九。

是岁，游嘉禾屿玉屏山，作《春日游玉屏山绝顶》。

是岁，作《〈致良知四书摘〉后序》。

按：《致良知四书摘》梓行于是岁。

是岁，作《〈四书肤证〉序》，略云：“丁巳，试吴兴，粗有悟于致良知之说，复节摘而点缀之，得百余条。然偶识者时出传注之外，而于举业尤近良知……持就正于敬夫先生，敬夫亦时出卓诣以起予蒙也……圣贤之书，同归一理，固非判然悬殊，可容人另辟一途径者，乃摠加订证，汇为一帙”（《清白堂稿》卷四）

按：《四书肤证》梓行于是岁。

又按：又有《四书合单讲义》四册行于世，梓行时间不详。附系于此。

是岁，作《〈郑氏家训〉引》。

按：《郑氏家训》，郑有誉撰。有誉，字见可，福清人。贡生。万历末年同安训导。

是岁，作《书丙申小像自警》。

按：小像绘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此文作于二十三年后。

是岁，作《送林璞所应召赴阙》。

按：林璞所，即林一柱。已见。

是岁，作《奉讯林省庵纳言时方推太常》。

按：林省庵，即林学曾。已见。

是岁，作《重修梵天寺宝藏殿钟楼募疏》。

是岁，作《请徐云林启》。

按：徐云林，即徐应秋。已见。

是岁，作《贺邑侯徐云林称剧莆田序》《送徐云林邑侯移剧莆田》。

是岁，作《封承德郎郭颖台公暨配叶吴二安人墓志铭》。

按：郭颖台，即郭榜。榜，字廷聘，号颖台，同安人。以子梦得贵，封南京户部主事。

是岁，作《祭柯三槐转运年兄文》。

按：柯三槐，即柯凤翔。已见。

## 万历四十八年、明光宗朱常洛泰昌元年庚申（1620） 五十八岁

正月，初七日，作《人日望洋庵作》。

二月，赴光禄少卿任，途经莆田、福清，至福州，病眩，归家。作《莆阳道中》《仲春宿石竹山》《到三山闻彭侍御疏，及先一夜宿石竹，梦云：相送榕门月色新，乾坤万里一归人》。

按：石竹山在今福清市，传言祈梦辄灵。

三月，作《赴任就道夙疾陡发恳乞天恩允放以安愚分疏》，叙履历较详：“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南京刑部山东司主事。历升南京兵部职方司署员外郎事、车驾司署郎中事，调南京吏部文选司署郎中事，病痊赴部，复补前职。丁忧复除礼部主客司署郎中事，调仪制司署郎中事，恩诏实授，升湖广布政司右参政，整饬常镇兵备，加升湖广按察司按察使。大计降调。”（《清白堂稿》卷二）

秋，作《庚申秋圣节日后服未除，忽闻宾天之报，复闻泰昌新政，情见乎词》。

冬，予告。

是岁，作《哀辽阳十绝》是岁，作《读李杜诗放歌》，略云：“借问后来作者谁？伊川击壤长公苏。此皆工力敌造化，咳唾错落摩尼珠。”（《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与池显京、显方兄弟游泉州清源山，献臣作《池致夫直夫邀游清源洞》；又丁启浚邀游泉

州二岩，献臣作《丁亨文奉常邀饮巢云弥陀二岩有感时事》，有大厦将倾之忧：“中席发长叹，一叹征东卒。征调十万余，军需从何出。奴酋怀逆久，养虎未伏辄。再叹庙堂上，莫适任主持。权豪纷争胜，苞苴倍曩时。大厦沕将颠，一木岂能支。”（《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酌茶怀蔡敬夫》。

是岁，王志远入中州，献臣作《送王玄亭方伯再入中州》。

按：王志远（1562-1621），字而近，一字而玄，号玄亭，会之次子，志逵弟、志道兄，漳浦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

是岁，作《喜黔中蒋美若年兄已到难兄宁洋县署兼订枉驾》。

按：蒋美若，即蒋杰。杰，字美若，号象岩，普安（今贵州盘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广东副使。

是岁，作《张绍和孝廉即席有作步韵》。

是岁，为同安陈尚宾作《〈十三经通考〉序》。

是岁，作《文崎湾严革海税记》。

按：文崎湾，在同安县。

是岁，为内弟池显方作《池直夫内弟像赞》。

是岁，作《上叶台山阁老书》《又上叶台山阁老书》。

是岁，作《答彭让木会稽》。

按：彭让木，即彭汝南。汝南，字伯栋，号让木，莆田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任会稽知县，官至兵部左侍郎。

是岁，作《诰封左参政致仕儒学训导柏坡洪公暨配封淑人王氏墓志铭》。

按：柏坡洪公，即洪居正。居正（1515-1598），字季中，号柏坡，同安人。武进训导，以子邦光贵，封贵州左参政。

是岁，作《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桐冈柯公暨配累封恭人陈氏墓志铭》。

是岁，潘洙卒，为作《挽潘士鼎方伯》；又作《祭同年潘鹏江方伯文》，叙与潘洙情谊略云：“吾兄弟两榜之附骥者有几？两榜中其负意气称相知者有几？其杰然于榜中能为同籍光宠者有几？三十年来其别历中外、旦夕槐棘者有几？无论别历中外、旦夕槐棘，即存于世者有几？若吾士鼎，冠两榜矣，意气矣，杰然矣，槐棘旦夕矣，胡遽溘然也。”（《清白堂稿》卷十六）

##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元年辛酉（1621） 五十九岁

是岁，与张燮等送蔡复一赴易州任，献臣为作《步韵送蔡敬夫方伯赴召之易州》三首、《同蔡敬夫张燮小饮》（原无题，题笔者所拟）。

按：张燮有《访蔡敬夫招登梵天寺同蔡体国诸公剧醉是时敬夫起家易州》《蔡体国招饮同蔡敬夫在坐》《梵天绝顶呈体国敬夫》。

是岁，作《和邵尧夫道尾吟》。

按：邵尧夫，即邵雍。雍（1011-1077），字尧夫，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早年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元佑元年（1049）移居洛阳。北宋理学家。

是岁，表侄王轩游学南雍，作《送王景瞻表侄游南雍》。

按：王轩（1590-1628），字鸣衡，号景瞻。献臣表兄王道显子。

是岁，作《蒋象岩太守从宁洋县斋以二诗言别，云复将入齐视令子华令、克家，期而不到有怀和韵》。

按：蒋象岩，即蒋杰。已见。

是岁，作《步韵寿太仆李伯东》。

按：李伯东，即李开芳。开芳，字伯东，号还素，永春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南太仆卿。

是岁，作《代李都谏子遵诏陈言疏》。

是岁，作《〈理学宗旨〉序》。

按：《理学宗旨》，郭良翰撰。良翰，字道宪，莆田人。万历中，以荫官太仆寺寺丞。

是岁，作《曹子贞〈玉芝楼〉序》。

按：《玉芝楼》，曹大同撰。大同，字子贞，号异庵，南通州人。岁贡生，授光禄寺署丞。蔡复一亦为此集撰序。

是岁，作《〈轮山课士录〉序》。

按：《轮山课士录》，同安知县李灿然天启元年（1621）所选邑士制义文。

是岁，为史继信作《大学士史莲岳公寿序》。

按：史莲岳，即史继信。继信（1560-1635），字世程，号莲岳，晋江人。万历二十年（1592）廷试第二人。官至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

是岁，作《送林止岩应召守三衢，君自号二十不先生》。

按：林止岩，即林应翔。

是岁，作《送旧令徐云林甫莆阳入觐》。

按：徐云林，即徐应秋。已见。

是岁，作《与邹南皋书五》。

是岁，作《贺丁哲初起南太常》。

是岁，作《明隐君林葵洲暨配孺人彭氏墓志铭》。

按：林葵洲，即林牧。牧，字师让，廷永之父，同安人。

是岁，作《明故王敏直伯子敏冲叔子合葬墓志铭》。

按：王敏直，即王辂。辂（1569-1586），字鸣鸾，谥敏直，道显长子，同安人。王敏冲，即王辙。辙（1578-1598），字鸣雷，谥敏冲，道显次子。兄弟俱能文。苏浚以女许王辂、献臣以女许王辙，皆未字。王家议祀不议嗣。

是岁，蔡守愚卒。作《哭方伯发吾兄二首》《渡浯海送发吾左伯兄葬志感》《祭云南右布政发吾兄文》。

是岁，作《云南左布政使发吾蔡公墓志铭》，略云：“公学术行谊，一遵程朱家法，曾捐金葺复古堂，以祀孔子，而退二氏。”（《清白堂稿》卷十四）

是岁，王志远卒，作《祭方伯王玄亭文》。



## 天启二年壬戌（1622） 六十岁

正月，初七，作《壬戌人日望洋庵作》，略云：“六十年光空甲子，终天孺慕泣南陔。无端夜半天风起，卷送涛声欲作雷。”（《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正月，十四日，作《壬戌上元前一夕》，略云：“遭时事明主，功名图凌阁。”（《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春，作《蚤春同客游梵天寺限韵》。

秋，作《丁卯中秋夜月》。

冬，起光禄寺添注少卿。

十二月，作《季冬朔日写怀时年六十》，略云：“遽化之年，秉烛已晚。金紫非达，银青非蹇。须白日长，发白日短。”（《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送林璞所侍御按南畿》。

按：林璞所，即林一柱。已见。

是岁，内弟池显京年六十，为作《寿内弟池致夫和州太守六十》。

十二月，作《经略熊芝冈壬戌》，题下自注：“予尝以苏紫溪、顾泾阳、熊芝冈三解元可作三杰。”

按：苏紫溪，即苏浚；顾泾阳，即顾宪成。已见。

又按：熊芝冈，即熊廷弼。廷弼（1569-1625），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汉）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解元，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

是岁，为潘洙作《潘鹏江〈中奉集〉序》。

是岁。为王志远作《王玄亭方伯集序》。

是岁，作《林栩庵司理奏最赠言》。

按：林栩庵，即林栋隆，鄞县（今属浙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任漳州推官。

又按：此文论泉、漳二府气习之同异。

是岁，为林祖述作《林道卿侍御暨袁孺人偕寿序》。

是岁，作《寿大理林行卿公六十序》。

按：林行卿，同安人。

是岁，为岳母傅宜人作《池岳母传宜人八帙寿序》。

是岁，作《贺李邑侯父母荣封序》。

按：李邑侯，即李灿然。

是岁，作《与邹南皋总宪书六》，以为“眼前用人似当以才志为先，真才人便做实事，若有才而弄虚头者必非真才也”（《清白堂稿》卷九）

是岁，向叶向高推陈荐蔡复一，作《上叶台山阁老书》，略云：“夫奴酋之所以猖獗至此者，由吾封疆之无人也。所以无人者，无实心任事之人也……山海既设经略，必添巡抚，元履方伯倘亦其选乎？”（《清白堂稿》卷九）

是岁，作《与张诚字冢宰一》，以为“兵不拊循、不训练，与无兵同，则不责实之过也。”（《清白堂稿》卷十）

按：张诚字，即张问达。问达，字诚字，陕西泾阳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吏部尚书。

是岁，红夷猖獗，作《与徐心霍都督》，以为中左、古（鼓）浪屿、浯屿、大担应构建一体防御体系；攻夷法，惟火与銃。

是岁，作《明隐君周震吾暨配静懿孺人黄氏墓志铭》。

按：周震吾，即周仕庆，号震吾，同安人。好读《春秋》。因孙尔发贵，赠礼部主事。

是岁，作《池岳母传宜人八帙寿序壬戌》。

## 天启三年癸亥（1623） 六十一岁

春，北上赴光禄少卿任。临行，展先人坟茔，作《癸亥展狮山先茔时将北行》：“每逢初岁到江滨，屈指于今十二春。违远半缘羁吏迹，无端更欲动征轮。”（《清白堂稿》卷十二下）又作《望洋庵忆梅癸亥》《泛海归望洋庵》。

按：据此诗，蔡氏家族岁初有展墓习俗。

春、夏间，赴光禄少卿任，过浙江崇德，作《赴光禄任谒崇德四知祠文》。

春、夏间，北上，内弟池显方同行，于和州访池显京并别池显方。途中所作诗有：《剑浦道中癸亥》《建溪道中》《宿营武夷万年宫》《登天游一览台》《车盘驿又和叶台翁韵》《池直夫述烂柯山石梁之奇》《葛阳道中》《富春江上绝句》《过钓台和叶台山相公韵》《过项王乌江庙》五首、《和阳访内弟池致夫州守》《和阳别内弟池直夫》《谒孟庙二首》。夏、秋间，作《微臣叨窃逾涯乞赐休致以安愚分疏》《微臣因言贾罪再恳天恩特赐罢斥以谢言路以明素节疏》《海氛未戢亲闻系思恳恩予假以便归省疏》。

十、十一月间，乞假得准，作《小疏两奉留命仍欲借差归省述怀》，略云：“一官何拓落，头白尚银青。两疏垂皇眷，浮言忌独醒。”

十一月，出都，何乔远馈食，献臣作《出都阻风芦沟桥道院何匪莪使人馈食》。十一、十二月间，途中作《任城县郑城作》《宿柳泉公馆逢至日》《癸亥冬再过钓台》《过分水关和黄大司马韵》《大安驿遇雪是日立春》《大横驿和黄大司马韵》《茶洋舟中》《芋源溪行》。

冬，作《癸亥冬草萍又和孙忠烈公韵》《草萍又和王阳明先生韵》。

是岁，何乔远六十六，为作《寿何稚孝光禄歌》，略云：“酒后诗篇如泉涌，银榜金笺快笔书。即今行年六十六，朱颜华发侍玉除。”（《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按：何乔远生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

是岁，蔡复一弟复心就试南闱，献臣作《送蔡仁夫就试南闱》。

是岁，作《送庄羹若修撰册封赵藩》。

按：庄羹若，即庄际昌。际昌，初名梦岳，字景说，号羹若，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519）廷试第一。晋至左春坊庶子。

是岁，作《陈白意计曹招饮检玉亭，同何匪莪、王虞石、陈四游、陈季琳分韵得萧字》。

按：陈白意，俟考。何匪莪，即何乔远。已见。

又按：王虞石，即王命璇。命璇（1576-1646），字君衡，号虞石，原为温陵（今泉州）人，徙龙岩，遂为龙岩人。万历三十四年（1604）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署刑部尚书。

又按：陈四游，即陈一元。一元（1573-1635），字泰始，又字四游，侯官（今福州）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成进士，官至应天府丞。

又按：陈季琳，即陈元藻。元藻，字尔鉴，一字季琳，莆田人。官至礼部祠祭主事。

是岁，作《和师叶台翁自寿韵》。

是岁，作《癸亥山海兵饷议》。

是岁，作《癸亥小草纪事》。

是岁，作《上叶阁老书》。

是岁，作《与张诚宇太宰二》。

是岁，作《与商抚院论红夷求市》，以为“市宜往而不宜来，备宜修而不宜弛”（《清白堂稿》卷十）。

是岁，红夷复入浯屿求互市，作《答南二泰抚院》论浯屿、中左、石湖之防守及浯屿、澎湖游之不可裁。

按：南二泰，即南居益。居益（1572-1643），字思受，渭南（今属陕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天启三年（1623）为福建巡抚，官至户部尚书。

是岁，作《诰封中宪大夫知府仰台陈公暨配封恭人许氏墓志铭》。

按：仰台陈公，即陈志华父廷佐。已见。

是岁，林应翔卒，作《挽林负苍宪副》。

是岁，李光缙卒。

## 天启四年甲子（1624） 六十二岁

春、夏间，有诗送蔡复心，作《送蔡仁夫就试南闱先之楚》。

十二月，除前一日，作《除前一日书怀》，略云：“卧母数钱颁里媪，病妻炊黍供尊神。”（《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是岁，陈基虞居同安城西，年六十，献臣为作《寿陈宾门宪副六十》，略云：“擢宪归来是何年，我居城南君西偏。我惭出山婴世网，君笃孝思问牛眠。束发竞名场，棋酒亦相将。”（《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按：蔡献臣与陈基虞均善饮、好弈棋。

是岁，何乔远予告。献臣作《何稚孝以少司徒予告奉讯》。

是岁，作《同安任明李侯吏牒序》《为李令公寿封翁思涯暨孺人吕诗》《送邑侯李仕明再覲》。

按：李侯仕明，即同安知县李灿然。灿然，字伯弼，号任明，缙云（今属浙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次年，任同安知县。

是岁，作《二吴〈唾草〉序》。

按：二吴，吴敦贞及其兄。《唾草》为敦贞兄弟制义合集。

是岁，为苏浚大母柯氏作《寿苏大母柯淑人八帙序》。

是岁，作《同李邑侯建甯台修坛庙记》。

是岁，作《明诰赠安人周室黄氏墓志铭》。

按：黄氏（1574-1612），周尔发（长庵）配，同安人。幼通《孝经》。

是岁，作《进士治庭张公暨配贞顺孺人蔡氏墓志铭》。

按：治庭张公，即张凤征。凤征（1559-1589），字舜夫，号治庭，同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观政御史台，时已抱疾，旋卒。

是岁，李光缙去岁卒，为作《挽李宗谦解元》，其《序》略云：“李宗谦，予四十年知交也。苏

紫溪先生识君于未遇时，既发解，文字奇，海内学子宗之。晚年高尚，不诣公车。何司徒稚教疏荐于朝，未及召，而君不待矣。哲人云亡，宜祀学宫，怀旧景贤，诗以挽焉。”（《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 天启五年乙丑（1625） 六十三岁

是岁，筑室同安城南，作《移构仓房》，略云：“卜筑城南隅，数楹居之右。”（《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王鸣玉太学贻予黄菊》。

按：王鸣玉，即王轴。轴，字鸣玉，号去非。献臣表兄王道显长子，同安人。

是岁，作《送林栩庵司理征选》。

按：林栩庵，即林栋隆。已见。

是岁，作《奉寄林槐亭提学》。

按：林槐亭，即林祖述。已见。

是岁，作《陆伯生以诗笺见寄奉答》。

按：陆伯生，即陆应阳。已见。

是岁，南居益中丞平红夷，献臣作《南思受中丞平夷奏凯纪赠》四首，其一云：“海国波恬六十秋，红夷深入棹轻舟。垒坚彭岛分天堑，市乞三山踵粤州。乍出火攻为上策，还凭庙算伐狂谋。功成飞疏报明主，紫诰彤弓取次酬。”（《清白堂稿》卷十二下）又作《又南中丞平夷奏凯》。

是岁，黄克缵北上，献臣作《黄宫博钟梅应召》。

是岁，作《简劬思祥刑三载报最赋赠》。

按：简劬思，即简钦立。钦立，号劬思，江西新喻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时为泉州推官。官至吏部郎中。

是岁，为晋江田岩编作《〈田氏族谱〉后序》。

按：田岩，字景瞻，号南山。弘治六年（1493）进士，官至宝庆进士。

是岁，为林汝韶母刘氏作《林母刘氏七帙寿序》。

是岁，作《署邑何兰池二守寿序》。

按：何兰池，即何舜龄。舜龄（1566—1632），字廷水，号兰池，浙江临海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天启间，为泉州同知，署同安知县。

是岁，蔡复一卒于贵州军中，弟复心往迎其柩，献臣为作《送蔡仁夫往迎令兄司马归槨》。

是岁，作《赠丰城游肖川堪舆序》。

按：丰城游肖川精于堪舆，挟技游漳，过同安，为陈基虞、康尔韞、刘梦潮诸家营吉，独造精微。

是岁，作《与邹南皋公子》。

按：邹南皋公子，邹元标子。此书云元标卒于去岁。

是岁，作《与黄钟梅宫傅书》。

是岁，作《答南二泰抚院馈别》。

是岁，作《答蒋恂庵安溪令》《赠蒋恂庵安溪令》。

按：蒋恂庵，即蒋自华。自华，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举人，天启间为数溪知县。

是岁，作《送刘海若谒补》。

按：刘海若，即刘梦潮。已见。

是岁，作《曹方城令公》。

按：曹方城，即曹履泰。履泰，字德政，一字大来，号方城，盐官（今浙江海盐）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同年冬任同安知县。

是岁，作《刘长公肖沂暨配孺人欧阳氏墓志铭》。

按：刘长公肖沂，即刘梦龙。梦龙（1537-1615），字国桢，同安人。

是岁，作《南户部主事林三庭公暨配黄孺人墓志铭》《合祭林三庭户部》。

按：林三庭，即林丛槐。从槐（1530-1599），字应昌，同安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南户部主事。

是岁，作《祭宫保总宪政邹南皋公文》。

按：邹南皋，即邹元标。已见。

是岁，作《祭林璞所侍御文》。

按：林璞所，即林一柱。一柱，字廷郢，号璞所，同安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到广东参政。

## 天启六年丙寅（1626） 六十四岁

是岁，推南奉常，未果，作《推南奉当得门户闲住旨有作》四首，其四：“泪落汉人党锢书，千秋孟博意何如。生平漫道不为恶，总值清朝网结疏。”（《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秋，母诞辰，作《丙寅秋老母诞辰王春和兄有歌为寿云多得吕仙之助》。

九月，八日，同张廷拱过僧舍，作《丙寅八日同张尚宰过牛皮山僧舍》。

是岁，张廷拱年六十，献臣为作《寿张尚宰廷尉六十》，略云：“令子弱冠上公车，伯仲联翩向天衢。稚儿未树托丈峰，多藉提携迪其愚。今公献岁登六十，齿发精神壮不如。我嗟迟暮成老丑，止有棋酒未全疏。”（《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按：据诗，廷廷拱子已成举人，故得以上公车。

九月，九日，作《推南奉常得门户闲住旨有作》四首，其一云：“不知门户向谁氏，圣主恩深肇锡名。漫把衣冠夸野老，已拚蓑笠事春耕。”（《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按：蔡献臣被推南京太常寺少卿，受阻于魏瑄，再次闲住。

九月，作《门户叹》四首，其二云：“是党非耶唯与阿，仁贤堪惜尽消磨。由来此说空人国，幸不汉唐起内戈。”（《清白堂稿》卷十二下）又作《原党四绝》。

十二月，作《丙寅除夕作》。

是岁，作《贞松篇赠大司空林省庵》。

按：林省庵，即林学曾。已见。

是岁，复一弟复心扶复一棹归里，献臣作《挽蔡敬夫总督三首》《祭司马总督蔡元履文》《邑绅会奠蔡元履总督文》等诗文祭吊之。

是岁，作《司马总督蔡元履公正气祠引》。

是岁，为曹履泰作《同安曹侯德政颂言序》《曹方城邑侯〈近稿〉叙》《曹方城令公寿序》《曹方城令公赠言》。

是岁，作《书戊午天台试士图》，略云：“万历戊午，献臣以初夏定科天台。盖距吾祖兼峰公佐郡时六十载矣。其城中有巾山二焉，而塔其颠，适供事典幕邓文光者，南铨旧椽也，雅善丹青，辄令图之。越今丙寅，乃张诸堂而题以纪。”（《清白堂稿》卷七）

是岁，作《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铕城议》。

是岁，作《下四场增课议代何二守》《下四场裁盐场官议》。

是岁，作《与杨修龄滇抚丙寅》，以为中珰为政，与汉党勉鞫、宋元佑碑、南宋江之伪学不异。

按：杨修龄，即杨鹤。鹤（？-1635），字侯龄，嗣昌父，武陵（今属湖南）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

是岁，作《与朱如容抚台》，自叙盐籍而祖居浯洲，建议除浯洲盐场官，建料罗铕城。

按：朱如容，即朱钦祖。钦祖，字如容，泰兴（今属江苏）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时为福建巡抚。

是岁，作《与冯揭阳令邺仙》，以为“漳、泉之民，仰粟东粤，无论凶岁，即丰岁犹然”（《清白堂稿》卷十）。

按：冯揭阳令邺仙，即冯元飙。飙（？-1644），字尔弢，号邺仙，浙江慈溪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广东揭阳知县，官至兵部尚书。

是岁，作《祭一嫂许孺人文》。

按：许孺人（1643-1626），献臣堂兄蔡献鲁妇。

## 天启七年丁卯（1627） 六十五岁

二月，为同安知县曹履泰作《曹大来明府春仲采民言为歌》。

秋，咏菊明其志。作《丁卯秋对菊》，略云：“温陵故吾土，秋来更苦热……所贵固穷者，志不在哺啜。落英如可餐，岁寒保明哲。”（《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九月，八日、九日，泛舟出海，作《重阳前一日董水桥头泛小艇出海》；又作《丙寅重阳日望洋庵作》。

秋、冬间，蒋元实北上应举南雍，献臣作《蒋元实任子应举南畿》。

按：蒋蓐，字符实，一字元实，蒋孟育长子，金门人，龙溪籍。国子生。

是岁，作《送简劬思祥刑入郎仪部》。

按：简劬思，即简钦立。

是岁，作《送漳汪鹤屿归新安》。

按：汪鹤屿，即汪康谣。康谣，字淡衷，号鹤屿，安徽休宁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时为漳州知府，官至福宁分巡道。

是岁，作《送沈汉阳郡守擢宪粤西》。

按：沈汉阳，即沈楚翹。楚翹，以字行，号汉阳，浙江慈溪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时为泉州知府。

是岁，作《送周爱日选郎入都》。

按：周爱日，即周家椿。家椿，号爱日，同安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文选郎中。是岁，池显方北上会试，献臣作《送池直夫孝廉上公车》。

是岁，作《海上贼叹》。

是岁，访同安朱子祠，苏浚与许獬都曾经读书于此，作《雨中访友朱文公祠祠为苏紫溪许钟斗读书处上房僧舍予旧栖也》。

是岁，作《题林混中兵书》。

按：林混中，漳浦人。平日喜言兵。

是岁，作《明隐君吴仁斋墓志铭》。

按：吴仁斋，即吴达一。达一（1545-1613），字仁斋，同安人。

是岁，侄蔡国光乡试第六名。

按：蔡国光，字士观，号观之，改贲服。琼林十七世，大厝房。卒于清康熙间，年八十三。

是岁，叶向高卒，为作《合祭师叶台翁文》。

是岁，张于垒卒，年十八。

按：张于垒（1610-1628）<sup>①</sup>，字凯甫，早慧，号神童。有《凯甫集》。

是岁，作《祭王表嫂黄恭人文》。

按：黄恭人，献臣表兄王道显妇。

## 明毅宗朱由检崇祯元年戊辰（1628） 六十六岁

正月，元日，作《戊辰元日试笔》。

春，复推南京太常寺少卿，再受阻。

九月，母黄太淑人卒，年八十八。

是岁，作《海道周际五擢宪江右赋送》。

按：周际五，即周应期。应期（1586-1664），字克昌，号际五，浙江永嘉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都察院右都御使。

是岁，蔡复一下葬，献臣作《哀蔡敬夫大葬》。

是岁，作《赠武昌府推官东濂李公暨配赠孺人林氏封太孺人林氏墓志铭》。

按：东濂李公，即李霖慰。霖慰，字于用，号东濂，同安人。因子献可贵，封武昌府推官。

是岁，闻戴燦卒（按燦卒于去岁），为作《挽戴亨融廉宪》二首。

是岁，作《祭胡拱柱参政》。

按：胡拱柱，字良甫，号拱柱，同安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

是岁，作《祭长婿丁亨中文》。

按：丁亨中，即丁启汴。已见。

是岁，作《祭陈恭人亲姆文》。

## 崇祯二年己巳（1629） 六十七岁

夏，病疽。

是岁，张廷拱起大理寺丞，献臣作《送张尚宰起大理寺丞还朝》。

是岁，张燮赠张于垒《凯甫集》，献臣作《张绍和贻予〈凯甫集〉答之》。

<sup>①</sup> 张于垒卒于崇祯二年丁卯十二月，公历已入1628年。

是岁，作《清宪蔡公〈遁庵全集〉序》。

按：蔡复一谥清宪。

是岁，作《赠陈止止先生》，题下自注：“止止为杨复所先师总角交，时年八十八矣。”

按：陈止止，俗名陈贞言。贞言（1542-?），字正智，号仰石。泉州人。精于禅学。

是岁，作《送张尚宰起大理寺丞还朝》。

按：张尚宰，即张廷拱。已见。

是岁，作《送黄元眉侍御巡方川陕》。

按：黄元眉，即黄其晟。其晟，初名芝仲，号元眉，同安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吏部南宁道。

是岁，为陈贞言作《陈止止〈东山法言〉序》。

按：《东山法言》，池显方编，为止止演法之记录。

是岁，作《苏文所八十六翁》。

按：隐公苏文所，即苏思义。已见。

是岁，为刘梦驹作《〈刘国成遗集〉序》。

按：刘国成，即刘梦驹。梦驹（1553-1603），号应南，同安县人。诸生。古文远慕班、马，近喜李攀龙。蔡献臣尝为之作《墓志铭》。

又按：《刘国成遗集》，即《天马更生集》。

是岁，丁启浚年六十一，为作《少司寇丁哲初公六十一初度序》。

按：此序称丁启浚与林学曾、张维枢并称为“温陵三公”。

是岁，作《修造芑溪石桥募疏》。

按：芑溪桥，在同安县，今在厦门市集美区辖境内。

是岁，作《与熊抚台请援师公书己巳》，以为中左所为泉、漳之要冲。

按：熊抚台，即熊文灿。文灿（?-1640），字心开，四川泸州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时为福建巡抚，官至兵部尚书。

是岁，作《与周挹斋少宗伯》。

按：周挹斋，即周延儒。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今属江苏）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会元、状元。官至礼部侍郎。

是岁，作《邑文学乡宾吕东浯暨配陈孺人墓志铭》。

按：吕东浯，即吕诚源。诚源，字以渐，同安浯洲人。诸生，喜经书古文。

是岁，长孙思鞠卒，为作《冢孙思鞠二七祭文》。

按：蔡思鞠，即蔡有则。有则（1612-1629），字思鞠，献臣次子甘光之长子。献臣长子谦光无子，故有则为冢孙。

## 崇祯三年庚午（1630） 六十八岁

正月，展墓董水，作《开岁自董水归》。

春，豪山祈雨，作《庚午豪山祈雨文》《豪山谢雨文》。

秋，同安豪雨，溪水瀑涨，桥尽圯。



是岁，作《送宪伯蔡五岳告归》。

按：蔡五岳，即蔡善继。善继，字五岳，一字伯达，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时任福建布政使。

是岁，作《送曹方城令公入覲》。

按：曹方城，即曹履泰。

是岁，侄蔡国光北上会试，为作《送士观侄赴公车》。

是岁，作《送客部刘国壮还朝》。

按：刘国壮，即刘梦潮。梦潮，字国壮，号海若，梦驹弟，同安人。万历四十七年（1519）进士，官至广西副使。

是岁，作《送邑丞汪观我擢绍兴参军》。

按：汪光我，即汪国光，崇祯间为同安县丞。

是岁，龙溪为张于垒建幼清祠，献臣为作《寄张凯甫幼清祠》。

是岁，王志道还朝，为作《送王而弘少廷尉还朝》。

按：王志道（1574-1646），字而弘，号东里，漳浦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至吏部郎。蔡献臣卒后，王志道为《清白堂稿》撰序。

是岁，作《北望》二首，其一略云：“闽海黔山露布飞，东西二虏逼京畿。”（《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是岁，为黄一龙作《黄鳞伯侍御《〈延露编〉序》》。

是岁，为林应翔作《甘不林〈止崑存稿〉序》。

按：《止崑存稿》，林应翔著。应翔，已见。

是岁，为内弟池显方作《池直夫〈淡远诗〉序》。

是岁，为同安邑人所编作《〈曹方城令同政录〉序》。

按：曹方城，即同安知县曹履泰。

是岁，作《右方伯来槎庵公寿序》。

按：来槎庵公，即来斯行。斯行（1567-1634），字道之，号马湖，又号槎庵，浙江萧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福建右布政使。

是岁，作《〈重新乐圃公祠堂簿〉引》。

按：乐圃公，即蔡一莲。一莲，字爱仲，号乐圃。琼林蔡氏六世，新仓房之始祖。

是岁，作《重修万安五显庙并第二桥募疏》。

按：五显庙，即五显宫，在同安县。

是岁，作《葺新同山五显灵宫募缘疏》。

按：同山，即梅山，在同安县。

是岁，苏茂相卒，作《挽少传尚书苏石水》。

是岁，作《徐州学正陈溪南先生暨配孺人吴氏墓志铭》。

按：陈溪南，即陈愈嘉。愈嘉（1545-1630），字曰猷，号礼泉，改号溪南，浙江海宁人。历嘉善训导、山阴教谕、徐州学正。献臣曾从其学经。

是岁，作《隐公苏文所公暨配张孺人墓志铭》。

按：隐公苏文所，即苏思义。已见。

是岁，作《南京户部郎中李质所暨配杨宜人墓志铭》。

按：李质所，即李简文。已见。

是岁，作《刑部山西司主事恂所蔡公暨配陈氏墓志铭》。

按：恂所蔡公，即蔡鼎臣。已见。

### 崇祯四年辛未（1631） 六十九岁

十月，作《仲冬丰庄居》。

是岁，内弟池显京中察，归闽，眼疾，寓居建州。作《池致夫侨寓建州寄此招之辛未》。

十二月，作《壬申寿吕翠盘九十以元日初度》《岁暮自吟》。

是岁，作《登南庵石亭》。

按：石亭，在同安浯洲，即俞大猷啸卧亭。

是岁，作《送陈白南太仓赴京谒补》。

按：陈白南，即陈如松。如松，字白南，同安翔安里人。万历十年（1582）举人，官至仓州知府。

是岁，作《送海道徐鲁人擢宪山东》。

按：徐鲁人，即徐日久。日久（1580-1631），字子卿，号鲁人，浙江西安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时为福建按察副使、分巡海道。

是岁，作《读威宁伯〈王襄敏公集〉》。

按：王襄敏，即王越。越（1426-1499）<sup>①</sup>，初名王悦，字世昌，浚县（今属河南）人。景泰二年（1451），官至兵部尚书，以功封威宁伯，谥襄敏，有《王襄敏公集》。

是岁，作《赠郡守王壮其擢兴泉宪》。

按：王壮其，即王猷。猷（1582-1631），字胤方，号壮其，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时为泉州知府，擢兴泉道副使。

是岁，作《口占赠大嶝寨行脚仙》。

是岁，为同安知县熊汝霖作《雨殷熊进士〈新义〉序》。

是岁，为侄蔡国光作《题土观侄〈恢奇斋新艺〉》。

是岁，作《辛未太武岩门堂僧舍募疏》。

按：太武岩，指海印寺。在同安县浯洲太武山。

是岁，何乔远卒。

是岁，作《处士少桂蔡君墓志铭》。

按：少桂蔡君，即蔡绍英。已见。

### 崇祯五年壬申（1632） 七十岁

正月，闻何乔远卒，作《哭少司空何稚孝先生四首》。

按：何乔远卒于去岁逼除，诗作于今岁正月。

二月，诞辰，作《七十书怀》，略云：“蓼莪情事终天在，白首行藏与世违。为语少年三立士，

<sup>①</sup> 王越卒于弘治十一年（1498）十二月一日，公历已入1499年。

日车莫假鲁阳挥。”

是岁，作《与黄毅庵大宗伯》，以为今举子之业，意不遵经传。

按：黄毅庵，即黄汝良。汝良（1554-1647），字名起，号毅庵，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夏，作《壬申夏海警》。

秋，作《秋夜宿龟窑》。

是岁，往安溪县，作《安溪往还》。

是岁，作《送陈伯武之南京刑垣》。

按：陈伯武，即陈昌文。昌文（1585-1636），字清时，号伯武，同安浯洲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吏部给事中。

是岁，张燮年六十，为作《赠张绍和六十》；又作《张绍和自号逸民贻诗赋答》。

是岁，作《〈豪山康氏重修族谱〉序》。

按：豪山，在同安县，离县城二十里。

是岁，作《许敦夫制义序》。

按：许钺，字敦夫，许獬次子。

是岁或次岁，作《题林鳞伯〈静观斋舞制义〉》。

按：林鳞伯，林应翔子，同安人。

是岁，作《寿熊雨殷令公序》。

按：熊雨殷，即熊汝霖。已见。

是岁，作《重兴同安安福岩募疏》。

是岁，作《与叶慕同学台》。

按：叶慕同，即叶成章。成章，字国文，号慕同，同安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大理寺卿。

是岁，作《与林栩庵侍御》。

是岁，作《邑文学国成刘君暨配孺人黄氏墓志铭》。

按：国成刘君，即刘梦骅。已见。

是岁，作《公祭陈对墀揭阳文》。

按：陈对墀，即陈则采。则采（1564-1632），号对墀，同安县嘉禾屿人。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历应城知县、揭阳知县。

是岁，作《祭少司空张玄中年兄文》。

按：张玄中，即张维枢。维枢，字子环，号玄中（又作贤中），晋江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

## 崇祯六年癸酉（1633） 七十一岁

春，父贵易讳日，作《廉宪府君讳日》，题下自注：“乙未秋仲违膝，丁酉春仲闻讣，今癸酉春。”

是岁，作《赠莆阳写真黄章甫》。

是岁，作《论澎湖戍兵不可撤》。

是岁，作《题罔卿李瑞和〈近稿〉》。

按：李瑞和，即李叔元，字瑞和，晋江人。万历二十年（1612）进士，官至太仆寺卿。

是岁，作《〈四稽斋稿〉题词》。

按：《四稽斋稿》，陈观泰著。观泰，字允雅，号上庵，同安浯洲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入清后为封仪知县。

是岁，作《重建和尚桥记》。

按：和尚桥，在同安县城西。

是岁，作《书苏氏嗣嫡公议》。

按：苏浚为献臣导师，有三子，长焕中，次燮中，三煌中。燮中为嫡，早卒。公议以焕次子伯墀为燮中之后。

是岁，作《重修马巷通利庙募疏》。

按：马巷，属同安。

是岁，作《赠浦江知县苏新郭暨张黄二孺人墓志铭》。

按：苏新郭，即苏震亨。震亨（1539-1599），字君仁，号新郭，同安人。以子国翰贵，封吉安同知。

是岁，作《诰封淑人蔡母许氏合葬墓志铭》。

按：蔡母许氏（1554-1631），蔡守愚配。

是岁，亲翁张廷拱卒，作《祭张辅吾中丞亲翁文》。

是岁，作《祭鄞林槐亭》。

按：林槐亭，即林祖述。已见。

## 崇祯七年甲戌（1634） 七十二岁

正月，初七日、初八日，同安雪，作《甲戌春日飞雪》二首，其一略云：“头白何曾见雪飞，轮山春入雪霏微。”其二略云：“曾望远山轻积雪，溪成谷日雪飘飘。”（《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五月，下葬母黄太淑人于董水，同时移葬父易贵、叶淑人于此。叶居左，黄居右。学光岳丈丁启浚为黄氏作《墓志铭》，蔡献臣立石、孙和书。

是岁，作《论诗赋经义》，略云：“郁郁诗赋与经义，皇家取士必须工。义闾圣贤之名理，诗写情事之襟胸。本根枝叶虽有间，八股八律将无同。更有命题长与枯，亦与歌行涩韵通。”（《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送安溪许箕颖令君应召》。

按：许箕颖，即许自表，安溪知县。

是岁，作《贺周爱日选郎举子》。

按：周爱日，即周家椿。已见。

是岁，为同安知县熊汝霖作《赠熊梦泽明府报满》。

是岁，侄蔡国光成进士。

是岁，为侄蔡国光作《题士观侄〈恢奇斋新艺〉》。是岁，为陈基虞年作《寿宪副陈宾门亲翁七十序》《寿陈宾门宪副七十》。

是岁，作《熊邑侯重修西安桥记》。

按：西安桥，在同安县南，为漳、泉通道。北宋许宜建。

是岁，作《香山岩新佛象马僧舍募疏》。

按：香山岩，在同安县。

是岁，作《重新雪山岩募缘疏》。

按：雪山岩，在同安县。

是岁，作《署漳郡曹秋水节推公寿序》

按：曹秋水，会稽人。莆田推官，署漳州知府。

是岁，作《与林省庵公子》。

是岁，作《答戈臣在晋江》。

按：戈臣在，即戈简。简，广德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晋江知县。

是岁，作《王日近暨配陈孺人墓志铭》。

按：王日近，即王道照。已见。

是岁，作《安宁州知州郭旭东暨配李孺人墓志铭》。

按：郭旭东，即郭日烜。已见。

是岁，作《祭大司徒林省庵年兄》。

按：林省庵，即林学曾。已见。

是岁，作《祭方伯慈溪袁文海公文》。

按：袁文海，即袁茂英。已见。

是岁，作《祭九十一寿慈俭林伯母文》。

按：林伯母，蔡献臣母。

### 崇祯八年乙亥（1635） 七十三岁

五月，作《乙亥仲夏田居写怀》，略云：“伊予少称诗，亦漫矢口成。此业久谢罢，间作苦吟声。时艺与子史，更复室灵明。”（《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作《赠陈应萃七十》。

按：陈应萃，即陈文瑞。文瑞，字应萃，号同凡，同安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吴县知县。

是岁，侄蔡国光赴京谒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知县。献臣作《送士观侄赴部谒选乙亥》，略云：“观侄吾宗秀，少小童而仙。省试占高魁，赐第正强年。”（《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是岁，张燮在龙溪建万石山房。为作《题张绍和万石山房》。

是岁，作《送颜吏垣入都》。

按：颜继祖（？-1640），字绳其，号同兰，龙溪（今漳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时官都御史，官至山东巡抚。

是岁，林焯应召北上，为作《送少宗伯林鹤台应召》。

按：林焯（？-1636），字实甫，号鹤台，同安浯洲人，龙溪籍。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廷试一甲第三名。拜东阁大学士。

是岁，作《曾二云少参两推楚蜀未俞更喜题留赋赠》。

按：曾二云，即曾樱。樱，字仲含，号二云，江西峡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曾任泉兴道、福宁道，官至工部侍郎。

是岁，作《送陈伯武给谏还朝》。

按：陈伯武，即陈昌文。已见。

是岁，作《李东明公白鹤山存稿序》。

按：李东明，即李春芳。春芳，字实夫，号东明。同安县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举人，九年（1550）进士。官至潮州知府。

是岁，作《寿陈同凡七十初度》。

按：陈同凡，即陈文瑞。已见。

是岁，作《与沈苍屿比部》。

按：沈苍屿，即沈胤培。胤培（1599-1656），一作允培，原名竣卿，字君厚，号苍屿，浙江归安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弘光朝官至大理寺少卿。

是岁，作《寿林平华七帙》。

按：林平华，即林宰。宰，字德衡，号平华。漳浦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是岁，作《答林平华》。

是岁，作《祭休谟弟文》，略云：“予与汝生同年，幼同师，长同学，相亲如同父。”（《清白堂稿》卷十六）

按：休谟弟，即献臣堂弟蔡鼎臣。已见。

## 崇祯九年丙子（1636） 七十四岁

秋，次子甘光、四子毓光乡试，落第。

是岁，王志道年六十三，为作《寿东里中丞六十三》。

是岁，作《〈熊令公同政录〉序》《送熊梦泽明府入觐》。

按：熊令公，即熊汝霖，字梦泽，号雨殷，余姚（今属浙江）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同安知县。

是岁，作《贺熊雨殷邑侯奏最地恩序》。

是岁，过福州，黄非骊孝廉出其制义示蔡献臣，献臣为作《黄非骊孝廉〈复草〉序》。

按：黄非骊，福州人，举人。

是岁，作《题郭德周〈松风轩草〉》。

按：郭德周，蔡献臣侄孙蔡斤受业之师。

是岁，作《〈瑞树篇〉为德化姚若麓令公赋》。

按：姚若麓，即姚迟。迟，号若麓，浙江秀水人。举人。崇祯间为德化知县。

是岁，作《祭左司寇丁哲初亲翁文》。

按：丁哲初，即丁启浚。已见。

是岁，作《祭陈佩韦秀才襟丈文》。

按：陈佩韦，同安人。池浴德婿。

是岁，作《祭吏部给事陈伯武文》。

按：陈伯武，即陈昌文。已见。

是岁，七月八日，长儿谦光卒，年五十二。献臣为作《亡儿谦光哀词》，略云：“少壮应举，业虽未成，而中岁以后，结社称诗，种花养鱼，亦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生平临财极严，毋务苟得，故遗嗣孙龄者，仅一室一园，及二三文房器用，颇觉工致。”（《清白堂稿》卷十六）

按：谦光娶参政林汝韶女（1586-1604），继娶中丞傅镇孙庠生兆榜女。

## 崇祯十年丁丑（1637） 七十五岁

是岁，作《送邑丞徐蹇庵擢去》。

按：徐蹇庵，即徐来秀，崇祯间任同安县丞。

是岁，作《送区长泽祥刑署同还郡》，略云：“五羊才子占魁名，六载刺桐祥理声。”（《清白堂稿》卷十二下）。

按：区长泽，即区联芳。联芳，字长泽，广东新会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任泉州推官六年。

是岁，作《黄逸所公〈海眼存集〉序》。

按：黄逸所，即黄伟。伟，字孟伟，号逸所，同安浯洲（今金门县）人。正德五年（1510）举人，九年（1514）进士。官至松江知府。

是岁，作《题区罗阳〈四书翼〉》。

按：区罗阳，即区大伦。大伦（？-1628），字孝先，广东佛山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

是岁，作《丁丑重修太武岩募疏》。

是岁，作《同山寺中元普度募疏》。

按：同山寺，即梅山寺，在同安梅山。

是岁，作《修补董水通济桥公募疏》。

按：董水通济桥，在同安县，今在厦门市翔安区辖境内。

是岁，作《答刘干所提学》，以为戊子、己丑之前制义文体尚淳。

按：刘干学，即刘鳞长（1598-1661），字孟龙，号干学，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唐王朝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是岁，作《与章格庵户科》，以为今海宇多故，夷贼交讐。

按：章格庵，即章正宸。正宸（？-1646），官羽侯，号格庵，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户科给事中。

是岁，作《与冯留仙》。

按：冯留仙，即冯元扬。已见。

是岁，作《王念斋暨配叶孺人墓志铭》。

按：王念斋，即王道蒸。道蒸（1552-1585），字念甫，号念斋，道显同祖弟，同安人。诸生。与献臣连墙而居。

是岁，作《功伯蔡尔远尔实公暨配合葬墓志铭》。

按：蔡尔远，即蔡贵毅。贵毅，字尔远，献臣叔祖宗达长子，同安人。蔡尔实，即蔡贵恒。贵

恒，字尔实，献臣叔祖宗达次子。

是岁，作《明封孺人陈室叶氏墓志铭》。

按：孺人陈室（1568-1629），陈文瑞配，同安人。

是岁，作《公奠大参洪春寰公祭文》。

按：洪春寰，即洪有助（1557-1637），字春寰，福建同安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郎署、衢州郡守，藩臬粤东。

是岁，孙蔡龄卒，作《哭仲朋孙二七文》。

按：献臣长子谦光无子，以次子甘光子蔡龄为其嗣。龄（？-1637），字仲朋。

### 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 七十六岁

是岁，作《送叶国文学御入都》。

按：叶国文，即叶成章，字国文，号慕同，同安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至大理寺卿。

是岁，作《题熊梦泽邑侯生祠》。

按：熊梦泽，即熊汝霖。已见。

是岁，作《题陈季和古庄书室》。

按：陈季和，疑为同安人。俟考。

是岁，作《蒋仲旭〈伐檀草〉序》。

按：蒋仲旭，即蒋升。升，字仲旭，孟育之子，同安浯洲人，龙溪籍。

又按：此序论弘治、正德以来制义文三变。

是岁，作《与吴旭海新令君》。

按：吴旭海，即吴应恂。应恂，字旭海，宜兴（今属江苏）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时任同安知县。

是岁，作《与周芮公吏部》。

是岁，作《山西参政祀乡贤林玉吾既配封宜人九十六寿慈安叶氏墓志铭》。

按：林玉吾，即林玉材。已见。

###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 七十七岁

是岁，作《题文元卢海韵制义》。

是岁，为张廷拱达宜人作《张中丞达宜人七帙寿序》。

按：据此序，同安县大嶝科甲自张廷拱始。

是岁，作《小盈岭观音庵亭募缘疏》。

按：小盈岭，在同安县，旧为同安县与南安县的分界岭。

是岁，黄景昉赠诗，作《与黄东厓翰林》。

按：黄东厓，即黄景昉。已见。

是岁，作《与关耐庵海道公书》，以为“闽南山海多，阡陌少，自洋禁严，民无生路。”（《清白堂稿》卷十）

按：关耐庵，即关引之。引之，字颀绵，当涂（今属安徽）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时为



福建巡海参道。

是岁，作《太学生池三洲翁暨配李孺人墓志铭》。

按：池三洲，即池浴沂。浴沂（1542-1634），字士洁，浴德弟，同安嘉禾屿人。国子生。

是岁，董应举卒。

###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 七十八岁

是岁，同安知县曹履泰，诞辰，为作《南山赓祝有序》。

是岁，作《同绅贩洋议答署府姜节推公庚辰》，以为“夫闽南福、兴、泉、漳四郡，其地滨海，其山海多而田地少，故糊口必资于余粤，而生计必藉于贩洋。”（《清白堂稿》卷十）

按：姜节推，即姜应龙。应龙，浙江余姚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时为泉州推官，署泉州府。

是岁，卢若腾成进士。

是岁，张燮卒。

### 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 七十九岁

九月，卒。

### 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 歿后一年

是岁，赠常卿，晋赠刑部右侍郎，荫一子。钦锡祭葬，三院批允建坊，特祠学宫，春秋二祭。

是岁，王志道为《清白堂稿》撰序。《清白堂稿》当刊刻于此岁。

### 崇祯十七年甲申、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1644） 歿后三年

二月，望日，池显方为蔡谦光撰《明太学生蔡君哀卿墓志铭》。

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

# 朱熹高足陈淳与傅伯成、傅壅父子交往考

刘 涛

(福建省长泰县政协文史委, 福建 长泰 363900)

**摘 要:** 陈淳与傅伯成、傅壅均有交往, 陈淳曾上书傅壅。陈淳祈雨龙溪天宝山之神、提出应对海盗的策略、论述漳州妈祖信仰与其香洲故里的社会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反映了其水上人的历史文化渊源。长泰“五山”诗句实指长泰威泽庙所奉的神明。将“温陵市舶连甍富饶之地”与“漳民无大经商, 衣食甚艰”相提并论, 反映了陈淳对泉州刺桐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认知。

**关键词:** 陈淳; 傅伯成; 傅壅; 漳州知州; 历史情境

目前学术界在陈淳与傅伯成交往的研究上, 取得了一定成果, 如能围绕陈淳与傅伯成的上书与诗文唱和, 进而探讨陈淳的思想。但是当前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未发现陈淳与傅壅存在交往。又如陈淳早期思想的研究仍停留在既有的陈淳首见朱熹的文本记载阶段, 而实际上, 朱熹与傅伯成及其兄傅伯寿、子傅壅先后出知漳州, 他们探索治漳举措的经历事迹等对陈淳有较大影响。陈淳与傅伯成、傅壅父子的交往长期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陈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关系尚属研究空白。本文将在搜集、整理相关文集、族谱、碑铭、田野考察所得资料的基础上, 借鉴人类学与民族学、宗教学、海洋史等多学科研究成果, 回到历史现场揭示陈淳与“傅寺丞”“傅侍郎”交往的相关史料背后的历史情境, 以期为新时期朱熹、陈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推动朱熹与陈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一、陈淳与傅伯成、傅壅的交往

### (一) 陈淳曾上书的“傅寺丞”不仅是傅伯成, 也包括其子傅壅

据陈淳《北溪大全集》, 陈淳有题诗作文“傅侍郎”“傅寺丞”多篇。历来论者多以傅伯成曾任太府寺丞而认为“傅侍郎”“傅寺丞”就是傅伯成。

然据《上傳寺丞论学粮》所载:“前郡守傅枢、傅侍郎、俞监簿、庄侍郎、赵寺丞诸公屡拨废院田添助学粮。”<sup>①</sup>由“前郡守”, 可知在“傅寺丞”之前, 有“傅枢、傅侍郎”。按此“郡守”即漳州知州。据《漳州府志》, 傅伯寿及其弟傅伯成、傅伯成之子傅壅曾先后出任漳州知州。傅伯寿, “以朝请大夫来知, 淳熙十五年到, 拨田赡学”<sup>②</sup>, 傅伯寿弟傅伯成“以朝散大夫来知, 庆元三年三月到, 有传”<sup>③</sup>, 傅伯成长子傅壅“以朝奉郎来知, 嘉定十二年到”<sup>④</sup>。傅伯成之父傅自得曾两次被授予漳

**作者简介:** 刘涛, 男, 福建省长泰县政协文史委文史员,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员。

①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六《礼》,《钦定四库全书》集部,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据明弘治庚戌(1490)刻本, 第10页。以下出自该文集者皆仅注页码。

② [明]陈洪谟: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07页。以下出自该志者皆仅注页码。

③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 第108页。

④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 第109页。

州知州，但是查历代版本的《漳州府志》均为未见其任职记载，比对其传记内容可知其均未到任。且傅自得未曾任职枢密院与侍郎等职，因此“傅寺丞”非指傅自得。

按傅伯寿曾任签书枢密院事，此“傅枢”即指傅伯寿。傅伯成曾任工部侍郎，此“傅侍郎”即指傅伯成。由此可知，此“傅寺丞”即傅伯成长子傅壅。俞亨宗“以朝请郎来知（漳州），嘉泰三年到，有传”<sup>①</sup>，其曾任军器监簿，“俞监簿”即指俞亨宗。庄夏，“以朝请郎、直秘阁来知（漳州），嘉定六年到，有传”<sup>②</sup>，庄夏曾任兵部侍郎，“庄侍郎”即为庄夏。自傅伯寿至傅壅的二十任漳州知州中，有赵姓者两任，分别为“以朝请大夫来知，庆元元年，到，有传”<sup>③</sup>的赵伯遯与“以奉议郎来知，嘉定四年到，有传”<sup>④</sup>的赵汝说，赵汝说与陈淳有交，此“赵寺丞”即赵汝说。

上述漳州知州，其到任时间分别为淳熙十五年（1188）傅伯寿、庆元三年（1197）傅伯成、嘉泰三年（1203）俞亨宗、嘉定六年（1213）庄夏、嘉定四年（1211）赵汝说。对于嘉定十二年（1219）到任的傅壅而言，他们均为“前郡守”。且除了庄夏与赵汝说未按顺序排序外，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序。

由陈淳墓志铭所载其卒于“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可知，陈淳《上傳寺丞论学粮》之“傅寺丞”指的是傅壅，而非傅伯成。

按傅伯寿、傅伯成同为朱熹高足，同中进士，其父傅自得，与朱熹父朱松交，朱熹称为“傅丈”，为作行状。朱松又是傅伯成外祖父李邴门生。如此渊源，为朱熹诸门生中所罕见。从傅伯寿、傅伯成、傅壅三人自淳熙十五年至嘉定十六年（1188-1223）三十余年间先后担任漳州知州，傅自得又两次担任漳州知州，虽然未实际赴任，但从中可知傅伯成家族与漳州的渊源。

傅伯成是朱熹学生，在“庆元党禁”中被谪贬漳州，仍“推熹遗意而遵行之”<sup>⑤</sup>，在被贬期间仍坚持践行朱熹学说。其子傅壅虽非朱熹弟子，但作为朱熹高足之子，其在任漳州知州期间“治如其父，邦人安之”<sup>⑥</sup>，继承父志推行朱熹学说。也因此，陈淳会先后上书傅伯成与傅壅父子。

傅伯寿虽被斥为“考亭叛徒”<sup>⑦</sup>，但在其担任漳州知州期间以“拨田贍学”著称，可知其重视教育，践行、传承与发展了朱熹学说。

从中可见，傅伯成家族于漳州知州任上均矢志不渝推行朱熹学说，朱熹学说在漳州的深远影响与傅伯成及其兄傅伯寿、子傅壅的努力密不可分。

## （二）陈淳入朱熹门曾受到傅伯寿的影响

傅伯寿因“奴事韩侂胄、苏师旦，致身通显。伯成非其所为，每切责之。方伪学之禁，预草诏以诋善类，其草文公秘撰，告辞有大逊如‘慢’，小逊如‘伪’等语。文公没，伯寿适知建宁，又不以闻”<sup>⑧</sup>而被列为“考亭叛徒”。然考朱熹与韩侂胄、苏师旦生平，朱熹与韩侂胄分道扬镳于绍熙五年（1194），朱熹因此归居建阳，傅伯寿于此时投靠掌权的韩侂胄、苏师旦。“伪学之禁”，指“庆元党禁”，发生于庆元二年（1196）。傅伯寿淳熙十五年至绍熙元年（1188-1190）任漳州知州，朱熹于绍熙元年四月至绍熙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190-1191）任漳州知州。可知在傅伯寿、朱熹任漳州知州

①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第109页。

②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第109页。

③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第108页。

④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第109页。

⑤ [明]宋瑞仪撰、薛应旗重修：《考亭渊源录》卷十《傅伯成》，明隆庆己巳（1569）林润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1页。以下出自该书者皆仅注页码。

⑥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十七《人物·泉州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82页。以下出自该书者皆仅注页码。

⑦ 《考亭渊源录》目录，第9页。按傅伯寿被列为该书卷二十四，该卷备注有“此卷考亭叛徒”。

⑧ 《考亭渊源录》卷二十四《傅伯寿》，第3页。

在前，傅伯寿“奴事韩侂胄、苏师旦”、“其草文公秘撰”在后。

傅伯寿卒于1223年，陈淳上书傅壅应在嘉定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之间（1219-1223），虽然傅伯寿其时官居显位。但是陈淳书信中并未顾及傅伯寿颜面，而是从傅伯寿担任漳州知州的历史情境出发，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按陈淳在朱熹担任漳州知州期间拜见朱熹并入其门下，结合陈淳在朱熹病重期间冒着风险前往探视，聆听教诲，可知陈淳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与魄力。朱熹在卸任漳州知州之际有得一“安卿”之感，研究者多探讨朱熹对陈淳的影响，然则从傅伯寿及其与朱熹的世交渊源看，可知陈淳也受到了朱熹高足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傅伯寿曾被视为“考亭叛徒”，因此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朱熹与陈淳研究中未能正视傅伯寿、傅伯成、傅壅先后出任漳州知州的历史意义，忽视了其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 （三）陈淳曾与傅伯成相互砥砺

陈淳《和傅侍郎至临漳感旧十咏》第四首有“和访晦翁庐，已毁”<sup>①</sup>，按“和”，指唱和。“傅侍郎”，即傅伯成。“晦翁”，指朱熹，其号晦庵。“庐”，即朱熹在漳州的居所。“已毁”，可知其时朱熹故居已毁。该诗为陈淳与傅伯成一同探访朱熹在漳州的故居遗址的唱和之作。

按傅伯成与陈淳分别生于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绍兴二十九年（1159），二人相差十六岁。作为朱熹早年高足，又是世交之子的傅伯成，与朱熹晚年高足陈淳，在朱熹及其闽学被打成“伪学”之际，彼此唱和，实则相互砥砺。上述“已毁”，按朱熹于绍熙二年（1191）离任。至傅伯成庆元三年（1197）到任，仅距六年。不至于自然塌毁，实际上可能是年久失修，更有可能是在“庆元党禁”中被毁。

除此之外，陈淳的《上傳寺丞论释奠五条》提到了朱熹五次，如“按朱文公释奠申明”<sup>②</sup>“今宜依文公申明”<sup>③</sup>“惟晦庵先生在此”<sup>④</sup>“以晦庵先生为式”<sup>⑤</sup>“昔晦庵先生行礼”<sup>⑥</sup>等。陈淳上书因“庆元党禁”而被谪贬漳州的傅伯成，于一文中先后五次提及共同的恩师朱熹，可见陈淳赤诚之心、感人肺腑的师生情谊以及大无畏的勇气。也从中可见，陈淳与傅伯成的同门之情非同寻常。

## 二、陈淳与长泰的结缘

### （一）陈淳在傅壅知漳时代代理长泰主簿

学者以陈淳有诗《权长泰簿喜雨呈郑宰》《四月十八日喜雨再用前韵呈郑宰》《解职归题主簿轩壁》三首，又有《祷雨良岗山》，结合陈淳《别徐懋公赠言》的“嘉定壬午”即嘉定十五年（1222）落款，推论陈淳于此时代理长泰县主簿，并结合朱熹在长泰的题诗论及朱熹、陈淳之“过化”。

然而，根据漳州旧志收录的《天柱山记》：

长泰县天柱山，为临漳第一胜处……庆元戊午，乡邦侍郎傅公伯诚来莅漳郡，闻兹山名，访问事迹……今天柱，得傅公父子维持巨力，虽二公不及寓目，以写其登临景概之妙，然已足传远矣！<sup>⑦</sup>

“庆元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侍郎傅公伯诚”实则“侍郎傅公伯成”，“诚”为“成”字刊

①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律诗》，第3页。

②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礼》，第4页。

③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礼》，第4页。

④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礼》，第6页。

⑤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礼》，第6页。

⑥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礼》，第4页。

⑦ [明]罗青霄：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十四《长泰县·文翰志·记》，《明代方志选（三）》，明万历年（1573）刊刻本，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510页。以下出自该志者皆仅注页码。

行之误。由“得傅公父子维持巨力”，可知傅伯成及其子曾“巨力”“维持”长泰天柱山。按长泰县时属漳州。傅伯成有二子：傅壅、傅康。其中唯有傅壅担任漳州知州，为长泰父母官。按长泰天柱山，自“我宋崇宁三年道人杨虔诚”“开迹”后，历经“淳熙九年，僧法昌鼎新。嘉定己卯，道人契嘉募缘重修。嘉定己卯道人契嘉重建”，从中可知，北宋崇宁三年（1104）道人杨虔诚开山后，中间有淳熙九年（1182）僧人法昌改旗易帜，至“嘉定己卯”即嘉定十二年（1219）又迎来与开山祖师杨虔诚同为“道人”的契嘉重建。所谓“鼎新”，是佛教替代道教。而“重建”，又是道教对佛教的处理。嘉定十二年（1219），正是傅壅到任漳州知州之际。由契嘉又作“安溪道人”，可知其来自安溪县，与傅壅故里晋江县（今福建省晋江市）同属泉州管辖。安溪道人契嘉应因与傅壅同乡，沿着傅壅父辈傅伯成足迹，前往长泰天柱山“重建”。由宋徽宗自号道君皇帝，可知长泰天柱山的开山与复兴均与道教有关。作为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傅自得之子的傅伯成及其长子傅壅自然对此关注有加。

陈淳曾于嘉定丁丑（1217）之“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可知陈淳于嘉定戊寅（1218）被授予安溪县主簿，虽然实际上并未到任。

据傅壅的漳州知州继任郑昉“嘉定十六年到”<sup>①</sup>，可知傅壅最迟在嘉定十六年（1223），最早在嘉定十五年（1222）离任漳州。按陈淳在嘉定壬午（1222）曾经代理长泰主簿，可知其时漳州知州为傅壅，陈淳应是傅壅推荐而代理长泰主簿。

## （二）陈淳诗文长泰“五山”指长泰良岗山、董凤山、吴田山、鼓鸣山、天柱山

据陈淳《解职归题主簿轩壁》以“偶然寓兴五山阴”开篇。按“解职”之“主簿”，可知此主簿即陈淳代理之长泰县主簿。此“五山”，即长泰县境五座名山。长泰县有“威泽庙，在县西门外，宋县令林丙建。以祀良岗、董凤、吴田、鼓鸣、天柱五山之神。绍兴间赐额”<sup>②</sup>。

按“县令林丙”，正德漳州府志作“绍熙中年任”<sup>③</sup>，万历元年漳州府志考“绍熙二年任，《通志》误作绍兴”<sup>④</sup>，按此《通志》即刊行于弘治庚戌（1490）的《八闽通志》。从中可知，林丙于绍熙二年（1191）担任长泰县令。

“良岗”，即良岗山。“董凤”，即董凤山。“吴田”，即吴田山，又名曷山。“鼓鸣”，即鼓鸣山。“天柱”，即天柱山。“威泽庙”，又称“五仙祠”，陈淳所作“五山”即此五座名山。

由陈淳所述良岗山“能兴云致雨润泽群生有神灵在焉”<sup>⑤</sup>，可知良岗山因祷雨灵验。明代旧志载，良岗山以“岁旱祷雨即应”<sup>⑥</sup>著称，天柱山以“岁旱祷雨辄应”<sup>⑦</sup>与之齐名。鼓鸣山也有“每风雨晦冥，则闻鼓声”<sup>⑧</sup>的记载，可见鼓鸣山也以祷雨闻名。吴田山虽未有祷雨灵验的记载，但于长泰诸山中“其山最尖”<sup>⑨</sup>，也应与祷雨有关。由此可见，五山均与祷雨有关。所谓“威泽庙”即兴云布雨惠泽之意。林丙兴建威泽庙，其行为实际上就是陈淳所云“为民请命”<sup>⑩</sup>，祷雨本意为了农业。结合朱熹《劝农文》，可知林丙此举也是践行朱熹的兴农举措。由朱熹在绍熙二年（1191）四月二十七日卸任漳州知州，林丙很可能就是在朱熹担任漳州知州时出任长泰县令。

陈淳所作《祷雨良岗山》所述“从政郎、长泰县令郑焯谨遣佐官迪功郎、权主簿陈淳躬致香茶、

①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第109页。

②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二十四《长泰县·杂志·宫庙》，第518页。

③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三《历官志》，第154页。

④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卷二十四《长泰县·秩官志·历官》，第478页。

⑤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祝文》，第4页。

⑥ 《八闽通志》上册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长泰县·良岗山》，第148页。

⑦ 《八闽通志》上册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长泰县·天柱山》，第148页。

⑧ 《八闽通志》上册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长泰县·鼓鸣山》，第148页。

⑨ 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七《山川志·长泰县·天柱岩山》，第426页。

⑩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祝文》，第5页。

酒果之奠昭告于良岗山之神”<sup>①</sup>，实际上是陈淳继承朱熹兴农思想之举。按良岗山神位居威泽庙五位山神之首，陈淳因此前往祷雨。“仙”与道同，属于道教。虽然，陈淳对道教也有看法，但是，陈淳仍以祷雨为重。

### （三）傅伯成、傅壅父子祈雨长泰天柱山对陈淳曾产生影响

陈淳《贺傅寺丞喜雨二十六韵》云：

去冬九旬已喜雨，那意今春渴尤苦。自开正元越三月，生意全蛰不闯吐。阳威烈烈炽盛夏，田野熬熬剧焦金。新秧既长且干萎，播种无由可入土。农民望雨若倒垂，类叹天命我无所。太守念膺民命寄，如伤体肤痛心膂。奔祷山川社稷前，下及百祠靡不举……<sup>②</sup>

按傅伯成于庆元三年（1197）三月到任漳州知州。可知傅伯成下车伊始，即遇漳州大旱。此“奔祷山川社稷前”，即陈淳所作《祷山川代傅寺丞》。文载陈淳曾“具位敢以酒果醢之奠昭告于天宝山之神”<sup>③</sup>，按“天宝山”位于漳州龙溪县（今属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可知陈淳曾代傅伯成到天宝山祷告山神求雨。按天宝山祷雨灵验，结合天柱山“旧传道入杨虔诚学道天宝山，忽夜见灯明天柱土，遂移住此山”<sup>④</sup>，傅伯成在庆元戊午（1198）前往天柱山，也可能是为了祷雨。从陈淳所作“下及百祠靡不举”，结合威泽庙又名“五仙祠”可知，该祠也应名列“百祠”之列。或由“百祠”而推及五仙祠，即威泽庙。

天柱山屏风石摩崖石刻“天柱岩”为“宣和乙巳”即北宋宣和乙巳（1125）所刻，是目前所知长泰县境内最古老的摩崖石刻，由长泰县令蔡元璋勒、县丞萧迈书，可知其时，天柱山已为地方官府所关注。蔡元璋于此很可能也是为了祷雨。因此，至南宋绍熙二年（1191）长泰县令林丙将天柱山神与良岗山神等其他四位山神一同供奉在威泽庙。

天柱山又有一线泉春雨游岩摩崖石刻：“建安黄淳父以县事之暇，揖尉赵子充、揭阳丞黄公辰、潮阳柯南仲、陈惟永……绍熙壬子润下澗八日学生、槐婿赵垓待行。”<sup>⑤</sup>按“绍熙壬子”为绍熙三年（1192），“润下澗八日”即闰二月二十八日。按“黄淳父”即黄淳，时任长泰县令。“尉”即长泰太尉。由“揭阳”“潮阳”可知其时天柱山已成为闽粤名士聚会之地。在嘉泰年间之前，又有长泰县令李志甫为此题诗《一线泉》<sup>⑥</sup>。

傅伯成应从陈淳的龙溪天宝山之行出发，前往天柱山祷雨，其子傅壅，也因“治如其父”，也有祷雨天柱山之举。按良岗山神与天柱山神等五位山神合祀威泽庙，结合傅伯成、傅壅父子先后“过化”天柱山，陈淳对天柱山应有所知。

从林丙在嘉定十二年（1219）上书到任漳州知州的傅壅，以及来自安溪的道人契嘉，对陈淳应产生了一定影响。

## 三、陈淳的水上人历史文化渊源促进了其对海洋的认识

### （一）陈淳的祈雨之举推动了龙溪天宝山水上人的王化进程

龙溪天宝山得名，始自“宋时，山有明珠，夜飞入九龙江，为渔人所得，以贡，因名”<sup>⑦</sup>。“渔人”所得之“明珠”，当是水上人中的“珠蛋”，即以采珠为生。其与伐木的“木蛋”、过渡的“船户”

①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祝文》，第4页。

②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古诗》，第12-13页。

③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祝文》，第3页。

④ 《八闽通志》上册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长泰县·天柱山》，第148页。

⑤ 据笔者2017年9月28日田野考察抄录。

⑥ 据笔者2016年10月17日田野考察抄录。

⑦ 《八闽通志》上册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龙溪县·天宝山》，第148页。

共同组成水上人族群，通称“蜑”，南宋漳州知州刘克庄在《漳州谕蜑》中写作“蜑”，又名“泊水郎”“泊水婆”，也作“白水郎”“白水婆”，又作“晝家”。由此可见，天宝山因水上人贡珠而得名，实际上是水上人归于王化，接受编户的开始，是水上人上岸的反映，天宝山由此成为中央王朝的组成部分。其时天宝山已经成为了水上人的信仰胜地。

那么，天宝山接受王化之“宋时”具体为何时呢？虽然未见地方史志记载。但是从陈淳代傅伯成前往天宝山昭告祈雨的记载来看，其时天宝山已经接受王化。

从“九龙江”水上人以水为生来看，九龙江与天宝山也是密切相关。九龙江，“历代见宝珠辉莹其中而不可得，宋时渔人网得之。”<sup>①</sup>从“渔人网得”可知此“渔人”就是采珠为生的水上人。目前所见首部漳州府志引南宋淳祐三年（1243）的旧志记载：“《淳祐志》谓：大中祥符七年，邑民有丘颿（读之善切）者，于此江网鱼得珠一颗，围三寸七分，旁有七小珠，如七曜。郡守王冕表进于朝，因名州城北门曰‘贡珠’。”<sup>②</sup>从中可知，九龙江采珠的水上人在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接受王化，编户其民。天宝山的水上人接受编户应在九龙江水上人接受王化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之后。

另据弘治庚戌（1490）刊行的《八闽通志》：天宝山有“诸山皆祖于是”<sup>③</sup>之称，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始见“陈北溪以此山为郡治宗祖”<sup>④</sup>的记载，查陈淳《北溪大全集》，其所作《祷山川代傅寺丞文》云：“惟本山发脉行龙，结为州治，实郡宗祖，为漳之望。”<sup>⑤</sup>可见陈淳确有此文，并非附会。天宝山因被视为漳州诸山之祖而扬名海内，实则源于陈淳所云为漳州“宗祖”，陈淳认为天宝山、九龙江既然为水上人聚落，又为水上人信仰所在，因此被视为祈雨的场所所在。陈淳为此代傅伯成祈雨于“天宝山之神”<sup>⑥</sup>“九龙江之神”<sup>⑦</sup>。由此可见，因为有了陈淳的品题，天宝山由此跻身漳州名山大川之首，九龙江水神由此成为漳州祈雨所在。天宝山水上人接受王化，应在陈淳祈雨天宝山之际。陈淳是天宝山水上人接受王化的推动者。

按陈淳故里龙溪县香洲社（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朝阳镇石井行政村蓬洲自然村），从其地名“洲”来看，可知最初的地理面貌为岛屿，位于水边。又由香洲渡，可知香洲设有渡口，为过渡“船户”所在。根据水上人有族群标签的传统，因此，香洲社最初生活着水上人毋庸置疑。

由于水上人早已汉化，因此与汉族一样，不能从血缘上加以划分，而应从文化认同上加以区分。水上人早已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水上人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水上人文化加以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以及现实作用。

## （二）陈淳的水军建设之举促进了水上人的王化进程

陈淳《北溪大全集》有《与李推论海盗利害》一文。虽然该文为防御海盗之作，陈淳也未对“海盗”由来加以论述。但是从陈淳为漳州地方官府提出的计策，可知陈淳熟悉漳州船舶、对水道了如指掌，达到了知己知彼的程度，并超越一般的传统文人认知而熟悉水战。兹择其较具有代表性之处加以论述。

今为州司计者：一、宜急拣悍锐之率及选募重役军兵与海道作过之人约五百余额为水军；

又择骁勇出群之才分布诸船以将之，督习水战于南门外新桥之侧，日有课旬，有按月有阅而郡

①《八闽通志》上册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龙溪县·九龙江》，第145页。

②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七《山川志·龙溪县·九龙江》，第389—390页。

③《八闽通志》卷八《地理·山川·漳州府龙溪县·天宝山》，第144页。

④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上册卷七《山川志·龙溪县·天宝山》，第386页。

⑤[宋]陈淳：《祷山川代傅寺丞文》，《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祝文》，第3页。

⑥[宋]陈淳：《祷山川代傅寺丞文》，《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祝文》，第3页。

⑦[宋]陈淳：《祷山川代傅寺丞文》，《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九《祝文》，第4页。

将时或不测观之、激厉之，使其身惯入于风涛之上如履平地而不没足，熟驰逐于檣橹之旁如骋康庄而不蹶然，后手施击刺斩斫之技随吾意之。所之而无不捷。若是者，不出两月必为精水军矣！二、按境内濒海诸湾澳船户之籍，几有船兑若干分为若干，陈各随诸湾澳推其才力过人者，郡补为首领，以统率之使督所统之船各新利其器械亦日习水战。彼生长于水，御寇之技本其亲习，今再从激励振作之，则气为之益锐，而技为之益精，至于教习已称，则民船与官船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而郡将复亲按阅焉。<sup>①</sup>

从陈淳“水军”的建议，可见水上人王化，尤其是船民王化的主要途径就是编入水军。从“若是者，不出两月必为精水军矣”，可见陈淳对组建水军是胸有成竹。按“约五百余额为水军”，可知陈淳熟悉水军编制。从“又择骁勇出群之才分布诸船以将之”，可知陈淳又精于选将。对水军了解可谓精深。“南门”，即漳州城南门，为唐时印度尼西亚将军贩香之地，也是漳州古码头所在地。陈淳主张防御海盗之术，实际上是从海盗多为水上人而来。陈淳实事求是，并由此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

“船户之籍”，即船户的户籍。可知其时船民已编户其民，成为王朝的船户。由“境内濒海诸湾澳”，可知濒江而居的陈淳，不仅对九龙江流域及其水上人了如指掌，对于“濒海”的水上人常识也有涉猎。按水上人，在广东，有“淡水蜑”与“咸水蜑”之分。可见陈淳对水上人有到位的认识。除了无论“淡水蜑”抑或“咸水蜑”均为水上人外，实际上还与陈淳对九龙江的认识“如九龙江发源于汀赣，绕郡东臂，与西江汇归于海”<sup>②</sup>有关。按陈淳此文，是其《请傅寺丞祷山川社稷》之文的补充与说明，可见陈淳的海洋认识在傅伯成担任漳州知州之际即已形成。又有陈淳所云“西北二江发源汀潮，夹绕州治，而合归于海。此正吾州阴阳融结之会”<sup>③</sup>，按“西北二江”即陈淳所云“西江”与九龙江。从中可知，陈淳于此以“阴阳融结之会”加以考述是对水上人历史文化认识的升华。

从陈淳对“船户”的了解，实际上是陈淳基于故里龙溪县香洲社（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朝阳镇石井行政村蓬洲自然村）香洲渡展开的。陈淳与“船户”的历史文化可谓密不可分。陈淳对“船户”如此精深的论述，实际上正是得益于陈淳的历史文化渊源。正因为陈淳深受此历史文化熏陶与历史文化底蕴积淀，由此孕育了陈淳“船民”策略的源头。

陈淳不仅精于“官船”的建设，也精通“民船”的辅佐之道，实际上就是陈淳的水上人历史文化渊源的体现。陈淳提出的“民船与官船又期一日大会于近江”，不仅是抵御海盗之举，实际上促进了“民船”之“船户”的王化过程，即“船户”由此纳入“官船”，成为王朝水军的后备力量。

### （三）陈淳曾论述泉州刺桐港

据陈淳《上傳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记载：

非如温陵市舶连藁富饶之地，其何以供此为千里？人之主可坐视而不问乎？<sup>④</sup>

“傅寺丞”即傅伯成。“温陵”为泉州别称。“市舶”即泉州市舶司。此为泉州刺桐港之意。傅伯成曾为泉州市舶司题清芬亭牌匾，其叔父傅自修曾二度出任泉州市舶司市舶使，且再任即缘于“番商”之请。泉州市舶司分管泉州刺桐港对外贸易，傅伯成外祖父李邴，曾为刺桐港题诗，其名句“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至今传颂，李邴在刺桐港祈风处九日山也有摩崖石刻。可见傅伯成家族与泉州刺桐港的文化渊源。陈淳于此上书傅伯成，对傅伯成的家世应有所知，从中可见陈淳

①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五《札》，第4-5页。

② [宋]陈淳：《祷山川事目》，《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札》，第11页。

③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八《札》，第8页。

④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二《札》，第6页。



对泉州市舶司以及泉州刺桐港有一定了解。

按漳州早在五代十国，经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之兄留从愿的努力，成为留从效的统治范围。从至今流传的留从效、留从愿先祖行舟开基的故事叙事结构，可知留从效、留从愿本身是水上人的后裔。按留从效遍种刺桐树，泉州刺桐港因此得名，并由此发展成为闻名天下的大港。其时，漳州也深受影响。至北宋时，仍被宋太宗视为八闽著名的造船中心。按理漳州由此发展海外贸易可谓自然天成。然而，却不及泉州刺桐港。结合朱熹“劝农”政策，可知漳州由此深受影响。但是，陈淳于此发现“漳民无大经商”因此造成“衣食甚艰，十室九匿”的现象<sup>①</sup>，即漳州“十室九匿”的现象是源于“漳民无大经商”。由“漳民”“经商”，结合“温陵市舶”，可知陈淳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的思想，与传统的中央王朝“重农抑商”的政策相悖。可见陈淳对朱熹的“劝农”思想有所发展。从傅伯成的题匾泉州市舶司，可知陈淳应与之相互砥砺。

于“温陵”而言，傅伯成的舅祖母李清照曾投奔其夫赵明诚之兄、也是傅伯成的舅祖父、时任泉州知州的赵思诚。因此，同样来自北方的傅伯成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与泉州由此结缘，并入乡随俗成为泉州人的一部分。

陈淳有《问东坡少颖东莱三失之说孰是》一文<sup>②</sup>，从文中“苏氏三失之说虽明，然篇中无失天命之意，未敢信其为必然”<sup>③</sup>，可知“东坡”即“苏氏”，也就是苏轼，陈淳对此颇有研究。按李清照之父李格非是苏轼的高足。陈淳也由此增进了与傅伯成、傅壅父子之间的情谊。

从中可见，水上人于海外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其文化底蕴正是其参与海外贸易的重要推手。水上人从位于内河的九龙江由此走向大海，投身海外贸易。明代的漳州月港就是明证。漳州月港贸易虽然起于明代，但应溯源于五代十国留从效与留从愿兄弟，而陈淳的祈雨天宝山神与九龙江神之举就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长泰天柱山在明代，其天柱岩香灯田不仅成为了祖籍天宝山下龙溪县二十一都墨场社（今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墨溪村）的水上人后裔戴时宗、戴耀、戴燦宗族的族产<sup>④</sup>，也由此成为了“海客千百人如蚁而上，盖与尧于是山，日日如是也，客俱他县人”<sup>⑤</sup>的经漳州月港前往“东西洋”的福建华侨信仰中心。

众所周知，既然漳州文脉多归功于朱熹的“过化”之举，然而漳州的“海滨邹鲁”之称更得益于朱熹高足陈淳由内至外的努力。正是因为陈淳的积极参与，水上人大量上岸，成为省民的组成部分。加快了水上人的汉化，实则促进了漳州社会繁荣与发展的进程，也奠定了漳州月港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这一切，与陈淳同傅伯成、傅壅的渊源密不可分。正是由于陈淳这位地方精英的努力，漳州知州傅伯成、傅壅父子，以及朱熹的学说在漳州由此深入人心，影响深远。陈淳的香洲故里，祈雨的天宝山、九龙江，不仅是陈淳研究重要的文化遗存，更是朱熹与闽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 （四）陈淳对漳州民间信仰的对策实际上是从水上人历史文化渊源出发的结果

陈淳对漳州的民间信仰论述，以“圣妃”信仰，也就是妈祖信仰为代表。妈祖信仰，由其最初的信众群体可知妈祖原型实际上来自水上人，是水上人的信仰神明。

①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二《札》，第6页。

②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二《札》，第15-16页。

③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二《札》，第15页。

④ 刘涛：《明代东南文坛名家戴燦年谱》，《闽台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第98-100页；长泰县戴氏族谱编委会编：《长泰县戴氏族谱》第一册，福建省长泰县图书馆藏，1996年，第18页；据笔者2018年6月2日田野考察戴时宗、戴耀、戴燦祖籍地长泰县陈巷镇古农村村侍郎阮自然村避庵祠堂，访谈戴先生可知，该地历史上原为岛屿地貌，舟楫通行，现仍存大片沙田，可知戴氏宗族与水上人具有历史文化渊源。

⑤ [明]曹学佺：《游天柱记》，[清]王珏修、叶先登等：康熙《长泰县志》卷九《艺文志》，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67页；按，其时为“癸卯冬日”，即明万历癸卯（1603），为漳州月港繁荣发展时期，详见刘涛：《明代东南文坛名家戴燦年谱》，《闽台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第99页。

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云：“其他所谓圣妃者，莆鬼也。于此邦却乎何关？”<sup>①</sup>“赵寺丞”实时任漳州知州赵汝说。赵汝说于傅伯成与傅壅之间担任漳州知州，可知陈淳上书赵汝说，与此前上书傅伯成，此后上书傅壅，具有一定的关系。

按“圣妃”即妈祖。由其时漳州水上人视之为“圣”，可见妈祖此时的地位。“此邦”指的是漳州。陈淳的“于此邦却乎何关”，如若未从陈淳的水上人历史文化渊源来看，于此解读将产生偏颇。实际上，之所以漳州也成为“圣妃”信仰的分布范围，是由于九龙江流域水上人的发展结果。正是因为妈祖是水上人的神明，因此也就跨越行政区划的范围，从“莆鬼”，即兴化军（今福建省莆田市）成为了漳州水上人的信仰神明。

陈淳于此论述妈祖信仰对漳州本地无关，实际上并不能认为陈淳认为妈祖信仰与漳州果真无关。陈淳早在赵汝说担任漳州知州之前，即代时任漳州知州傅伯成前往龙溪天宝山祈雨，祭祀天宝山之神与九龙江之神等水上人信仰神明，由此促进了天宝山水上人的王化进程。九龙江流域的水上人正是在陈淳的水军建设策略下加快王化进程。因此，陈淳于赵汝说时任漳州知州之际，天宝山以及九龙江水上人已然上岸，成为王朝编户其民的组成部分。于此，陈淳对于妈祖信仰也就有了“无关”之意。此为陈淳一向推动九龙江水上人王化之举的结果，也是促进水上人王化策略的反映。由此可见，与水上人具有历史文化渊源的陈淳的过人之处。其家国情怀可鉴天地。

我们再来看，陈淳题诗的长泰“五山”之一、傅伯成和傅壅父子有关的天柱山。由开山祖师杨虔诚于天宝山“学道”，实际上所学之道为水上人之法。根据福建古时就有“闽人尚巫”之称，福建道教的底层为巫，天宝山的水上人之法实则为巫。入乡随俗成为新闽南人的傅伯成、傅壅父子先后倾心天柱山之由来，并由此得到漳州本地人陈淳的青睐，以“五山”视之。天宝山与天柱山道法相通，不仅是福建地方道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反映了陈淳接地气、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 四、结语

综上所述，陈淳的水上人历史文化渊源促成其祈雨龙溪天宝山、提出水军建设、提出对妈祖信仰在漳州传播的看法，而这一切均与陈淳香洲故里有关。新时期陈淳研究，不仅要深入探索发现新史料，也要跳出区域划分，揭示文本背后历史情境，应在此基础上，参考借鉴交叉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加以超越。

<sup>①</sup> [宋]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三《札》，第15页。

# 严复海权思想研究之检讨与前瞻

戚庆雨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严复, 对其所生活的时代和后世皆有影响。一个世纪以来, 对严复的研究分为在世时期、逝世不久、建国到“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严复的海权思想研究也从船政教育背景、近代中国海军史地位、海权思想内容等层面展开, 也需要不断深化严复研究其他领域。惟其如此, 才能使对严复的研究更加接近历史真相。

**关键词:** 严复; 研究模式; 船政; 海权思想

严复(1854—1921)学贯中西、博通古今,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而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 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等西方经典著作, 向中国传入西方先进的思想, 将西方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学理系统地译介到中国, 在当时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 学界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主要是围绕严复的教育思想、翻译思想、政治和哲学思想而展开的。相比之下, 严复的海权思想研究略显不足。这对“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而言是白玉存瑕。有鉴于此, 这里将严复研究的相关成果作一粗浅概述。

## 一、研究之回顾

据有关统计, 从 1901 年到 2012 年的 111 年中, 共出版研究严复的著作 84 本以上; 发表研究严复的文章 1584 篇以上; 召开各类主题的严复学术研讨会 14 次以上。<sup>①</sup>对严复研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一百多年来, 对严复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关于严复的研究在严复的生前就有相关论评。如熊元愕《侯官严氏丛刻》、徐锡麟《严侯官文集》、熊元愕《〈国文报〉汇编》、王允晰《侯官严先生行状》、革命派人士章太炎《〈社会通论〉商兑》等。同时代的人也对严复多有评价, 康有为赞誉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第一者也”<sup>②</sup>。胡适曾赞誉“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sup>③</sup>。鲁迅也认为严复是“19 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sup>④</sup>, 梁启超在《介绍新著〈原富〉》中认为“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sup>⑤</sup>。

第二阶段, 严复去世后不久便出现关于严复的论著。如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1921)、林纾《告严几道文》(1922)、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中认为介绍西洋哲学要推严复为第一、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1921)、贡少芹、蒋贞金编著的《严几道诗文集》(1921)等。

**作者简介:** 戚庆雨, 男,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研究生。

<sup>①</sup> 黄瑞霖:《严复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4 年。

<sup>②</sup> 中国史学会:《康有为与张之洞书》,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第 525 页。

<sup>③</sup>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 载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7 年。

<sup>④</sup> 《鲁迅全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第 295 页。

<sup>⑤</sup> 苏中立、徐光久:《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267—268 页。

钞》(1922)、柯劭忞《严复传》(1927)、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1940)。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周振甫将严复的一生的中西文化观划分为三个阶段：周氏根据严复的言论，分析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优劣及其原因，指出严复先是否定中国文化而全盘接受西化，继而他的思想经历了中西折中的时期，后来又对于西洋文化的信仰根本动摇重返儒家的哲学了。概括起来为：全盘西化、中西折中、返本复古。这种论述长期以来占据着对严复研究的一种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是我国一部对严复研究颇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使严复研究进入了三阶段模式，长期以来持此论者不乏其人。

第三阶段，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据《严复全集》(附卷)、《严复集》补编、《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主要有王栻《严复传》(1957)、周振甫《严复诗文选》(1959)、章回《严复》(1962)，亲友的追忆有严家理《严复先生及其家庭》(1963)，关于严复的翻译有郭沫若《信达雅是翻译工作的必备条件》(1955)，关于对严复的审视与评判有王栻《〈天演论〉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1957)、吴玉章《〈天演论〉使我们奋起图存》(1961)。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王栻《严复传》，他将严复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严复的海军生涯(1853—1894年)、第二阶段为严复是维新运动中一个出色的思想家(1895—1898年)、第三阶段认为严复的思想从进步转到保守(1898—1911年)、第四阶段则认为严复晚年是个顽固反动的癯瘠老人(1912—1921年)。<sup>①</sup>不难发现，王说基本上根据20世纪40年代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的“三个阶段”来划分的。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文化领域一片萧条，严复研究自然也进入一段低潮阶段，这一段时期成果不多。强调阶级斗争的“文革”时期，学术思想严重“左”倾，此时关于严复的评说多失诸史实，有失公允。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国外的研究出现了一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著 *In Search of Wealth &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美国哈佛大学1964年英文版(该书于1989年叶凤美译出并出版，中文名《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该书认为严复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为中国寻求富强，此外引入“冲击-反应”的西方模式来研究严复，颇有影响。<sup>②</sup>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治文化经济重新步入正轨，文化事业方兴未艾，严复研究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严复研究会、严复学术研究会、严复研究所等专业学术机构的成立，各种纪念性与讨论性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严复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1993年由福州严复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在中国大陆首次举办的有关严复思想的学术会议。以此为启点，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福州，1997)、严复与天津——纪念《天演论》正式出版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天津，1998)、严复逝世80周年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天津，2001)、严复逝世80周年纪念会(福州，2001)、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暨严复思想学术研讨会(福州，2003)、严复学术与思想研讨会(香港，2005)、福建省社会学学会暨福建省严复研究会2005年学术年会(福州，2005)、纪念《天演论》翻译110周年——严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2005)、纪念严复逝世8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武夷山，2006)、严复译著《法意》出版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福州，2006)、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福州，2007)、严复思想与社会进步论坛(福州，2011)、首届闽都文化论坛(福州，2012)、纪念严复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百年座谈会(福州，2012)、纪念严复诞辰16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福

① 王栻：《严复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② [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州, 2014)<sup>①</sup>等一系列会议的召开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使得严复生平和严复思想的研究呈现全面化、严谨化、系统化、科学化局面。著作方面。1986年出版王栻《严复集》, 这是严复研究的史料性工具书, 同时也为严复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此后严复研究的相关文章多以此文集为基础。新世纪之后, 2004年出版了《〈严复集〉补编》, 搜集到许多《严复集》未收的新资料, 有不少是未刊稿, 已刊稿也有相当部分是学界闻所未闻, 包括轶文、诗词、书信、译著以及其他类件。<sup>②</sup>无独有偶, 在大陆出版有关严复的文集时, 台湾也出版有林载爵《严复合集》。前文所提及的相关研讨会召开, 出版主要有《19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严复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习近平同志曾经先后两次为研究严复的著作作过序文, 给予严复以高度赞扬。先是称赞“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他爱国主义和追求真理的思想, 他严谨的治学精神, 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学工作的严肃态度, 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走过的道路”<sup>③</sup>。后又赞誉“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 在当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 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 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sup>④</sup>继往开来, 2014年福建师范大学汪征鲁教授主编的《严复全集》出版, 这是严复翻译、著作、中国传统经典批注的首次集成, 也是目前最完整, 最准确的严复著作全集。值得一提的是, 2015年薛菁、汪征鲁教授所写的《严复研究之检讨与前瞻》, 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严复研究史作了一个论列, 文章起于严复研究史之回顾, 承于研究史之解析, 终于研究之前瞻, 更是大致预测指明严复研究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 其次是进行严复及相关问题的专门研究, 最后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sup>⑤</sup>

由上述可见, 对于严复的研究不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研究也呈现出一些特点: 出生地之福州, 活动时间最久之天津, 晚年活动之北京都举办了一系列活动。研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进展, 也有争鸣。也不难发现, 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翻译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以及晚年思想等, 对严复的海权思想研究略显薄弱, 需要加强。

## 二、研究之解析

### (一) 关于严复的船政教育背景

严复的船政教育贯穿着严复的大半生, 有关严复的传记均有提到, 初入福建船政学堂、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再入福建船政学堂、执教北洋水师学堂。有关方面的文章也有涉及, 严复留学英国期间与时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之间的交往也被传为美谈, 为学界所津津乐道。房奕既在文章中说出了严复得到郭嵩焘的赏识是因为“严复批驳张力臣《瀛海论》的文章才引起郭嵩焘的极大的重视”, 另“严复谈吐中所流露出的才情傲气是吸引郭嵩焘的另一个主要因素”<sup>⑥</sup>。可见, 郭嵩焘虽然与严复年龄有差, 而且在众多留学生中唯独与严复引为忘年交是事出有因。此外, 尚需注意的几点有: 1. 留学英国期间严复与伊藤博文是否为同学关系。学界一直长期流传着严复与伊藤博文在皇家海军学

① 朱修春:《严复学术档案》,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年。

② 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

③ 福建省严复研究会:《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年。

④ 习近平:《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序,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

⑤ 薛菁、汪征鲁:《严复研究之检讨与前瞻》, 《东南学术》2015年第2期, 第56-65页。

⑥ 黄瑞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年, 第391-392页。

院是同学关系，为伊藤博文回国后为日本进行改革使日本走向富强而严复回国后厉声疾呼却不为所重视才导致中国落后而惋惜。林平汉据严复写给梁启超的信认为：“严复与伊藤博文不仅存在同窗关系，而且‘各与国事，皆有同感’，并非泛泛之交。”<sup>①</sup>而学界近年来大多予以否定，认为是讹传。陈端坤说日本福岛大学手代有儿助教据《伊藤博文传》和《伊藤博文》认为伊藤博文因日本留学生英语基础很差和外国舰队炮轰下关而赶回日本。<sup>②</sup>中国学者孙应祥、皮后锋也予以否认，他们不仅指出了这种讹传的渊源和演变流程，<sup>③</sup>更直接证明了所谓的“严复书札”根本就是伪作。<sup>④</sup>相信他们是同学的说法大概是一种为国哀叹的情怀吧。2.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称。若不加以留意，学界在说到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大多以“总办”之类的语言含糊其辞，细究起来，对“总教习”“洋文总教习”“洋文正教习”“代理总办”“会办”“总办”却语焉不详或者不明白其中究竟。皮后锋数度发文予以辨析之，他说1880年严复初入北洋水师学堂时职称为“洋文总（正）教习”，“洋文总教习”与“洋文正教习”名异实同，可简称为“总教习”<sup>⑤</sup>，1886年为代理总办之职，1889年晋升会办，1893年升任总办。<sup>⑥</sup>

## （二）关于严复在中国海军史上的地位

前文提及学界对严复的研究是围绕着他的教育思想、翻译思想、哲学和政治思想而展开的，学界对严复的定位主要是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出身海军，仕宦海军的经历也不容忽视，1910年严复被赐封“海军协都统”。同时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赴欧留学生之一，继而回国执教北洋水师学堂，被誉为“海军元老”。一些学者也对严复在中国海军史上的地位有所提及。高力克在纪念严复诞辰160周年的文章中称严复为“海军先驱”，<sup>⑦</sup>林怡在文章中则称赞严复为“海军教父”，<sup>⑧</sup>不难发现，不论是“海军协都统”还是“海军元老”“海军先驱”或“海军教父”，无疑都是肯定严复对近代中国海军界的贡献与在近代海军史上的地位。严复对近代中国海军的作用可见一斑。

## （三）关于严复海权建设的思想

其一，海权建设的重要性。王荣国认为严复主张缔造海权的重要性是因为海权关系到国家的贫富、国防力量的强弱、国家的政治独立。<sup>⑨</sup>叶芳骐则指出了严复将海权扩展到商贸领域，论述强化海军建设与发展国外商贸关系之重要性。<sup>⑩</sup>两位学者都提到了严复认为海权建设与国家贫富的关系。

其二，海权建设的主张。论者多有涉及的关于严复具体的建设海权主张主要依据的是《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此外，尚有其他的海权建设主张。林怡指出严复认为海军建设成功与否与内政是否清明紧密相关。<sup>⑪</sup>吴晓宇、张洪、李清川指出严复认为海军建设要掌握制海权、学习外语、强调动手能力与实践本领、强调战斗精神。<sup>⑫</sup>王荣国则指出严复认为除创办海军外还要配置成系统的

① 习近平：《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序，第144-145页。

② 陈端坤：《严复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海峡教育研究》2014年第4期，第40-41页。

③ 皮后锋：《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说探源》，《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第41-50页。

④ 孙应祥、皮后锋：《“严复书札”伪作与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的再传播》，《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06-113页。

⑤ 皮后锋：《严复初莅天津水师学堂的职称》，《福建论坛》2011年第9期，第68-72页。

⑥ 皮后锋：《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福建论坛》2009年第1期，第71-79页。

⑦ 高力克：《陶铸国民：严复与中国启蒙运动——纪念严复诞辰160周年》，《学术月刊》2014年第12期，第154-161页。

⑧ 林怡：《严复在中国海军史上的地位及其海防理念》，《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2期，第111-112页。

⑨ 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42-43页。

⑩ 黄瑞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91-392页。

⑪ 林怡：《严复在中国海军史上的地位及其海防理念》，《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2期，第111-112页。

⑫ 吴晓宇、张洪、李清川：《严复的“海军强国”梦及时代意义》，《军事历史》2015年第2期，第30-31页。

各种舰船火炮、要进行军港建设和海岸炮台的建设。<sup>①</sup>王宪明、耿春亮指出严复认为除了上述学习外语外，还强调海军建设要有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还要以法治军以及要主动走向世界，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sup>②</sup>后者将严复的主张突破了器物的层面，上升到了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层面。

纵观对严复海权方面的研究进展，可以看出，学界于严复的船政教育背景、海权建设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深化前进，但是，相较严复翻译思想、教育思想、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海权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可以看出对严复的海权主张学者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某一角度或几个角度去说明，尚需进行系统完整的整理，将碎片化分门别类体系化。创新是一门学科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仍需对原始史料进行重新解读深入挖掘，要把严复海权思想放入近代中国海防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中去思考，结合时代大潮流去研究。若能进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想必会有新的成果。惟其如此，才能对今天的中国海权建设提供借鉴与反思。

### 三、研究之前瞻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所谓前瞻之说，只是站在已取得的成果之上，总结过去的成绩与不足并对未来研究的一个预测，因笔者学识有限，故严复海权思想研究前瞻之说，只能讲一个大概和趋势。

首先是严复海军活动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严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海军打交道。1866年，年仅14岁的严复因父丧家贫被迫投考刚刚开始设立并招生的福建船政学堂，学习约10年后，于1877年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海军派遣留学生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1879年回到母校福建船政学堂任教，未出一年便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参与北洋水师学堂的创办工作与招生等一系列事宜，在此任教达20年之久，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与义和团运动被迫离开天津水师学堂，严复的职业化船政教育背景始于1866年，终于1900年，前后凡35年之久未从间断。1910年已经58岁的严复与魏翰、郑清濂、伍光建一同被派为筹办海军事务处顾问官。<sup>③</sup>1912年8月，海军部设编译处，以严复为总纂，令部员翻译外国海军图集。<sup>④</sup>其海军活动时间之长可见一斑。有鉴于此，需对严复的海军活动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与考订。一方面是严复留欧方面，这点目前我们所见只是根据严复自己和时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记载，而英国方面要注意的则是外务部接受这批学生情况的记载和海军部特别是皇家海军学院方面的有关记载需要进一步挖掘。另一方面是1912年严复组织翻译外国海军图集，严复具体翻译了哪些关于外国海军的资料还需考证。

其次是相关问题的专门研究。（一）通过严复所翻译的国外海军图集管窥严复的其他思想，尤其是晚年思想。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严复对这些外文是如何进行取舍的，是不是像早年翻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一样是应时之需，挑选时代最需要知道的社会理论进行介绍的。此外，在遇到新名词时是如何处理的，早年严复进行翻译时曾经发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感叹，作为最早向国内进行系统介绍国外的进化论、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早年翻译时困难重重，最明显的表现为外国的词汇怎样用中文进行翻译，严复选择了向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找字眼，以中国经典之词汇译介外国之名词，力求准确，这样国人才能更加了解。若能知道严复在译

① 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42-43页。

② 王宪明、耿春亮：《严复的“海军强国”梦及其当代意义》，《河北学刊》2013年第6期，第55-59页。

③ 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2页。

④ 《严复年谱》，第402页。

介外国海军图集时对新名词的使用，可以以此为契机，管窥严复的其他思想，尤其是晚年之思想，这对解决学界有争议的严复晚年是不是返本复古的痛痒老人想必也有所帮助，亦即严复的中西文化观是不是早年全盘西化，中期中西折中，晚年顽固反动。（二）探讨严复的海权思想对从事海军事业的亲友学生以及后世的影响。因严复本人是马尾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且长期从事海军教学，海军界中人大多都是他同学或学生，所以在1918年的《海军大事记》弁言中严复曾颇为得意地说“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sup>①</sup>。严复的同学、同乡、学生在清末海军中担任要职的不乏其人，亦有在民国海军部中任要职的，如萨镇冰、蓝建枢、刘冠雄。严复曾为萨镇冰五十大寿作过《统领南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萨军门五十寿序》贺寿，二人交往于此可见一斑。以刘冠雄为例，刘冠雄，福建闽县（今福州）人，1875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归来后在北洋水师任职，民国成立后，先后任海军部顾问，海军总长兼南洋巡阅使，1927年病逝。刘冠雄是严复的同乡、同仁、学生，1913年刘冠雄向袁世凯举荐自己的老师严复担任海军总长，主持中国的海军建设，而自己则自愿降为次长，<sup>②</sup>可见刘氏对严复的能力是认可的，对严复本人也是服气的。希冀通过刘冠雄的作为打开一个局面，近则去探讨严复的海权思想对学生同乡同学的影响以及对严复任职的当局的影响，远则去分析严复的学生同乡同学的海权思想对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的海军建设海权主张的影响。

最后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早期对严复海权思想的研究，因为资料的缺乏难免出现一些错误，使得研究出现偏离历史事实的现象，或者是某些研究有失偏颇。后期严复相关文集的出版使得史料大大丰富，而研究进入了阶段化和局部化的局面，在某些特定领域和问题上有所突破。系统论的方法告诉我们，要用系统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在对严复海权思想的研究上，要从模块化局部化研究走向综合，这也是所有研究的最终归路，最终要从总体上去把握概括，在综合中去分析，在新的分析中再综合。

综上所述，严复的研究史主要分为在世时期、逝世不久之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每个时期对严复的研究都有不同的特点以及主要代表的观点思潮。严复海权思想研究涉及了严复的船政教育背景、严复在近代中国海军史上的地位，以及他的海权建设内容，这方面学界已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但是，仍有一些领域需要开展与进行，深入挖掘严复海权思想的有关方面以及严复研究的其他层面，对这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都有重要的意义。

<sup>①</sup> 王 棫：《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2页。

<sup>②</sup> 《海军部长兼南洋巡阅使刘冠雄呈大总统》，《政府公报》，第551号，1913年11月15日。



# 士珪禅师入闽时间及驻锡地小考

郑淑榕

(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士珪禅师为两宋之际高僧, 绍兴初入闽弘法, 士珪入闽时间当以《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为准, 即绍兴四年三月。士珪禅师在福州八年半的时间里, 六易驻锡地, 先后有西禅寺、雪峰寺、圣泉寺、乾元寺、涌泉寺和华林寺等。这些僧寺多是闽中古刹, 除乾元寺后来辟为私家园林, 余五仍是僧楼宏阔, 梵呗清幽。士珪禅师在闽之时, 闽中法道, 盛极一时。

**关键词:** 士珪禅师; 福州; 驻锡

士珪禅师, 一作士圭, 号竹庵, 自号老禅。俗姓史, 四川成都人, 为两宋之际的高僧。《僧宝正续传》《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续传灯录》有传, 尤以《僧宝正续传》为详, 然其叙及士珪行迹多以年号、地名、寺名称, 缺具体纪年。清释元贤《鼓山志》在承《续传灯录》的基础上, 于士珪行录时间细节上有增补。

南宋绍兴(1131-1162)初, 士珪入闽弘法。入闽之前, 士珪已有诗名、禅名, 所至莫不兴起, 韩驹赋诗赞曰:“直自三湘到七闽, 无人不道竹庵名。”<sup>①</sup>其驻锡闽地期间, 亦是远近奔凑, 求法者甚众, 文人士子争与之游, 闽中法道, 盛极一时。然现有文献, 于士珪入闽时间及驻锡地的记载上, 或欠具体, 或有漏误, 本文就此两项加以考辨, 以补其生平修行事迹之不足。

## 一、士珪入闽时间考辨

关于士珪入闽时间, 祖璫《僧宝正续传》语焉不详, 释元贤《鼓山志》云:“靖康改元(1126)十二月, 江州漕使方郎中请住庐山东林, 明年十二月, 拂衣养恬于许支庵, 后以兵乱避地闽中。绍兴四年(1134)间闽帅张公请住圣泉、乾元, 六年判府给事张公以本山丁勋公不举之后, 特请师振之。”<sup>②</sup>黄任《鼓山志》云:“靖康改元, 江州漕使方郎中请住庐山东林, 后以兵乱避地闽中乾元,(绍兴)六年, 判府给事张公以本山丁勋公不举之后, 特请师振之。”<sup>③</sup>二者俱未明确士珪入闽时间。前者自靖康二年至绍兴四年, 后者自靖康元年至绍兴六年, 士珪行迹不明。

据《大慧普觉禅师年谱》, 士珪当于绍兴四年三月与宗杲一同入闽, “(绍兴四年)师四十六岁, 是年二月作七闽之行……三月至长乐, 馆于广因寺, 因游雪峰, 适建菩提会, 真歇了禅师请为众普说。”<sup>④</sup>大慧普觉, 即是宗杲, 法号妙喜, 谥号普觉。“长乐”是福州旧称。绍兴元年, 士珪与宗杲在

**作者简介:** 郑淑榕, 女, 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文学博士。

① [宋]韩驹:《陵阳集》卷四,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第802页。

② [清]释元贤:《鼓山志》卷三,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5册, 济南:齐鲁书社, 1996年, 第758页。

③ [清]黄任:《鼓山志》卷四,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6年, 第17页。

④ [宋]祖咏:《大慧普觉禅师年谱》, 《中国历代禅师传记资料汇编》(上),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4年, 第300-301页。

江西休宁仰山邂逅，“一见相契，遂定杨岐正宗”<sup>①</sup>。绍兴三年，士珪自仰山至云门寺，与宗杲唱和，共同完成《东林和尚云门庵主颂古》（《禅门宝训集》）。同年九月，二人同至临川，访韩驹。次年离开江西赴闽前，韩驹赋诗赠别，有《送云门妙喜游雪峰》三首、《送东林珪老游闽五绝句》、以及《示珪上人》。《示珪上人》诗云：“自识云门老，经时水石间。尚嫌闻法少，随度七闽山。”<sup>②</sup>“云门老”即是指宗杲。“随度七闽山”，即是指士珪与宗杲同游闽地。此外，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十四有《东林珪云门杲将如雪峰因成长韵奉送》。

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对此有呼应。文集卷三十收录的诗歌创作于绍兴三年四月至次年夏天，末两诗为《追和许崧老诗二篇》《绝句奉约珪禅师相过同食荔枝》。前诗序云：“许崧老赋《三友篇》，以遗东林珪禅师，余尝次韵和之。未几，余被命宣抚荆广，崧老复以诗来。曾未一岁间，闻吴元中薨于柳，崧老东归薨于虔。余方罢帅事，屏居长乐，珪禅师自江西见过，阅篋中得崧老二诗。相与读之怆然，因复追和其韵。”<sup>③</sup>吴敏，字元中，绍兴二年卒于柳州，许翰，字崧老，绍兴三年五月卒于虔州（参《宋史》卷三百六十三）。所谓“余方罢帅事，屏居长乐”，是指绍兴二年十二月八日，李纲罢湖南安抚使，三年二月，离长沙，四月，抵福州。<sup>④</sup>“珪禅师自江西见过”，说明李纲先于士珪抵福州，且士珪自江西，而非别处来。福州荔枝树一般在春分前后，即农历二月中吐蕾，《绝句奉约珪禅师相过同食荔枝》所写荔枝树，已是花开繁茂，“千林行见烂朝霞”。时间当在农历三月。绍兴三年三月，李纲尚未抵福州，故此诗当作于绍兴四年三月。

李纲于释家华严、禅宗颇具心得，仕途坎坷、羁旅行役之际，尤喜访僧问禅。建炎间，李纲罢相，落职武昌，途径江西，与士珪相遇，两相投契，过从甚密。《梁溪先生文集》卷十八《戏赠东林珪老》《云岩月林堂偶成古风》《赠珪老》诸诗记录了二人的交谊，藉此，亦可考察士珪此间行踪，知其活动范围仍在江西，并未入闽。

综上，士珪入闽时间当以《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为准，即是绍兴四年三月，《陵阳集》与《梁溪先生文集》是极好的佐证。士珪此番来闽，非为紧急避乱，而是早有计划。据程宏亮研究，绍兴三年九月，士珪与宗杲欲赴闽，先行绕道临川，访韩驹。因韩驹一再挽留，半年之后，次年二月，二人才又动身，进发闽地。<sup>⑤</sup>

## 二、士珪在闽驻锡地考辨

自绍兴四年三月，至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八年多的时间里，士珪在福州数易驻锡地。据《僧宝正续传》，士珪在闽弘法时，先后住过圣泉、乾元、鼓山诸寺，住鼓山时，间往越山，但具体驻锡时间未详。释元贤《鼓山志》仅载圣泉、乾元、鼓山三寺事，前两寺在绍兴四年，后一寺在绍兴六年。黄任《鼓山志》亦载鼓山事，未载圣泉事，住乾元时间不详。经考，除以上寺院，西禅、雪峰两寺也是士珪在福州的驻锡地。今以入住先后为序，考述如下：

### （一）馆于西禅

绍兴四年三月，士珪馆于西禅寺。

《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绍兴四年甲寅”条云：“师四十六岁。是年二月，作七闽之行……三月

①《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第299页。

②《陵阳集》卷四，第802-803页。

③[宋]李纲：《梁溪先生文集》，福建省图书馆藏清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

④赵效宣：《宋李天纪先生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2-171页。

⑤程宏亮：《韩驹诗文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

至长乐，馆于广因寺，因游雪峰适建菩提，会真歇了禅师请为众普说其略曰：‘今夏在广因，开个灯心皂角铺子，随分说些粗禅。’”<sup>①</sup>宗杲所馆、清了所云之“广因”即今西禅寺。

西禅寺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工业路西南侧，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该寺始创于南朝梁，初名信首，隋末毁圮，唐咸通八年重建，十年改名清禅，未久改延寿，五代时，名为长庆，北宋景祐五年，敕怡山长庆，政和八年赐广因，宣和元年改为黄策，建炎元年改回广因。此后，至淳熙间，寺名更易情况无载，梁克家《三山志》称其为西禅寺<sup>②</sup>。绍兴四年，士珪与宗杲投宿至此，寺名当承建炎“广因”之称。后宗杲法嗣鼎需、守净相继驻锡西禅寺。

## （二）游于雪峰

《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云，绍兴四年，宗杲游雪峰寺，适建菩提会，真歇了禅师请为众普说。宗杲此番游雪峰，士珪当伴其行。

雪峰寺始建于乾符二年（875），比鼓山涌泉寺早建三十余年，曾毁于会昌法难。唐昭宗光化三年（900），改号应天广福，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赐号崇圣。《三山志》卷三十四寺观类二载：“雪峰崇圣寺嘉祥东里，十一年置。”<sup>③</sup>嘉祥东里，宋时隶属侯官县永安乡，今隶闽侯县大湖乡。

李纲《绝句奉约珪禅师相过同食荔枝》诗云：“幽人莫恋雪峰境，拄杖穿云过我家。”“舌根幸有圆通在，何惜南来与遍参。”“幽人”即是士珪。时李纲居城东报国寺（院）。《三山志》云：“东报国院，易俗里。天佑元年（904），闽忠懿王为唐昭宗建，名报国资圣。后主僧不谨，籍其业于官。太平兴国六年（981），太守、右卫将军侯赞复建。有放生池。”<sup>④</sup>“易俗里”，即今福州晋安区东门、塔头、岳峰一带。城东报国寺至清乾隆年间，已毁<sup>⑤</sup>，此后不再修复。其具体位置今已无考。东报国寺位于雪峰寺的东南方向，故诗云“南来”。东报国寺盛产荔枝，曾巩《荔枝录》与蔡襄《荔枝谱》皆有记载。李纲寄寓期间，寺内荔枝依旧茂盛。花著枝头时，士珪尚住雪峰寺，故而李纲劝其勿再流连雪峰胜境，来赏荔花，等食荔果。

综上，绍兴四年三、四月间，士珪住雪峰寺。

## （三）入住圣泉

《僧宝正续传》云：“（士珪）已而入闽，闽帅参政张公宋以圣泉处师。稍迁乾元。俄给事张公致远移师鼓山。”<sup>⑥</sup>据释元贤《鼓山志》，士珪入住圣泉寺，在绍兴四年。“绍兴四年间闽帅张公请住圣泉乾元”。释元贤所云“闽帅张公”，与《僧宝正续传》“闽帅参政张公宋”为同一个人，即张守，“宋”为“守”误。张守（1084-1045），字全真，一字子固，常州晋陵（今江苏省常州）人，崇宁二年（1103）登第，有《毗陵集》五十卷传世，《宋史》卷一百三十四有传。张剑《宋名臣诗人张守及其家族事迹考辨》<sup>⑦</sup>，对张守生平、事迹、交游考辨甚详。绍兴二年九月至五年八月，张守知福州<sup>⑧</sup>，与李纲、张浚、李弥逊、汪伯彦、吕本中、秦梓、王傅、范寥有雅集唱酬。检《宋史》卷三百七十五、三百七十六，建炎四年五月，张守除参知政事，故祖琇称其“闽帅参政张公”。

① 《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第300-301页。

②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八“寺观类”，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8页。

③ 《淳熙三山志》卷三十四“寺观类”二，第508-509页。

④ 《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第495页。

⑤ [清]徐景惠：《福州府志》（上）卷十六“寺观”，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520页。

⑥ 祖琇：《僧宝正续传》，蓝吉富：《禅宗全书·史传部四》，台湾：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595-596页。

⑦ 张剑：《宋名臣诗人张守及其家族事迹考辨》，赵敏俐：《中国诗歌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4-142页。

⑧ 《淳熙三山志》卷二十二“秩官类”三，第325页。

绍兴四年三月士珪入闽后，先馆广因，后游雪峰，再住圣泉，同年住持乾元寺，故而士珪入住圣泉院，在绍兴四年。宗杲有《答圣泉珪和尚》。<sup>①</sup>

圣泉寺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园中村境内，旧名法华院，始创于唐景龙元年（707），是唐代天台宗弘法的重要道场，唐刘轲有记，今存残本。<sup>②</sup>蔡襄、曾巩留有诗赋。

#### （四）驻锡乾元

士珪入住圣泉寺未久，即迁乾元寺。据释元贤《鼓山志》，士珪住持乾元寺也在绍兴四年，也是应张守之请。在绍兴六年住持鼓山涌泉寺前，盖其一直居于此。《梁溪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六有《桂斋上梁文》，由文中“秋色初来正潇洒”句，知上梁时间在秋天。据李纲年谱，此文作于绍兴四年。<sup>③</sup>桂斋为李纲居东报国寺时所建，建成之初，士珪以旆牛拂尘相贺，李纲赋《二绝句报珪老》，诗前序云：“茅斋成，乾元珪老以拄杖旆牛拂尘见遗，成二绝句以报之。”“茅斋”即是桂斋。士珪驻锡乾元寺，故李纲称其为“乾元珪老”。

综上，士珪驻锡乾元寺，至迟在绍兴四年秋。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一《次韵奉酬楞伽室老人歌寄怀云门佛日兼简乾元老珪公并叙钟山二十年事，可谓称韵也》，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十五有《简乾元老》。

乾元寺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为闽中第一寺院，建于晋太康三年（282），初名以绍因，唐乾元三年（760），防御使董玠奏赐乾元。旧有琴石、金鸡井、钦马石、戒坛。《三山志》云其位于“州北无诸旧城处也”<sup>④</sup>。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各地权贵常常侵吞寺庙产业，将寺庙改造为私家园林。此类事件闽中亦层出叠见，乾元寺便罹此祸，卫卒姚氏没其址为园，废寺为宅。<sup>⑤</sup>至清代康熙年间，入闽萨氏八世和十世子孙于此建别墅，以半野轩名之。清乾隆年间，半野轩归盐商吴维贞、吴继篔父子所有，“昭和棋圣”吴清源诞生于此<sup>⑥</sup>。1930年，吴继篔破产，将三分之二的半野轩卖掉。1932年，半野轩成为福建信托地产有限公司私园。抗日战争胜利后，半野轩成为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公馆。20世纪50年代起，半野轩被改造为福州军区机关宿舍和招待所<sup>⑦</sup>。现在的半野轩，坐落着酒店和会所，园中残存的假山石上留有吴继篔的题刻。

#### （五）移锡鼓山

祖琇《僧宝正续传》云士珪迁乾元寺未久，又移鼓山。“俄给事张公致远移师鼓山”<sup>⑧</sup>。释元贤《鼓山志》云士珪移锡鼓山在绍兴六年，“（绍兴）六年判府给事张公以本山丁勋公不举之后，特请师振之。”<sup>⑨</sup>程迈《重修涌泉寺碑》云：“绍兴乙卯，福唐大旱，斗米千二百有奇。主僧法勋负积券一千六百万钱，谢事而去。前帅给事张公迁乾元长老士珪董院事……绍兴十二年，五月望日，显谟阁直学士中奉大夫知福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福建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文安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程迈撰住山传法沙门士珪立石。”<sup>⑩</sup>张致远（1090—1147），字子猷，南剑州沙县（今福建三明

① [宋]宗杲《大慧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② 《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第492页。

③ 《梁溪先生文集》附录一

④ 《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一，第481页。

⑤ [清]郭柏苍：《竹间十日话》，《榕城考古略·竹间十日话·竹间续话》，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⑥ 萨本珪：《通贤坊与半野轩——入闽萨氏两处寓所钩沉》，《福州史志》2006年第15期。

⑦ 卢美松：《福州名园史影》，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48—150页。

⑧ 祖琇：《僧宝正续传》，第596页。

⑨ [清]释元贤：《鼓山志》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758页。

⑩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鼓山艺文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535页。

沙县)人,宣和三年登第,绍兴六年五月至八年三月,知福州,绍兴五年、八年,两除给事中<sup>①</sup>,故称其为“给事张公”。

综上,士珪移鼓山涌泉寺当在绍兴六年五月以后。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一有《奉同黄檗慧公秀峰昌公丁巳上元日访鼓山珪,慧公游临沧亭,为赋十四韵》,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十六有《奉呈鼓山云门二老》。

鼓山位于福州东郊,因其山巅有巨石如鼓,故名。鼓山半山腰白云峰顶坐落着享有“闽刹之冠”的涌泉寺。该寺始建于唐建中四年(783),初名华严寺。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王审知延请神宴住持涌泉院。后梁乾化五年(915),改为鼓山白云峰涌泉院。明永乐五年(1407),改为寺,嘉靖二十一年(1542),寺毁于火灾,万历(1573—1620)、天启(1621—1627)间相继修复。清顺治初,僧元贤重修,康熙间,御书涌泉寺额以赐。<sup>②</sup>

士珪入住鼓山涌泉寺后,先是整饬寺规,接着大兴土木,整修扩建寺院建筑,先后修葺了五百罗汉阁、涌泉寮、老僧阁、法堂、白云老宿窝等。自绍兴六年至十二年,士珪住持涌泉寺六年,“内外大小无不备举”<sup>③</sup>。李纲创作于绍兴八年、收录在本集卷三十二的两首鼓山诗皆与涌泉寺的殿台楼阁相关,其一为《游山拙句奉呈珪老并简诸公》,诗云:“乍惊暑退灵源洞,最爱亭开大顶峰。杰阁初成切星斗,飞云时到绕杉松。”其一为《冬日来观鼓山新阁偶成古风》,诗云:“山中有开士,弹指成杰阁。”“翠飞骞栋葺,绚烂丽丹艘。峨峨大顶峰,孤影入檐角。”二诗所言“杰阁”皆是指鼓山大顶峰上的罗汉阁。

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一有《奉同黄檗慧公秀峰昌公丁巳上元日访鼓山珪,慧公游临沧亭,为赋十四韵》,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十六有《奉呈鼓山云门二老》。

#### (六) 移锡越山

祖琇《僧宝正续传》云:“丞相张公德远出师七闽。一日谓僚属曰。越山当福城三山之中。院独废绝。非老禅不能办。即以属师。不数月。殿阁崇成。他日丞相游鼓山。目其成绩。遂迎师复归鼓山。”<sup>④</sup>

张浚(1097—10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历任徽、钦、高、孝四朝,官至丞相。《宋史》卷三百六十一有传。张浚两到闽中,一在绍兴四年,因罢职而寓居福州;一在绍兴九年九月至十一年十二月,以资政殿大学士除福建安抚大使兼知福州,下任即是程迈。<sup>⑤</sup>

越山,位于福州市区北端,形若屏风,故又名屏山,或平山。闽越王无诸平山南麓建“冶城”,故此山又称“越山”“越王山”。《榕城考古略》:“越王山,在城北,半蟠郭外,周回数里。其南曰屏山,以形若屏扆也。”<sup>⑥</sup>山间“绝学寮”为张浚读书处。

越山吉祥院始创于北宋乾德二年(964),明正统九年(1444),赐额“华林寺”,寺名沿用至今。华林寺被认为是中国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sup>⑦</sup>

① 检《淳熙三山志》卷二十二,检《宋史》三百七十六。

② 参《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一,第493页;《闽都记》卷十二“郡东”,第94页;《榕城考古略》卷下,第70页。

③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鼓山艺文志》,第535页。

④ 祖琇:《僧宝正续传》,第596页。

⑤ 《淳熙三山志》卷二十二“秩官类”三,第326页。

⑥ 《榕城考古略》卷上“城榭”第一,第19页。

⑦ 《淳熙三山志》,第489页;杨秉纶、王贵祥、钟晓青:《福州华林寺大殿》,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史论文集》第9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32页。

祖琇既云张浚“出师七闽”，当是指张浚二度来闽任知州。故士珪驻锡越山禅院当在绍兴九年之后。数月之间，士珪便将残垣断壁的寺院修葺一新，殿阁嵯峨，气象庄严。张浚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离开福州之前，将士珪迎回鼓山。

### 三、余论

士珪在闽八年半的时间里，六易驻锡地，其住过的僧寺多是闽中古刹，除乾元寺辟为私家园林，余五仍是僧楼宏阔，梵呗清幽，其于鼓山涌泉寺、越山吉祥禅院贡献尤著。其迁名刹，多应郡守之请，再据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知其在闽多与文人士子游，这是宋代佛教在发展困境下寻求突破的一个表现，然士珪能全节自高，弘法有体，祖琇对其评价极高，认为士珪在闽之日，是闽中法道最盛之时。

# 南宋李韶《竹湖公论葬说》辨伪

李 攷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南宋李韶是连江珠浦李氏家族第十二世裔孙, 李弥逊的曾孙。《福河李氏宗谱》见录李韶《竹湖公论葬说》一文, 乃李韶的后裔托伪之作, 实为抄袭改动司马光《葬论》而成。《竹湖公论葬说》的成文时间, 当在李韶卒后即淳祐十一年(1251)之后, 至李斌修族谱的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之前。《竹湖公论葬说》更强调“葬师之不必信”, 《葬论》更强调“葬书之不足信”。《竹湖公论葬说》全文 800 余字, 《葬论》全文 790 余字, 相差约 20 字, 其字词文句互异 40 余处。《竹湖公论葬说》对《葬论》的改动, 出现了错字, 不如原文精彩, 但修订了《葬论》的个别文字, 加强了《葬论》原文某些文句的语气。《竹湖公论葬说》文后所附李斌的评论, 直指《竹湖公论葬说》中心旨意, 见其维护先祖形象为其辩白之情真意切。当今福建民间讲求厚葬、讲求阴阳风水以致停柩不葬等的陋俗依然存在。移风易俗, 于当今社会依然很有必要且大有文章可作。

**关键词:**连江珠浦李氏家族; 李弥逊; 李韶; 司马光; 《竹湖公论葬说》; 《葬论》; 李斌

南宋李韶(1177-1251)<sup>①</sup>, 字元善, 号竹湖, 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 祖籍福州连江, 是连江珠浦李氏开基祖李澄的第十二世裔孙, 有宋一代抗金名臣礼部侍郎李弥逊的曾孙。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举进士, 调南雄州教授。以廉勤荐, 迁主管三省架阁文字, 迁太学正, 改太学博士。上书谏济王竑狱, 出通判泉州。改知道州。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 行都灾, 应诏言事。提举福建市舶。入为国子监丞, 改知泉州兼市舶。理宗端平二年(1235), 转太府寺丞, 迁都官郎官, 迁尚书左部官。未几, 拜右正言。权工部侍郎、正言, 迁起居舍人。累书乞补外, 以集英殿修撰出知漳州, 号称廉平。嘉熙四年(1240), 迁户部侍郎。五年(1241), 改吏部侍郎, 兼侍讲, 累辞, 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 迁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淳祐二年(1242)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五年(1245), 迁权礼部尚书。七年(1247), 以端明殿学士提举玉隆宫。八年(1248), 仍旧职奉祠万寿宫兼侍读。九年(1249), 仍奉祠玉隆宫。十一年(1251), 祠满再复任。卒, 年七十五。谥清忠。<sup>②</sup>李韶之诗文并无专集流传下来, 目前仅散见零星诗文篇目存于方志、族谱中, 以及今人整理的《全宋文》《全宋诗》等书中。

**基金项目:**2015 年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连江珠浦李氏家族文学研究”(FJ2015C063)、闽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闽南文化专项)“连江珠浦李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SS11023)、闽南师范大学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李弥逊《筠溪集》研究”(SJ1119)。

**作者简介:**李攷, 男, 福建龙海人,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专业 2015 级博士生,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讲师、《闽台文化研究》责任编辑。

<sup>①</sup> 李韶生卒年另一说为 1198-1268 年, 享年七十一。1918 年许登瀛续修《珠浦李氏族谱》稿本云:“公于淳祐五年权礼部尚书。上出御扇而书曰‘有节天容直, 无心道与空’, 上因号‘直空老人’。卒咸淳四年, 寿七十一。初葬儒洋, 后改葬于州之梅岭。子孙因居于州。”按, 宋度宗赵祺咸淳四年为 1268 年, 依此则李韶生年为宋宁宗赵扩庆元四年(1198)。

<sup>②</sup> 参[元]脱 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三李韶本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 第 36 册, 第 12628-12643 页; 曾枣庄等:《全宋文》第 319 册卷七三二四李韶小传,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 第 194 页。

## 一、《福河李氏宗谱》见录李韶《竹湖公论葬说》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斌修、李阿山先生1995年整理续修的《福河李氏宗谱》稿本中收录有《竹湖公论葬说》文一篇，文后附有修谱者清代漳州府龙溪县福河李氏开基始祖李弥逊之二十世裔孙李斌字其钊号左文所题之评论文章。全文过录如下：

### 竹湖公论葬说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亲之暴露，故敛而藏之。齐<sup>①</sup>送不必厚，厚者有损无益，古人论之详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地师，禁忌则甚矣。古者虽卜宅、卜日，盖先谋人事之便，然后质之蓍龟，庶无后艰，甬无常地与常日也。今之葬师，乃相山川冈亩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干支，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非此地此时不可葬也，举世皆惑而信从之，于是送亲者往往久而不葬。问之，曰：“岁月不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亦曰：“游宦远方未得归也。”又曰：“家贫未能办葬具也。”甚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弃失尸柩不知其处者有之。呜呼！可不令人深叹愍哉！夫人之所贵者身也。子孙者，欲后来以奉<sup>②</sup>老而能收藏其形骸也。其所为乃若是，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犹有仁者见<sup>③</sup>而殓之也！先王制礼，葬期不过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礼未葬，不变服，食粥，居庐，哀亲之未有所归也；既葬，然后渐有变除。今世之人，悖礼犯法，未葬而除丧，从官四方，食稻衣锦，饮酒作乐，于心安否？人之贵贱贫富寿夭俱系于天，贤愚不肖出于赋稟，固无关系于葬。就使皆如葬师之言，为人子者方当哀穷之际，何忍不顾其亲之暴露，乃欲自营福利耶？昔吾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以下始有棺槨，然金银珠玉未尝以锱铢入于圻中。将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询之阴阳地师？此必不可！”吾兄伯康无如之何，乃曰：“询于阴阳地师则可矣。安得有良葬师以询之？”葬者曰：“近村有张生者，良师也，数县皆用之。”兄乃召张生，许以钱二万。张生，野夫也，世为葬师，为野人葬所得不过千钱，我家请为葬师，张闻大喜。兄曰：“尔能用吾言，吾畀尔葬；不用吾言，将求他师。”张生曰：“惟命是听。”于是兄自以己意处变，岁月日时及圻之浅深广狭、道路之所从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张生以葬书缘饰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无违异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位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备侍从，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视他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殓，装办而行，圻成而葬，未尝以一言询及阴阳家，迄今亦无他故。吾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人，而为世患，于丧家犹甚。若顷为谏官，尝奏乞禁天下葬师，当是时，执政莫以为意。今著斯论，庶俾后之子孙葬必以时。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sup>④</sup>则知；葬师之不必信，视吾之造葬则可鉴行事之耳。

竹湖公所言葬不必厚、阴阳地师不必信之说，藏柩历年久远以致遗失尸柩，此乃极言不葬者之罪，而勉速葬其亲至意。非有真<sup>⑤</sup>心而教子之薄待于父母而言耳。《书》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之意，盖上古之言亦有委之于壑盖归反藁槨而掩之，岂不仁仁孝子而发恻隐之心哉！圣人云：“丧具称家之有无，贫而厚不纯礼也。”孟夫子云：“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欤。”又曰：“非直为观美也，然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

①《福河李氏宗谱》中原文即为简体字“齐”。

②“奉”字，原谱因页面残破不可识，李阿山先生校补。

③“见”字，原谱因页面残破不可识，李阿山先生校补。

④“祖”字原谱中因页面残破不可识，据《全宋文》录司马光《葬论》原文校补。

⑤李阿山先生注释谓：真，当作“慧”，歹心也。下文同。



人皆用，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憾乎？吾闻之也，人子之情哀痛迫切无所不至，情有所施，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考圣人之言有而此，可知无薄待于父母也。厚葬其亲者天里<sup>①</sup>，当人情安矣。又孟夫子云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观斯言也，岂无地理山川之胜，孤虚旺相干支之利乎？中古之言“棺七寸，槨称之”，岂不是先代圣人之云叠叠有凭？我祖非不知书明理肯负罪于先圣先贤而不厚待于亲乎哉！今之停柩不葬推择地理者，可以自勉而知我祖之用心罔极，至诚激切以勉励子孙速葬其亲至意。推度竹湖公云考古卜宅卜日先谋人事之便，质之著龟庶无后艰及弃失尸柩之叹愍，岂不是伤情迫切而贵食稻衣锦饮酒作乐从官四方之安以戒以伤？推度此□即可知极言而出于不得已，故托此编斯论之枉悖，非教子孙薄待于父母。知书识礼之人，用心可以明白。我祖若有真心即不孝之罪，奚辞悖先圣之教、逆王化之罪？要堪岂容天鉴哉？为人子孙者切不可认真而明理揣度以勉之。二十世裔孙其钊号左文省勉切志敬题。

从《竹湖公论葬说》文后李斌所题评论文章开头“竹湖公所言葬不必厚、阴阳地师不必信之说……”乃至全文看，李斌认定此文确为李韶所作无疑。

## 二、《全宋文》收录司马光《葬论》

《全宋文》第56册卷一二一九司马光《葬论》出处是：“《司马公文集》卷七一。又见《皇朝文鉴》卷九六，《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八，《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六六，《山堂肆考》卷一五六，《文章辨体汇选》卷四〇九，康熙《永州府志》卷四，《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九七，《渊鉴类函》卷一八一，《宋元学案补遗》卷七。”<sup>②</sup>《全宋文》收录司马光《葬论》全文如下：

司马光《葬论》

元丰七年正月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亲之暴露，故敛而藏之。赍送不必厚，厚者有损无益，古人论之详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古者虽卜宅、卜日，盖先谋人事之便，然后质之著龟，庶无后艰耳，无常地与常日也。今之葬书，乃相山川冈亩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干支，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举世惑而信之，于是丧亲者往往久而不葬。问之，曰：岁月不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远方未得归也。又曰：家贫未能办葬具也。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弃失尸柩，不知其处者。呜呼，可不令人深叹愍哉！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为能收藏其形骸也。其所为乃如是，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犹有仁者见而殮之耶？先王制礼，葬期远不过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礼，未葬不变服，食粥，居倚庐，哀亲之未有所归也。既葬，然后渐有变除。今之人悖礼违法，未葬而除丧，从宦四方，食稻衣锦，饮酒作乐，其心安乎？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贤愚系于人，固无关预于葬。就使皆如葬师之言，为人子者方当哀穷之际，何忍不顾其亲之暴露，乃欲自营福利耶？昔者，吾诸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银珠玉之物，未尝以缁铢入于圻中。将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询阴阳，此必不可！”吾兄伯康无如之何，乃曰：“询于阴阳，则可矣。安得良葬师而询

<sup>①</sup> 李阿山先生注释谓：里，通“理”。

<sup>②</sup> 曾枣庄：《全宋文》卷一二一九《司马光·四八》，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6册，第158页。

之？”族人曰：“近村有张生者，良师也。数县皆用之。”兄乃召张生，许以钱二万。张生野夫也，世为葬师，为野人葬，所得不过千钱，闻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尔葬。不用吾言，将求它师。”张师曰：“惟命是听。”于是兄自以己意处岁月日时，及圻之浅深广狭，道路所从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张生以《葬书》缘饰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悦，无违异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备侍从。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视它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殓，装办而行，圻成而葬，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迄今亦无它故。吾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于丧家尤甚。顷为谏官，尝奏乞禁天下葬书。当时执政莫以为意。今著兹论，庶俾后之子孙葬必以时，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元丰七年正月日，具官司司马光述。<sup>①</sup>

### 三、李韶《竹湖公论葬说》乃抄袭司马光《葬论》而成之伪作

我们认为：《竹湖公论葬说》乃连江珠浦李氏家族李韶的后裔托伪之作，实为抄袭改动司马光《葬论》而成。理由如下：

第一，司马光（1019-1086）为宋代名相，名气当较李韶为大，且司马光生活年代在李韶（1177-1251）之前，而《葬论》原文署有明确的写作时间为宋神宗赵顼元丰七年（1084）正月，在李韶出生之前《葬论》已写就。因此，就算不论李韶自己抄袭之可能，其后裔抄袭之条件是存在的。

第二，《全宋文》第319册卷七三二四共收李韶文章共16篇，并无《竹湖公论葬说》一文，且所见诸方志及《珠浦李氏族谱》，亦未载录。而据上引《全宋文》编者于《葬论》文末所题，《葬论》更为《司马公文集》之外的九种其他传世古籍所载录。

第三，就文章之标题名称而言，可以推想，《竹湖公论葬说》更像是李韶后裔出于对李韶作为先祖的尊称而将“竹湖公”之尊号加进文章标题名称中，而后面之“说”字，则或许仅是为了与“葬论”倒文后为“论葬”之区别而有意加上的。就全文看，其字数也约略相近，字词句差异处也不太多（详下文）。

第四，《竹湖公论葬说》文中所提及之“吾兄伯康”，乃指李韶之兄李宁<sup>②</sup>，字伯康<sup>③</sup>。《宋史》卷四百二十三李韶本传云：“嘉定四年，与其兄宁同举进士第。”<sup>④</sup>巧合的是，司马光之兄司马旦，亦是字伯康。《宋史》卷二百九十八司马池本传谓司马池“有子旦、光。光自有传。”司马池本传附司马旦本传云：“旦字伯康。”<sup>⑤</sup>或乃因此巧合而更宜于李韶后裔托名作伪。

《竹湖公论葬说》的成文时间，最早的年份当在李韶死后，即淳祐十一年（1251）之后；最晚的年份应当即《福河李氏宗谱》修谱人李斌修族谱的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 四、《竹湖公论葬说》《葬论》互异文分析

《葬论》是最能体现司马光关于丧葬礼俗的观念的。主要有三点：“复古礼制，反对厚葬”；“贵

① [宋]司马光：《葬论》，《全宋文》卷一二一九《司马光·四八》，第56册，第157-158页。

② 李宁，《珠浦李氏族谱》载其名为李宁之。见族谱中“第十二世祖宁之公遗像”。其父为连江珠浦第十一世李文饶，字焕章。族谱中李文饶小传云：“嘉定四年联榜进士，长曰宁之，次曰韶，皆庭训之验，阴鹭之报也。”

③ 《福河李氏宗谱》见录《竹湖公论葬说》一文中，李阿山先生于“伯康”加注释云：“竹湖公之兄，讳宁，字伯康。兄弟于嘉定四年同第进士。”

④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李韶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册，第12628-12643页。

⑤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司马池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905页。

贱贫富、寿夭贤愚皆无关于葬”；“葬书、葬师不足信，驳斥阴阳风水之说”。<sup>①</sup>《竹湖公论葬说》也体现了司马光丧葬观的三要点。但经细查比对发现：《竹湖公论葬说》出现“阴阳地师”3次、“阴阳家”2次、“葬师”7次、“葬书”2次；《葬论》无“地师”一词，出现“阴阳”2次、“阴阳家”3次、“葬师”3次、“葬书”5次。“阴阳地师”“阴阳家”“葬师”皆指行阴阳风水之术的“人”，则合计《竹湖公论葬说》出现12次“人”，《葬论》只出现6次。《竹湖公论葬说》更强调阴阳地师、葬师说法不必信，反映了《竹湖公论葬说》作伪之年代，行阴阳风水之术的人的影响更大了；而《葬论》更强调葬书不足信。两篇文章是有所区别的。这也正是《竹湖公论葬说》与《葬论》在文章结尾处标明写作之用意在于训诫子孙的文字表述之不同：前者谓“葬师之不必信”，后者谓“葬书之不足信”。而李斌在《竹湖公论葬说》文后所附的评论，开篇即直指竹湖公李韶所说乃“阴阳地师不必信之说”。

《竹湖公论葬说》全文不含标点符号为800余字，《葬论》全文不含标点符号为790余字，二篇文章文字相差仅约20字，然其字词文句互异者共40余处。列表对照如下，参见表1：

表1 《竹湖公论葬说》与《葬论》互异文对照表

序号	《竹湖公论葬说》	《葬论》
1	齐送不必厚。	赍送不必厚
2	而拘于阴阳地师，禁忌则甚矣。	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
3	庶无后艰， <u>甬</u> 无常地与常日也	庶无后艰耳，无常地与常日也
4	今之葬师，	今之葬书
5	<u>非此地此时不可葬也。</u>	<u>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u>
6	举世皆惑而信从之。	举世惑而信之。
7	<u>送亲者，</u>	<u>丧亲者，</u>
8	<u>甚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弃失尸柩不知其处者有之。</u>	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弃失尸柩，不知其处者。
9	<u>夫人之所贵者身也。子孙者，欲后来以奉老而能收藏其形骸也。</u>	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 <u>为能收藏其形骸也。</u>
10	其所为乃若是，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犹有仁者见而殓之也！	其所为乃如是，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 <u>犹有仁者见而殓之耶？</u>
11	葬期不过七月。	葬期 <u>远</u> 不过七月。
12	又礼，未葬不变服，食粥，居庐，	又礼，未葬不变服，食粥，居 <u>倚</u> 庐，
13	今世之人，悖礼犯法，	<u>今之人悖礼违法，</u>
14	从官四方…… <u>于心安否？</u>	从宦四方…… <u>其心安乎？</u>
15	人之贵贱贫富寿夭俱系于天，贤愚不肖出于赋禀，固无关于于葬。	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贤愚系于人，固无关预于葬。
16	昔吾祖之葬也，	昔者，吾诸祖之葬也，
17	然金银珠玉未尝以锱铢入于圻中。	然金银珠玉之物，未尝以锱铢入于圻中。
18	奈何不询之阴阳地师？此必不可！	奈何不询阴阳，此必不可！
19	询于阴阳地师则可矣。安得有良葬师以询之？	询于阴阳，则可矣。安得良葬师而询之？

① 朱丹丹、王贺：《从〈葬论〉看司马光的丧葬观》，《运城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序号	《竹湖公论葬说》	《葬论》
20	葬者曰	族人曰
21	张闻大喜。兄曰：“尔能用吾言，吾畀尔葬；不用吾言，将求他师。”张生曰	闻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尔葬。不用吾言，将求它师。”张师曰
22	于是兄自以己意处变，岁月日时及圻之浅深广狭、道路之所从出……族人皆无违异者。	于是兄自以己意处岁月日时，及圻之浅深广狭，道路所从出……族人皆悦，无违异者。
23	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位致仕，	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
24	视他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	视它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
25	吾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人，而为世患，于丧家犹甚。	吾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于丧家尤甚。
26	若顷为谏官，尝奏乞禁天下葬师，当是时，执政莫以为意。	顷为谏官，尝奏乞禁天下葬书。当时执政莫以为意。
27	今著斯论，	今著兹论，
28	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则知；葬师之不必信，视吾之造葬则可鉴行事之耳。	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视吾祖；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
29		元丰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马光述。

从上表对比可知，《竹湖公论葬说》对《葬论》有改动，甚至出现了错字，大体上来说的确不如原文精彩。但是，《竹湖公论葬说》也修订了《葬论》原文的个别文字，润饰加强了《葬论》原文某些文句的语气，使之更显突出。兹举上表中之语例作为说明。

《竹湖公论葬说》之改动出错及不如《葬论》原文者，略举四例：

序号 1：《竹湖公论葬说》将《葬论》“赍送不必厚”之“赍”（繁体为“齎”）误抄成了简体之“齐”（繁体为“齊”）。当是形近致误也。“赍送”于文中谓发丧、陪葬物品之意，误作“齐送”则不成辞。

序号 3：《竹湖公论葬说》“甬无常地与常日也”之“甬”字为日常口语，且于此处当是作无实义解，否则对《葬论》“无常地与常日也”是一种反义表达已非原意。且《葬论》“庶无后艰耳”，作为语气词“耳”的使用，显得《葬论》更为文雅与精当简明也。

序号 14：《竹湖公论葬说》“从宦四方……于心安否”，首先“从宦”纵非不成辞，至少显生硬；“于心安否”其第三人称客观叙述语气不明确，且反问语气更弱。而《葬论》“从宦四方……其心安乎”，“从宦”更文雅，“游宦”之意，且“其心安乎”之第三人称客观叙述语气更明确，反问之语气更强。

序号 23：《竹湖公论葬说》“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位致仕”一句，较《葬论》中“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多出一“位”字，或当是衍文。

《竹湖公论葬说》之改动优于《葬论》原文者，亦举四例：

序号 6：《竹湖公论葬说》“举世皆惑而信从之”，较之《葬论》“举世惑而信之”，语义更周全，更强调葬师之说辞让举世之人全都迷惑而听信遵从不敢违逆。

序号 8：《竹湖公论葬说》“甚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弃失尸柩不知其处者有之”，较《葬论》“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弃失尸柩，不知其处者”，其强调之语气，批判久而不葬乃至抛弃尸柩致其遗失现象之语意，明显更为强烈。

序号 21:《竹湖公论葬说》将《葬论》“将求它师”改作“将求他师”,此处虽皆代指“其他的葬师”,是指代人。类似的还有序号 24:《竹湖公论葬说》将《葬论》“视它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改为“视他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即“它人”改为“他人”。但从语言的发展角度,就语义之演变变化而言,“它”改作“他”更精当。即现代汉语中亦常用“他人”而似不用“它人”。

虽“它”“他”旧时作“指代”义时虽多混用,然“它”似更多用于无生命之对象,“他”更多用于有生命之对象,比如人。<sup>①</sup>此现象于现代汉语中更为常见。<sup>②</sup>从“它师”改“他师”和“它人”改作“他人”这一细节,似乎也可印证《竹湖公论葬说》确实是抄袭《葬论》而晚出之伪作。

## 五、《竹湖公论葬说》附李斌评论之分析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丧葬的礼仪。宋代自然不例外。宋代的士大夫大力倡导规范的丧葬礼仪,他们总结改进完善儒家传统的丧葬理念制度使之适应宋代的社会实际情形,形成被官方认可乃至成文法规颁行的系统的“礼法”。作为民间社会礼仪实践的总结,司马光的《书仪》十卷中六卷是丧仪,朱熹《家礼》也有一卷专讲丧礼,足见丧葬礼仪之重要。但是民间的丧葬习俗却未必完全照此而行,还是存在矛盾的。宋代社会风水学说、阴阳之术、厚葬之风盛行,但是其最终目的都是非常现实功利的,即求有利于子孙后代的。《葬论》“可谓一针见血地道明了宋代葬俗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死者后代的前程……因而必须谨慎、精心地处理丧葬的每个细小环节,否则必会殃及生者。”<sup>③</sup>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考古学角度观察,“丧”和“葬”作为两个环节,宋代是“厚丧薄葬”的社会,“宋代葬期过长的现象是宋代政策和社会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形式之一。”<sup>④</sup>晚明思想家泉州晋江人李贽,依然批判指出当时人的“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sup>⑤</sup>的功利心。也可见风水阴阳之说依然影响着当时的社会丧葬习俗。而《大清律例·礼律·仪制》“丧葬”条更承袭了《大明律例》关于“丧葬”的明文规定:“凡有丧人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sup>⑥</sup>足见此风气清代依然存在。

《竹湖公论葬说》文后所附李斌的评论,开篇直指《竹湖公论葬说》一文之中心旨意:“竹湖公所言葬不必厚、阴阳地师不必信之说,藏柩历年久远以致遗失尸柩,此乃极言不葬者之罪,而勉速葬其亲之意。”明白无误地指出《竹湖公论葬说》出于强烈批判宋代当时丧葬风俗中有乖礼法的不正之风:厚葬其一,信阴阳地师葬书之说其二,藏柩久远以致遗失其三。此皆“不葬”之罪。作伪之文尚且如此,司马光《论葬》其中心用意更当然是如此。

当然,李斌的评论文章的用意还在于指出:先祖竹湖公李韶“勉速葬其亲之意”是真,而非有

①《汉语大词典》“它”字前三个义项分别是:“①别的;另外的。后多写作‘他’。”“②第三人称代词。多见于早期白话。”“③代词。称人以外的事物。”并且义项②③所引的各自第一个语例皆出自《朱子语类》。见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989页。《汉语大词典》“他”字作代词时前三个义项分别是:“①别的;另外的。”“②指另外的人或事物。”“③称自己和对方以外的某个人。古代、近代泛指男性和女性,现代书面上一般指男性。”并且三个义项所引的各自第一个语例皆出自《诗经》。见《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第489页。

②《现代汉语词典》“它”字作代词时其意义是“人称代词。称人以外的事物。”“他”字作代词时,其义项①是:“人称代词。称自己和对方以外的某个人。”并特别指出要注意“‘五四’以前‘他’兼称男性、女性以及一切事物。现代书面语里,‘他’一般只用来称男性。但是在性别不明或没有区分的必要时,‘他’只是泛指,不分男性和女性。”“他”字作代词时其义项④是:“指示代词。另外的;其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59页。

③游彪:《“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④吴敬:《宋代厚丧薄葬和葬期过长的考古学观察》,《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⑤李贽批判时人的自私功利云:“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见《焚书》卷一。[明]李贽:《焚书·续焚书校释》,陈仁仁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4页。

⑥《大清律例·礼律·仪制·丧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第672册,第639页。

“恇心”出于“教子之薄待于父母而言耳”。因此李斌于文中反复强调：“我祖非不知书明理肯负罪于先圣先贤而不厚待于亲乎哉！今之停柩不葬推择地理者，可以自勉而知我祖之用心罔极，至诚激切以勉励子孙速葬其亲之意。”“知书识礼之人，用心可以明白。我祖若有真心即不孝之罪，奚辞悖先圣之教、逆王化之罪？”也可见其维护先祖形象为其辩白之情真意切。但是从中也可看出李斌对于后代子孙或许依然受阴阳风水厚葬之风的影响而不速葬其亲是有所顾虑的。也因此他强调竹湖公李韶的本意在于遵古丧葬之礼，而不敢“悖先圣之教、逆王化之罪”，皆劝后裔应及时以葬。

进一步说，藉由李斌对《竹湖公论葬说》的评论亦可推知，时至清康熙三十一年李斌修谱作论之时，乃至更晚，在民间的葬俗中，依然是讲求厚葬、讲求阴阳风水，以致停柩年久不葬等的陋俗。时至今日，在福建的民间丧葬习俗中，厚葬与极重阴阳风水而停柩不葬等等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以福州地区为例，至今丧葬习俗中依然存在“注重酒食，盛设酒宴；迷信佛道，举行道场；拘泥风水，停柩不葬；鼓乐葬亲，丧礼高歌；更改丧仪，违反礼制”等现象。<sup>①</sup>当下的闽南漳州丧葬习俗现象相较福州而言，也是大同小异。换言之，当今的福建民间，讲求厚葬讲求风水的丧葬习俗依然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移风易俗，于当今社会依然很有必要且大有文章可作。

<sup>①</sup> 毛晓阳：《历代福州丧俗批判综述》，《闽江学院学院》2010年第3期。

# 论黄道周拟骚作品的艺术特色

——以《九诉》为例

吴 洁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明末大儒黄道周自幼爱好文学, 诗、文、赋样样精通, 其骚赋作品糅合个人经历、体验, 对屈原骚赋既有模仿又有创新, 《九诉》是黄道周成熟之作, 既很好地继承了屈原的语言风格、思想精神, 又有所创新, 注入了鲜明的个性。

**关键词:** 黄道周; 拟骚之作; 《九诉》; 作品特色

黄道周(1585-1646), 字幼玄, 号石斋, 漳州漳浦铜山(今福建东山县)人, 自幼爱好文学, 邗山弟子庄起俦编《漳浦黄先生年谱》中提到黄道周“七岁读父书, 过目成诵也”, “八岁即能为比偶文”, 自经传子集、诗赋声律、阴阳之学, 无不耽精, “十岁作古文词, 若有神授也”。<sup>①</sup>

明天启二年(1622)黄道周举进士, 因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 入翰林院学习馆课, 由此踏上仕途。此时正值明代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之时, 皇帝昏庸, 官吏贪酷, 民不聊生。后金崛起, 对明边境虎视眈眈, 整个明皇朝已病入膏肓, 积重难返,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道周性存忠孝, 尚气节, 贱流俗, 不媚权势, 立朝守正, 清直敢言, 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 几经浮沉, 屡受挫折, 隆武朝, 自请募师北上江西抗击清军, 兵败婺源, 不屈而死。<sup>②</sup>黄道周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文、赋、还是诗歌都糅合了他的这些坎坷经历, 托物寄情。

## 一、黄道周骚赋作品创作背景

黄道周长于写骚赋, 这与他生活经历、个人体验和文学背景有关系, 一是宋代以来, 国家内忧外患, 在理学思想推动下, 屈原虽遭谗见黜仍然眷顾楚国、心系怀王的忠君爱国形象及其廉洁人格和忠君大义与封建统治阶层所倡导的人臣形象、民族大义相吻合。统治阶层对其骚赋作品大力宣扬, 点燃了学者对继承楚辞创作的文化热情。二是因为明代中期以来文坛的复古之风日趋活跃, 表现之一即为大量骚体作品出现, 有很多著名作家, 如李梦阳、王守仁、杨慎、夏完淳、王夫之等都热衷于写作骚体作品。三是受黄伯思、朱熹等影响, 闽地楚辞学研究兴盛。<sup>③</sup>黄伯思, 北宋晚期学者, 所著《校定楚辞》十一卷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认识楚辞, 认为楚辞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顿挫悲壮”的楚文化特色, 《翼骚》一卷则开创了宋代评论类楚辞的先河。朱熹是闽学派的代表人物, 朱熹忠君、注重民族气节、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2015 年社科 A 类“黄道周诗歌用韵研究”(JAS150889)

**作者简介:** 吴洁, 女, 福建漳州人,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闽南师范大学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① [明]黄道周:《漳浦文选》附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台湾文献丛刊》137 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 年,第 363 页。

② 侯真平, 姜曾泉:《黄道周年谱考评》,《文献》1997 年第 3 期。

③ 陈良武:《黄道周骚体赋创作原因初探》,《云梦学刊》2015 年第 6 期。

身体力行等思想和实践对闽学者影响深远。朱熹是宋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其楚辞学代表作《楚辞集注》八卷，从以往传统研究章句之学转而研究文章大义和作家性情，对后世研究楚辞具有开创意义。朱熹不仅研究楚辞，也爱好写作骚体赋，主要作品有《感春赋》《招隐赋》《空同赋》等。其后，闽学者形成了一波研究楚辞热潮，产生了一批研究楚辞专著，例如，黄文焕《楚辞听直》八卷，陈第《屈宋古音考》等，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sup>①</sup>黄道周更是写作大量拟骚作品，在诗作中注入对国家对人生的现实关注和思考。四是黄道周本身对楚辞骚赋的喜爱。封建社会的文人，深受统治思想浸染，谙熟儒家经典，“君为臣纲”观念根深蒂固。屈原成为忠臣典范，成为历代文人自发的文化选择和崇敬。另一方面是对屈原身世遭际的共鸣。屈原为后世文人推崇，除了忠君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自身不幸遭际中体现的人格魅力，“绝世而独立”是文人面对自身困境时的一种榜样和慰藉。黄道周拟骚之作大多在内容上与屈原相涉相仿，原因正在于此。黄道周少好楚辞，加上黄道周一生境遇，不论是少时的秉赋、志向，还是忠而被谤的仕途，遭逢末世的时代悲剧，以及反抗侵略的命运抉择，皆与屈原有共通之处，而骚赋又长于抒情发怨，因此黄道周亲身实践并创作不少骚赋。

存世的黄道周骚赋作品主要见于《黄漳浦集》卷三十六“骚赋”。<sup>②</sup>共收有九篇六十二章：《睿骚》（九章）、《续招魂》（三章）、《续离骚》（二章）、《九绎》（十一章）、《九戾》（十一章）、《九诉》（九章）、《刘招》《续天问》《丛骚》（十五章），以及《闻雷赋》《梁山锋山赋》《洞庭赋》《平一赋》四篇赋作。另在卷二十八“杂文颂赞箴铭约揭题词”有《榕颂》一文。既有以屈原作品为范式，模仿骚体的拟骚之作，也有创新之作，如晚年所作《睿骚》。但最具诗歌艺术价值和代表性的，当属其拟骚之作，如《续离骚》《续招魂》《续天问》《九绎》《九戾》《九诉》等。本文拟以黄道周拟骚之作《九诉》（九章）为例，通过与屈原《九歌》（十一章）比较，一窥黄道周拟骚作品特色。

## 二、《九诉》创作主旨

《九诉》是仿屈原《九歌》之作，《九歌》（自汉以来学者对《九歌》篇数说法不一，或说9章，或说11章，或说虚指<sup>③</sup>）是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由屈原加工创制而成，具有浓郁祭祀特征。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里提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sup>④</sup>大意是指用事神之心，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屈原《九歌》接连赞颂了九位神祇，他们分别是《九歌》前9章的篇名：东皇太一（上皇）、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帝子）、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九诉》仿照此形制，也把神名作为主题，篇名分别是天帝、大司命、少司命、偃佺、山鬼、龙女、三尸、东华帝子、诺皋将军。其中相同的是《九诉》仿《九歌》诉说神祇是从天神到人间诸神，既有男性神灵也有女性神灵。与《九歌》不同之处在于出现了偃佺、龙女、三尸、诺皋将军等为道教、佛教所信奉的神灵。<sup>⑤</sup>

《楚辞学通典》认为《九诉》的创作主旨是“全篇借幽会神明，求善洁而不得，以明自修求进之意”。<sup>⑥</sup>黄道周《九诉》中《第一·帝无臣》即为全赋定下此基调。庄起涛《漳浦黄先生年谱》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弘光元年黄道周夜梦高皇帝凄然谓曰：‘卿竟舍我去耶？’先生对曰：‘朝廷舍

① 参见汤漳平：《闽学视野下闽地的楚辞研究与骚体文学创作》，《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7年，第118页。

② [明]黄道周：《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清]陈寿祺编，道光十年刊本。

③ 周建忠、汤漳平：《楚辞学通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3页。

④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页。

⑤ 郑晨寅：《论黄道周拟骚之作》，《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

⑥ 周建忠、汤漳平：《楚辞学通典》，第132页。



臣，非臣舍朝廷’。寤而惆怅，以是虽乞归，犹徘徊江渚，未忍遽去。”<sup>①</sup>此处“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笔者认为是对“帝无臣”的最佳注释。《帝无臣》最后一句“哀余思兮涕潺潺”，欲借《九歌》之格制，以事神之心向诸神灵诉说自己“离君、思君、怨君”欲诉无门的不平之情。此后各篇多次呼应这一感情基调，如《第三·少司命》“揽九州兮烦若思，终别绝兮交无时，恩不故兮怨终至”，《第八·东华弟子》“予独处兮余思离离，魂飘摇兮为君旗，日向昏兮中心悲”等。

### 三、《九诉》语言特色

《九诉》承接骚赋体式，篇幅精炼。《九诉》9章大致都在140字左右，字数最多是《第九·诺皋将军》180字，字数最少是《第三·少司命》112字。细读《九诉》，虽9章出现的意境、意象各不同，但是对于“君（天帝）”的爱慕、思念、被小人谗言中伤悲苦等情感却是贯穿一致的，《第二·大司命》“信存兮疑亡惘，徘徊兮飞安翔”，《第三·少司命》“与君游九疑，君自尊兮予自卑”“星摇摇兮日将出，草披披兮而在坠，与君兮结好，思所终兮捐其早，勉出涕兮为君道”，《第四·偃佺》“交不夙兮情不素，哀相去兮欢相慕”“言思君兮不得去，夙何时兮君中坚”，《第五·山鬼》“岁既暮兮风若其，君离余兮余不思”，《第六·龙女》“中不任兮上诉，逢帝子兮方含怒，君顾余兮为谁故”，《第七·三尸》“子不创兮祸所终，众莫知兮予所为”“白云生兮蒸蒸，水流兮磷磷，将高駝兮为帝陈”，《第八·东华帝子》“独处兮余思离离，魂飘摇兮为君旗，日向昏兮中心悲”，《第九·诺皋将军》“东风离离余将行”。

句式上，《九诉》每句都用“兮”字，且用于句中，用法较为自由。九歌句式有“○○兮○○”、“○○○兮○○”和“○○○兮○○○”三种类型，《九诉》句式上主要采用“○○○兮○○○”为主的二分节奏，《第四·偃佺》“交不夙兮情不素，哀相去兮欢相慕，欢相慕兮惠然顾，倏相并兮为余误。”《第六·龙女》“江有澜兮天益高，君叫怒兮生洄飏，日冥冥兮思君劳，君不来兮中胶胶。”当然也有少数句式，作者根据自己的意图于“兮”字前后增减字数，使之变得摇曳多姿。如“○○○兮○○”“○○兮○○”。如《第七·三尸》“白云生兮蒸蒸，水流兮磷磷”。至汉以来，骚体诗作在形式上皆有共同特点即“兮字成句”，大量使用“兮”字，使得句型参差错落，自由活泼，形成飘逸摇曳之美，极具艺术美感。

“兮”作为骚体的重要特征词，兼有文法和音乐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一个语气词，便于幽愤、悲怨等情绪的抒发；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史家林庚先生也指出“‘兮’字似乎只是一个音符，它因此最有力量能构成诗的节奏”。<sup>②</sup>“兮”字既能够有效调节诗歌节奏，又具有悠远深长的咏叹意味，黄道周《九诉》运用“兮”字句，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全诗定下忧愁忧思，哀怨感伤的基调，富含强烈的抒情意味，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采，全诗充盈民歌式自由想象、浪漫氛围和悲剧情怀。

用韵方面，屈原《九歌》11章用韵较为复杂，绝大多数都是两句以上换韵。当中既有三句一韵如《湘君》《河伯》《山鬼》，也有六句一韵如《云中君》《少司命》《山鬼》《湘君》等，甚至还有一韵到底，如《东皇太一》和《礼魂》两篇。黄道周《九诉》用韵情况也较为复杂。其中《第二·大司命》共17句，一韵到底。每一句韵脚“方、颜、常、阳、量、疆、荒、墙、戕、羊、盲、乡、旁、梁、伤、亡、翔”韵腹都是[a]，韵尾都是[-ŋ]。绝大多数篇目用韵多为前面几句一韵，后三句一韵，

<sup>①</sup> [明]黄道周：《黄漳浦文选》附明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第407页。

<sup>②</sup>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

如《第三·少司命》《第四·偃佺》《第六·龙女》《第七·三尸》《第八·东华帝子》这种转韵方式，能够很好地表现诗歌情绪波动和转折起伏。纵观第三、四、六、七、八篇，每篇前面都是情感融入情境意象描述其中，而后三句直抒胸臆，用陈述口吻直接表达忧愤悲慨之情。例如《第三·少司命》“与君兮结好，思所终兮捐其早，勉出涕兮为君道”，《第八·东华帝子》“独处兮余思离离，魂飘摇兮为君旗，日向昏兮中心悲”。其余各篇用韵较为复杂，有两句一韵，也有四句一韵。

在语言上，大量采用叠音词，既描摹景物，渲染环境，又调和音韵，增强语言节奏美；运用对偶句式加强语言的音乐效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九诉》除仿制《九歌》篇章、主旨，也借用了《九歌》乃至《楚辞》中其他篇章的词汇。如《九歌》中“扶桑”“洞庭”“玉佩”“九嶷”“九州”“美人”“霓裳”等意象，《九诉》（九章）亦有。借用《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中漫漫一词，化为《第四·偃佺》“天漫漫兮谁千载”。

《九诉》学习屈原《离骚》《九歌》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把香草、美人、神仙、灵物荟萃笔端，形成虽浪漫芳香却风雨飘摇，前途茫然的意境和画面。文章显得含蓄蕴藉，言近旨远。如《第五·山鬼》“美人兮气若兰”“折柔桑兮杂碧草”，借山鬼意象表达对天帝的爱慕和景仰。《第四·偃佺》“约蕙芷兮同精，专握手兮交行”。《第八·东华弟子》描写帝君形象“明霞冠兮芙蓉佩，予馭云兮为君盖，霓裳兮紫衣，予骞虹兮为君带”。同时也用香草、风、山、石等意象投射自身所处现状。如《第三·少司命》“星摇摇兮今日将出，草披披兮而在坠”。《第九·诺皋将军》“蹇蹇霓杂攘矫，予美好不得扬持”。

《九诉》关注现实，折射精神悲剧——怀才不遇，忧思难抑。萧统《昭明文选序》谈到“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这也是骚体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sup>①</sup>汉魏以后文人对骚体的形式与情感内涵存在双重认同，皆以骚体伤悼屈原作为情感触发点。而黄道周创作的情境与屈原心境相连，个人命运轨迹亦与屈原相通，在《九诉》作品中同样体现了其忧国忧君的爱国情怀，更凸显了其报国之志与现实窘境之间的矛盾。借用骚赋体式以及屈子语义，将个人遭遇与国事相糅合，真情流露，寄托了对政治命运的感叹，形成“古今同慨”的艺术感染力，借屈原的身世遭遇，抒发现实感慨。抒发强烈的悲愤忧郁之情。<sup>②</sup>

《九诉》等拟骚之作是黄道周屈骚情怀的结果，与所处时代大环境、个人学识和亲身经历有着密切关系。黄道周的拟骚作品很好地继承了屈原的语言风格、思想精神，并在模仿中有所创新，既很好地传承了骚赋这一艺术形式又赋予这种体式规格新的内容，又注入了鲜明的个性。<sup>③</sup>

当然，过犹不及，黄道周拟骚之作和诗文一样，由于写得过于曲折隐晦，甚至常常自撰新词，不够形象直观，妨碍了读者的理解和审美的畅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诗歌艺术感染力。

① 萧统：《昭明文选》，于平注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 参见于浴贤：《论黄道周骚体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③ 于浴贤：《论黄道周骚体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 何振岱的咏梅诗

杨 玲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何振岱被认为是“同光体”闽派的殿军人物, 因其生性散淡闲适, 不求名利, 耽于佛禅, 一生未仕, 主要以教馆为生, 深入研究他的学者并不多, 留下不少研究的空地。何振岱一生有“咏梅诗”35首, 可分为三个时期, 因为心境及时代的差异, 有着不同的梅花意象, 反映了其诗歌创作的某些特色。

**关键词:** 何振岱; 同光体; 咏梅诗

在“同光体”闽派诗人这个比较松散的流派中, 何振岱被认为是殿军人物。何振岱一生非官非商, 仅凭民间良誉, 贤达交赞, 先后辗转于福州、南昌、上海及北京等地, 交游颇广, 诗歌成就突出, 展示了辛亥革命之后士子们一种新的出路及人生追求, 无论从同光体诗人作为旧体诗的结响来看, 还是从何振岱其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来说, 其诗其人都值得深度研究。

何振岱(1868—1952), 字梅生, 又字心与、觉庐悦明, 花甲之年改字梅叟, 工诗擅文、能画善琴, 堪称典型的传统文人。梅生现存诗作一千余首, 而其中诗题中涉梅的有35首, 其字梅生、梅叟, 皆可见其对梅花的痴爱。梅花凌雪盛开、洁白清香, 得到历代诗人的偏爱。百花萧杀中独自傲放, 与诗人们的清高孤洁颇相契合, 经过数代诗人的反复吟咏, 形成了孤标傲骨, 冷艳芳姿的意象。何振岱半生求仕不得, 退而以行馆教子为生, 古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无疑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梅生人品孤标傲骨, 才华横溢, 其以生命吟咏的诗作深得时人赞誉, 诗品即人品, 其个人形象与梅花有几分神似, 其咏梅诗是何振岱诗人形象外化的一部分, 笔者细读何振岱的咏梅诗, 条分缕析, 以此显现何振岱独特的一个侧面, 论诗而知人。

裴斐先生说得好:“客观存在的月亮只有一个, 诗中出现的月亮千变万化。物象有限, 意象无穷。”<sup>①</sup>咏月诗中的月亮形象各异, 寄托也因诗境或诗人心境不同, 蕴涵千差万别。所以, 从自然物象来说, 天地之间只有一轮月亮, 但从意象上来说, 同一个物象有许多种类型的意象。咏梅诗也是如此。自第一首咏梅诗诞生以来, 无数的咏梅诗源源不断面世, 名家迭出, 名句迭现, 自然界的梅花虽然是相似的, 但是每一首咏梅诗因为不同的诗人、不同的心境及不同的背景、情境酿造了不同的意象。诗人何振岱创作了35首梅花诗, 因为心境及时境的差异, 创造了不同的梅花意象, 本文试着以最传统知人论诗的方式分析其咏梅诗的意象内涵。

## 一、《桔春集》咏梅诗的变调

《桔春集》是梅生的第一卷诗集, 自释“己酉以前诗曰桔春集”<sup>②</sup>。也就是说《桔春集》是梅生1909年之前的诗, 当时他已经43岁, 人到中年, 经历了三次会试, 皆铩羽而归。《桔春集》中收录

**作者简介:** 杨玲, 女, 江西莲花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sup>①</sup> 裴斐:《意象思维刍议》,《诗缘情辨》,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

<sup>②</sup> 何振岱:《何振岱集》,刘建萍、陈叔侗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了“咏梅诗”五首，早期的《乌石山亭晓望，时薛老峰边梅花初开，独坐成咏》铺张直描，功力乍现，但也失于显露：

万山绕吾州，一水明天际。晓霞绚帆影，叶叶疏林外。雉堞俯鳞脰，新蔬霜后翠。鸡寒栖树心，禽懒眠犊背。年芳入祀酬，村情闲畚耒。迎目几枝梅，丛篁不能翳。寻香乍近远，吹人但静气。千载矗孤峰，薛老联芳袂。吟魂风雨夕，芬芳相温慰。怪底古隐君，有偕欲遗世。远望旷我思，孤花深我契。岩居晚自春，逸境洵佳賚。<sup>①</sup>

开头一气十二句，纯用白描，直引梅花的出场。梅花若有若无的香味，梅花的独放，正如诗中所述“旷我思”“深我契”，诗人与梅花的相通相契也是直白道出，未免失之含蓄，但白描与旨意已见功力，而梅花的孤独与隐逸既有重复历代咏梅诗的旧调，也有种青年人为赋梅花强说隐的味道。

何振岱第四名中举后入谢章铤门学习，跟随谢夫子学习五年，深得其赏识。其时有咏梅诗如下：

隆冬嘘阳和，嘉辰践良会。梅花十三本，（王文勤公家有十三本梅花书屋，读书其中者多掇巍科。公莅闽，设致用书院，以经学课士。院中亦植梅如数，示期许之意。）诸生八九辈。仪瞻圣哲像，摩挲敦贞器。韩书展孤拓，（韩文公书鸚鵡赋惟潮州有拓本。）朱注玩残字。（朱子注《中庸》手稿三纸，颇有涂改。）密薰多古香，默识欲神契。少焉命骰核，山厨盛腊味。美绝洪都酒，（夫子主鹿洞书院时，载归名酒至美。）藉甚中丞菜。（文勤尝摘金薯叶作羹享客，客美之，称中丞菜。）盘匱寓文献，饮瞰咳训诲。夫子山斗姿，谭谐弥温蔼。一座皆尽欢，小子尤烂醉。（是日予以酒美多饮，至醉。）堂前风煽春，帘外山横翠。吟继衢樽图，（夫子掌教关中，尝饮诸生于所居衢樽阁，有图。）关闽两盛事。（《季冬廿三日，致用堂梅花盛开，谢夫子召饮侍坐，即事十二韵》）

此诗虽因梅花盛开而作，但全诗并无白描梅花之句，而以梅花为起兴之由，叙事及用典，展示诗人之协韵和用事之才华，才是此诗重心。何振岱于1904年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谢夫子仙逝于前一年，此诗应是在此之前。诗人自31岁中举后，汲汲于功名，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追逐入仕，这是传统知识分子最平常也最正统的路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情怀。“夫子山斗姿，谭谐弥温蔼。一座皆尽欢，小子尤烂醉。”满怀希望的诗人在自己敬爱的谢夫子的酒宴中言笑晏晏，师生尽欢，确乎是“关闽两盛事”。此事叙事颇见功力，人物事件如在目前，但作为咏梅诗来讲，缺少梅花意象及神韵。

然而，何振岱年过40后，诗风开始进入“深微淡远”境界。诗人曾数次游杭州，杭州的孤山、灵隐寺及理安寺都深得诗人喜爱，第一卷诗集创作了不少关于孤山、灵隐寺及理安寺的诗作。寺庙是世间最远离世俗的地方，诗禅佛神理相通。孤山北麓，有纪念北宋诗人林逋的放鹤亭。林逋系杭州人，长期隐居孤山，终身不仕不婚，遂有“梅妻鹤子”之说。林死后葬在孤山，鹤在墓前哀鸣而亡，亭内立“鹤舞赋”刻石。何振岱的《别孤山梅花》道：

乱堆残雪尚墙根，转眼南枝作蕊繁。花近水边知更好，日斜独映易消魂。微吟自爱闲风味，未老终谋数过存。别后梦魂应到此，山翁莫为掩篱门。<sup>②</sup>

孤山之梅自林逋之后带上林氏印记，既有“疏影横斜水清浅”之美，又自带隐逸之味。何振岱此诗的“花近水边”与“闲风味”有孤山之梅相似的气质，诗人不仅心有所感，甚至于魂牵梦萦，与前几年的明快欢乐已有较大差异。1905年科举考试已经取消，“达则兼济天下”的正途已经彻底

①《何振岱集》，第136页。

②《何振岱集》，第147-148页。

无路可通，如此时代巨变之下，深受传统书院研习的何振岱只能归隐内心，走向“穷则独善其身”的自我完善。两次杭州之行，十几首寺庙及孤山之诗，正反映了诗人内心从外事到内隐的转变。

## 二、知命倦余咏梅诗

何振岱将自己1909年至1922年的诗命名为《倦余集》，共得两卷，自释曰：“服闋后十余年，舟车劳形，文字劳心。樗质早衰，孱躯苦倦。有诗百余篇，皆劳苦中所得也。”<sup>①</sup>已过不惑之年的诗人已经安于为生活奔波的独善其身，在尘世的劳苦中，诗依然是他的灵魂伴侣，而咏梅诗更是诗人灵魂的慰藉。《湖心亭梅花下小饮》正是诗人舟车劳形之后难得的休憩与心灵旅行：

轻舟如乘虚，天水荡空碧。纤云流有声，孤鸟过无迹。双梅孕千花，深红凝古色。漾舟亭之阴，树老蛟龙瘠。瑶妃临明镜，婵娟意相惜。烟波媚逸姿，郁抱沁嘉觌。舟人载酒至，青山与劝客。杯空花不知，含情但脉脉。湖心寒转高，湖气淡欲夕。回舟数回顾，烟影荡魂魄。<sup>②</sup>

蕴含神理，深微淡远，毫无艰涩之态，这是诗人知命时期诗歌最显著的特点。如“纤云流有声，孤鸟过无迹”“杯空花不知，含情但脉脉”。细味颇有禅理，看破不说破，正得深微之旨。

何振岱知命之年的生日又特意作了一首咏梅诗：

停筏即问花，徘徊到日暮。五更闻寒香，披衣天欲曙。鸡声出篱落，蝶影导闲步。小溪接柴桥，千花耿回互。水光激红雪，人影裹晴雾。停筇初一村，映目又几树。旋转益无穷，幽深如在遇。我生属穷冬，冷襟谐野趣。原非钟鼎姿，或得江山助。黍酒谢殷勤，折枝压归路。（《五十生日避客凤冈，梅花盛开》）<sup>③</sup>

诗人在生日之际，特意坐着竹轿来看梅花，“停筏即问花，徘徊到日暮”，开头两句即表现诗人急切要见梅花的迫切心情，除了迫切，诗人爱梅更体现在赏梅之久，不仅一直欣赏到太阳西下。“五更闻寒香，披衣天欲曙”，在清晨五更时分，闻到梅香，竟不顾寒气，天濛濛亮即披衣盼着晨光好去赏梅。开头四句，由浅到深，一步步烘托诗人爱梅赏梅痴梅之心。诗人生于寒冬，性爱梅，不论字梅生还是梅叟，皆可见对梅的痴迷。铺描梅花落在晨光中赏梅的意境中：“鸡声出篱落，蝶影导闲步。小溪接柴桥，千花耿回互。水光激红雪，人影裹晴雾。停筇初一村，映目又几树。”塑造了一幅鸡声、篱落、蝶影、小溪、柴桥、千花、水光及人影融汇一体的乡村赏梅图。梅生寒冬，百花萧杀中，独自傲放，且散发着香气，历来得到孤高清姿的称誉，容易产生由物及人的联想。诗人吟梅赞梅，何尝不是在自抒心臆。此诗再次体现了诗人会心微妙，时见哲理；妙趣横生，以意笔胜的诗歌特色。

再如诗人的《园梅初放》：

角声依旧度清霜，风外飘香石径荒。不及别前舒素萼，梅花有恨倚红墙。<sup>④</sup>

霜寒及梅香如影随形，梅花通常有粉、白、红等颜色，从“素萼”可知这是白色的梅花，正因为纯洁的白色，才与红墙相衬成趣，一字“恨”，更将梅花的灵魂刻画活起来了。角声、清霜、飘香、石径、素萼、梅花、红墙，这些物象在度、荒、舒、倚的带动下，灵动飞跃，真不愧会心微妙，以意笔胜啊！

①《何振岱集》，第134页。

②《何振岱集》，第165页。

③《何振岱集》，第168页。

④《何振岱集》，第169页。

### 三、耳顺从心咏梅诗

1923年，何振岱年近耳顺，应故人柯鸿年邀约，于当年冬天来到北京，一居八九年，此间诗集成《燕台集》《燕台续集》二卷，集中共有咏梅诗14首。自言“感世事之易迁，念此间之可老，欲以诗篇写之，苦不能尽也”<sup>①</sup>。

1932年7月，何振岱携夫人郑元昭南还福州，仅一年多集诗《小憩集》一卷，归去来兮，诗情大发，此集得咏梅诗7首，诗人耳顺从心创作咏梅诗共21首，占其所有咏梅诗的六成。可见梅花是诗人从心所欲之物，咏梅诗也是诗人从心所欲之作了。

何振岱到了北京自然也不可无梅，故而有隆福寺买梅诗了。

花翁评芳自为谱，谓胭脂红花最古。红虽近古盆盂物，未见漫山千万树。冲寒不寻驴背诗，纸窗竹屋吾则宜。年年买花过萧寺，春怀浩荡无人知。（《隆福寺买古红梅花》）<sup>②</sup>

北京隆福寺曾是朝廷的香火院之一，成为京师著名的大庙会。因坐落在东城，与护国寺相对，俗称“东庙”。在京城无立锥之地，自然无法植树种梅，但也可买盆古红梅花聊以自慰。“年年买花过萧寺，春怀浩荡无人知。”一枝梅花一年春，年年来寺庙买古红梅，岁岁梅花在严寒中带来春的讯息，无人知晓“春怀浩荡”，但诗人由一盆古红梅感知到春天正浩浩荡荡而来。

在北京的日子诗人想到故人故梅，不由得又以诗抒发思念之情。

北来又经冬，日在忧患里。今晨暂开颜，买鱼祀夫子。樽醪佐寒菜，再献不备礼。壮年受深海，蹉跎忽暮齿。受恩岂一端，欲报海无底。慈言镌我心，慈影妥我几。终身如侍侧，慕思永无已。依稀旧山斋，红梅映朱履。（《先师谢夫子生日，具鱼酒、梅花致祭》）<sup>③</sup>

梅花清雅俊逸的风度使古今诗人画家为它赞美，更以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神而为世人所敬重。中国历代文人志士爱梅、颂梅者极多。梅花以它的坚贞不渝、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因此梅又常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自古以来，人们都赞美她的傲雪精神，她的孤独及不与百花争春的高洁美。

谢夫子嗜菊，何振岱爱梅，菊与梅在中国诗歌意象中都象征着高士，具有孤标傲世的品质。师生生日刚好相差一月，谢夫子生前，何振岱曾协韵和作咏梅诗，谢夫子仙逝后，何振岱依旧不忘师恩，每至生日，具鱼酒、梅花致祭，师生之间虽人世两隔，但情谊不断。所谓“壮年受深海，蹉跎忽暮齿。受恩岂一端，欲报海无底”。诗人常常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何振岱也不例外，即便在致祭恩师事上，依然不自觉地注入自己深切的情怀，以梅献祭而不是以菊献祭也可见一斑。梅花的君子高士品质事实上也深得谢夫子喜爱，谢章铤曾作梅花词《金缕曲·庭梅半开，独步花下，风过时坠一二片，韶华不居，零落可感》。诗人忆起恩师“依稀旧山斋，红梅映朱履”，可以说既是回忆中的意象，也很可能是往日的实景。

福州乌石山上有宋梅一株，山附近被英军占领。据传，英国人想砍掉这株宋梅，先数日，此梅竟憔悴而死。谢章铤的梅花词写的正是这株特别的宋梅，借惜梅花实际是惜乌山、惜闽省、惜大好河山。这株宋梅，也进入了何振岱的审美视野，形成了何氏咏梅诗：

昔日神光寺，欹崖倚宋梅。忆予读书处，犹见数花开。沧海忧鲛鮓，花官鞠草莱。无人思

①《何振岱集》，第134页。

②《何振岱集》，第220页。

③《何振岱集》，第260页。

此树，独自踏苍苔。（《神光寺寻宋梅不见》）<sup>①</sup>

一个“昔”字道出世事已非。神光寺正在乌石山上，也是诗人昔日读书处。“无人思此树，独自踏苍苔”，宋梅已经憔悴而死，世间已经无人思忆此梅，诗人“独自踏苍苔”何尝不是百思千回，反映诗人不随流俗的品格，独怀宋梅的孤寂，渲染了一片悲凉之境，与回忆中的“欹崖倚宋梅”“犹见数花开”简直是明媚与凄凉的差异。

看花固喜晴，细雨亦无碍。屹立濛濛中，嫣然送静睇。天水旧因缘，托根得香界。历代老禅徒，尊礼视先辈。听法悟无生，有身宜不坏。冻禽饫僧粒，粉蕊舍弗嘬。著花虽不多，高韵倾一世。譬如古散圣，落落自天际。乔松并长寿，怪石映奇丽。归途逢晴晖，几枝又竹外。吹香荒陌闲，可人抑其次。（《长庆寺宋梅著花，冒雨往看》）<sup>②</sup>

长庆寺即福州“西禅寺”。西禅寺犹如园林，红梅古荔，怡情静心。何振岱对宋梅情有独钟，不论是乌石山的宋梅，还是长庆寺的宋梅，总能引发诗情。宋人多有咏梅佳作，何振岱推崇的宋代咏梅诗人之一是陆游，对陆游的“一树梅花一放翁”颇为赞赏，既以之做扇面，还因此题诗。刘建萍教授曾这样评价道：“如果说何振岱早年的咏梅诗笼罩在林逋咏梅词境界的影响之下，那么，何振岱晚年的咏梅诗则追步陆游咏梅词的精神，借梅抒写人生的不遇与痛楚，表达愤慨不平的心声。”<sup>③</sup>由此可见，何振岱晚年喜咏宋梅，与诗人晚年的诗学兴趣及心境转向有着很大的关联。“看花固喜晴，细雨亦无碍”，晚年的何振岱与禅佛庙宇关系更密切了，诗心与禅心本有相通之处，欣赏梅花，晴雨皆可，与佛家的随喜相通。许多诗僧在文学界也颇有声誉，如与何振岱交往密切的西禅寺楞根大师的弟子周衍巽，法号慧明，留下《慧明居士遗稿》。诗人长庆寺赏宋梅，深得佛禅之味。“天水旧因缘，托根得香界。历代老禅徒，尊礼视先辈。听法悟无生，有身宜不坏。冻禽饫僧粒，粉蕊舍弗嘬。著花虽不多，高韵倾一世。譬如古散圣，落落自天际。”诗中谈佛论道，何振岱可谓入彀里手。何振岱创作了不少与奉佛礼佛及与佛界人士唱酬诗作，如《景屏轩池上月夜赠无辨》《江阁楞根上人夜谈》《山房钱春并送僧楞公归太姥》《四月廿四日借佛感昔》《和无辨》《和无辨夜坐》《答迦陵问报书》等等，与佛有关的诗作数不胜数。战乱频仍的动荡时代，诗人寄情事佛寻找精神的慰藉所在，孤高自洁，避免与世同污。诗人叹曰：“吾州岌岌在风雨中，所信佛力庇荫，或可减轻劫数，是不能无望于有心者之帮助耳。”<sup>④</sup>衰残之年的诗人无力报效国家，唯有事佛祀安了。“咏梅诗”对于诗人而言，与事佛礼佛相似，也可以算是一种精神慰藉。“归途逢晴晖，几枝又竹外。吹香荒陌闲，可人抑其次。”佛家的世界生发尘世的希冀，颇合何振岱思微得妙理，惨澹得生新之趣。

①《何振岱集》，第246页。

②《何振岱集》，第247页。

③刘建萍：《何振岱评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5页。

④《何振岱集》，第51页。

# 试论晋城古堡与福建土楼的异同点

王军雷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2)

**摘要:** 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分别代表着北方和南方民居建筑, 两者在聚族而居、平战合一、多元信仰和崇文重教方面展现出相同的特点, 但在修建原因、聚居方式、建筑布局和防御体系方面又存在差异。两地古堡的相似和差异, 与其背后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有着密切的关系。探讨两地古堡的异同, 有助于推动文化旅游的发展。

**关键词:** 晋城古堡; 福建土楼; 比较研究; 文化旅游

## 一、晋城古堡与福建土楼概述

### (一) 晋城古堡类型及分布

晋城古堡主要指分布在沁河流域一带的修建于明末清初的用来抵御农民军入侵的古代民居。比起神秘森严的中世纪欧洲古堡, 座落于晋城的明清古堡群更具东方神韵。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 再加上明朝末年的战乱, 造就了整个沁河流域数量巨多、价值颇高的古堡建筑群。晋城现存古堡 54 处, 多为明末清初时期修建, 大部分维持着历史形态, 延续原有的生活功能, 是“活着的”遗产。其中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堡有 8 处: 皇城相府、湘峪古堡、窦庄古堡、郭峪古堡、柳氏民居、上庄古堡、郭壁古堡、砥洎城。除此之外, 晋城还有良户、大阳、周村、屯城、上伏、南安阳、洪上村等形制犹存、古风依然的古堡式村落。其体量之大在中国北方十分罕见。

沁河中游的明清古堡有三种基本类型: 平原城堡、山岗城堡、坡地城堡。古堡群主要分布在沁水、阳城、泽州三县几十公里间, 沁水以上, 泽州之下, 均未见古堡。这三个县的古村镇各有特色, 类型丰富而又变化, 沁水、阳城两县正好位于沁河中游肥沃地段, 古村镇分布于沁河主流两岸, 多带有防御军事性质, 如窦庄、郭壁、湘峪等; 泽州县的古村镇则沿沁河最大支流丹河和旧时贯通沁水、阳城、泽州的重要古驿道——清化大道分布, 大多依托古道发展成商贸型村镇, 如拦车、天井关、冶底等。<sup>①</sup>

### (二) 福建土楼类型及分布

福建土楼特指分布在闽西和闽南地区那种适应大家族聚居、具有突出防卫功能, 并且采用夯土墙和木梁柱共同承重的多层的巨型居住建筑。福建土楼的数量经初步统计总共 3700 多座, 建造年代从明嘉靖年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福建土楼的类型主要有三种: 圆楼、方楼与五凤楼, 此外还有诸多变异的形式。五凤楼多建在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1331 工程”研究专项课题《太行山全域开发视野中的传统村落与康养旅游的融合发展研究》(zx-18144)。

**作者简介:** 王军雷, 男,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

<sup>①</sup> 张 冉:《沁河中游古村镇空间构成解析——沁河中游古村镇系列研究之二》,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年, 第 10 页。



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带,主要集中在永定县的高陂、坎市、胡雷、抚市4个乡镇,方形土楼主要分布在从平原向丘陵过渡的中间地带,多建在龙岩、永定、南靖三县交界处。圆形土楼主要分布在闽西龙岩、永定县、闽南南靖县、平和县等山区。这些圆、方土楼分为通廊式和单元式。通廊式主要是闽西客家人的聚居建筑,单元式主要是闽南人的聚居建筑,他们外观造型相同,平面布局差异极大。

①

## 二、晋城古堡与福建土楼的相同特点

### (一) 聚族而居

在传统聚落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是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它对维系聚落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封建社会,出于安全和生存的需要,以共同祖先、同一姓氏的群体聚居在一起,或者几个姓氏的家族聚居在一起形成聚落。

祠堂成为聚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无论晋城古堡还是福建土楼的形成都与祠堂有着紧密的联系。宗祠或者祖堂是村落的核心,是同宗同祖的族人祭祀祖宗或集会议事的场所,在宗祠中还设戏台,宗祠兼做公共的娱乐场所。因此它代表着崇高和永恒,象征着宗族的团结。以宗祠为中心,以族长为代表的家族制度成为族人心中的法律准绳,这种家族制度把全族人紧密地凝聚在一起,成为世代聚居的内在因素。

### (二) 平战合一

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建筑形制上虽有差异,但都有固若金汤的外墙与封闭的院落,既能御敌于外,同时又能满足居民的生产、生活的需要。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基本上都修建于明清社会动荡时期,因而这些建筑都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试想在安定的环境中产生的民居形式,决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防卫需求。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他们极其重视防御,他们将住宅建成一座易守难攻的城防,聚族而居。里面水井、粮仓等生活必需设施一应俱全。毫无疑问,在冷兵器时代,为了生存与发展,建造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时,既考虑到如何适应生活的需要,又考虑到怎样有效地防御外敌的入侵,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两地建筑都体现了防御为本、平战合一的建筑特点。

### (三) 多元信仰

在传统聚落中民众离不开宗教信仰。在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民间信仰基础上,吸收了道教、佛教的成分,巧妙融合形成以民间信仰、道、佛合一的多元信仰。依照其宗教信仰,在村落内外和居室内外供奉神灵,并赋予他们特定的功能,期望民众的生产生活以及各种事项都能得到神灵保护。

祠庙是聚落的中心,通常位于古堡的核心位置或者交通要道,晋城古堡以汤帝庙、府君庙、关帝庙、魁星楼等为主,福建土楼以土地庙、关帝庙、魁星楼、妈祖庙等为主,其中,既有一致敬奉的保护神,也有各自区域内独具特色的神灵,都一起形成了各自区域社会内极具特色的多元信仰体系。宗祠的首要功能是祭祀祖先,通过祭祖,达到敬宗爱族的目的。庙宇的功能是满足民众渴望人丁兴旺、辟邪祈福、祛灾纳祥的心理诉求。总之祠庙是强化族人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聚落中民众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

### (四) 崇文重教

在传统社会,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所以崇文重教观念

① 黄汉民:《福建土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5页。

十分盛行。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均设有学堂或私塾，每一家的门上，都忘不了“耕读”二字。这正是重视文化教育的表现。明清时期晋城和福建文风兴盛，人才辈出。晋城以阳城县为例，明清时出了95位进士，居山西之冠。其中天官王府王家共走出了5位进士、6位举人、贡生、监生数百人之多，所以当地有“三庄上下伏，举人秀才两千五”的谚语；皇城相府的陈家共出了9位进士，19位举人，41位贡生，其中6人入翰林，因而获得“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美誉；<sup>①</sup>福建以永定县为例，明清两代全县考取进士36人，举人335人，其中土楼里走出了12名翰林，其中坎市镇清坑村一户廖氏人家四代五翰林，至今仍被传为佳话。<sup>②</sup>

### 三、晋城古堡与福建土楼的不同之处

#### （一）修建原因不同

任何一种民居形式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建筑类型。

沁河是黄河的支流，沁河流经晋城境内往往形成相对平坦的山坳和肥沃的土地，这就为晋城古堡的出现提供了绝佳的地理环境。同时晋城古堡的出现还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明末崇祯年间，政治腐败，灾荒连年，陕北的农民起义跨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晋城因为经济富庶、商业发达、高官大贾云集，又是南下中原、北上太原、东指京师的咽喉要地，成为农民起义军长期盘踞和攻掠对象。为了躲避农民军的野蛮暴行，保卫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一轮又一轮动乱后，当地士绅和商贾纷纷倡议、捐资修筑堡寨，普通百姓也纷纷参与修筑堡寨以保自安，这一时代大背景促成晋城修筑堡寨的高潮。因此可以说是山水相依的地形和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晋城古堡群。

福建土楼的出现也与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福建闽西为山区、闽南为沿海，因此这一带历史上一直是战乱频仍之地。明朝嘉靖年间的倭患，加上部分反明武装和海盗，在福建沿海各地进行骚扰抢劫，烧杀掠夺，直至发展到攻城陷堡。其中漳州受倭患最严重，官兵的无能，导致山贼、倭寇的侵掠变本加厉。漳州人民无法指望官兵的护佑，而抗倭者为了自己的生存，纷纷效仿建造速度快的官建城堡，就地取材，土楼应运而生。沿海土楼的建造从明朝嘉靖年间出现，到万历年间最盛，因此土楼是漳州沿海人民抗倭的产物。<sup>③</sup>

明代嘉靖以后，倭患渐渐平息，而闽粤之交的福佬与客家族群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在斗争中，闽南人和客家人纷纷兴建防御性很强的土楼以相互防御。因此为了抵御沿海倭寇的侵扰、以及山区之中的猛兽，为了在客家和福佬两大民系的矛盾、家族间的械斗中获胜，福建土楼应运而生。

#### （二）聚居方式不同

聚族而居是汉民族共同的聚居方式，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都有聚族而居的特点，但两者也有显著的差异，尤其是福建土楼的聚居方式明显不同于晋城古堡。其不同之处表现在：

其一是单楼一族聚居，同居异财。在以族聚作为主要聚居关系的聚落中，宗族的构成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以一个人口数量众多，实力雄厚的大姓为中心聚居的单核独聚形式，二是几个实力相当的姓氏以各自为中心聚居形成的多核团聚形式。<sup>④</sup>福建土楼大多是以一族聚居，属于前者。一个家族聚居在一座巨型的土楼之内，聚居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在土楼内居住的是多个同宗同祖的小家庭，而不是一个同居共财的大家庭。

① 谢红俭：《晋城古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② 廖东、唐齐：《解读土楼——福建土楼的历史和建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③ 珍夫：《福建土楼探源》，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④ 王家康：《沁河中游传统聚落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1年，第9页。

晋城古堡中以陈氏为核心的皇城相府和以柳氏为核心的柳氏民居属于前者,而郭峪村则是由几十个姓氏组成的,其中主要是陈、王、张三大家族,郭壁堡由张、王、韩、赵四大家族构成,他们属于后者。一个大家族聚居在一座巨型的城堡之内,多个同宗同祖的小家庭聚居在不同四合院中,但却是一个同居共财的大家庭。

其二是均等向心的聚居模式。在晋城古堡中通常是严格按照家族的尊卑秩序、长幼辈分来分配居住用房,同宗不同支系往往独门独院,在各个支系的院落中继续按照尊卑秩序、长幼辈分来分配居住用房,如此往复,强烈地体现了封建纲常伦理秩序。但在福建客家方形与圆形土楼中,整个家族不分尊卑、不分辈分地住聚族而居。无论是通廊式还是单元式,从第一层的厨房到第二层的仓库,再到第三、四层的卧室大小相等,不分老幼尊卑一律平等。

在中国古代历来有敬天祭祖的观念,每个家族都建有宗祠或者祖堂,均能体现向心理念和宗祠、祖堂的权威地位,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都不例外。较晋城古堡,福建土楼向心性体现得更为显著一些。象征着祖先、家族和睦和宗族团结一致的祖堂大多都建立在土楼的中心,成为土楼中最为雄伟壮观的建筑。各户都朝向中心的祖堂,环绕祖堂,形成拱卫祖堂的布局特点。

### (三) 建筑布局不同

作为典型的北方民居大院,晋城古堡内部格局规整有序,道路结构清晰、主次分明,道路骨架多为“丰”字形或相近的变形,宗祠或庙宇多分布于堡门附近及主街的尽头,这体现了我国封建时期的传统礼制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堡中院落以四合院或三合院式为主,在房屋结构上,四合院多为两层,有时正房为三层。一层作为居室,二层多为储放物品的仓库,称为楼院。这种砖木结构的楼院是晋城古堡最主要的建筑结构形式。院落一般采用“四大八小”形式,“四大”即正房、东西两厢和倒座,“八小”即“四大”的旁边各自附带的耳房。在“四大八小”的基础上不断衍生组合,形成了串院、套院等组合,进而形成了体量庞大的古堡。

福建土楼和晋城古堡一样都采用了规整的对称布局,体现了中国以中为尊、中轴对称的伦理秩序,这种秩序在五凤楼体现得淋漓尽致,它的厅堂、主楼和大门都建在整幢土楼建筑的中轴线上,横屋和附属建筑呈左右对称分布在左右两侧。在福建土楼中,如果说五凤楼的空间布局是中国传统尊卑亲疏伦理秩序体现的话,而圆楼和方楼内部却打破了尊卑有序的观念,体现了平等和谐的观念。把等级最高贵的祖堂放在圆心的位置,各户都环绕朝向中心的祖堂,体现出强烈的向心性、均等性。无论是通廊式还是单元式的土楼,居住空间均是按竖向分配使用,每户占一二个开间,底层做厨房餐厅,二层做谷仓,三层以上做卧室,居住空间呈线状组合的空间布局又显然不同于晋城古堡的横向块状分配。这种向心的空间布局,表现出土楼家族强烈的内聚力,这种空间线状布局的聚居方式,反映了家族内部的平等关系。

### (四) 防御体系不同

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基本上都修建于社会动荡时期,因而都具有一套严密的自成体系的防卫体系。两者外部都有高大的城门和外墙,内部都建有房屋、庭院和水井,日常生活必需品和设施应有尽有,既能防御又能固守。但因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防御对象不同,因而两者也有显著的差异,尤其是晋城古堡在建筑材料、防御设施、因崖就河、防御体系等方面明显优于福建土楼。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是建筑材料更加结实。从建筑材料上讲,晋城古堡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砖石,而福建土楼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土木。具体到城墙上,晋城古堡基本都是由砖石、坭埭等材料建成,现存相对完整的堡垒如窰庄夫人城、砥洎城、郭峪堡、湘峪堡等都是用砖石或坭埭修筑的。一些经济条件差的村落仍采用夯土筑墙,但仍在城口、城楼等关键部位采用更经久耐用的青砖。相比福建土楼用夯土修筑更加坚固,更加易守难攻。

其二是防御设施更加完备。福建土楼的防御设施主要包括外墙、窗户、大门等,相较于福建土楼,晋城古堡不仅仅有外围防御设施,还包括内部街巷、民居院落、商业区、公共建筑等。具体为外有护城河、城墙,并且城墙上建有城楼、敌台、垛口、炮台等设施。城内有成排的藏兵洞、幽深狭窄的巷道、过街骑楼,街巷两侧建筑的高宅深院,以及高大的庙宇楼阁等公共建筑,战乱时这些设施都成为防御的重要节点。

其三是巧妙利用山川地势。福建和晋城两地都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福建土楼和晋城古堡的建造都能因地制宜,形态各不相同。虽然也都强调负阴抱阳,藏风纳气,注重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关系,追求天人合一,但在巧妙利用山川地势来增强防御性上晋城古堡更胜一筹。背山面河的湘峪古堡,建在湘峪河谷北侧的山坡上,城墙绕河而建,修建在岸边的石壁与陡坡上,湘峪河紧贴城墙向西流去,成为古城的护城河。砥洎城建于沁河岸边一块天然巨石之上,东、北、西三面环水,只有南面开城门与润城镇相通。此外,郭壁古堡、郭峪古堡等均建在崖壁之上。沁河及支流都属于季节性河流,由于长期的冲刷沉积,形成谷地山坳,古堡均建在河流两岸,就是想利用河流下切形成的陡崖增强其防御性。如湘峪堡、郭壁堡、砥洎城等都充分利用了沁河及支流,所以因崖就河成为晋城古堡的典型特点。

其四是防御体系更层次化。福建土楼的防御体系通常由外墙、楼门、窗户等组成。相较于晋城古堡,它的防御体系只是立面的防御,而晋城古堡由外而内,逐渐向纵深发展,形成了多维化、立体化的防御体系,因此其防御体系更复杂,更富有层次。其防御体系包括外围防御、巷道及两侧院落防御、公共建筑防御和看家楼防御四层。外围防御体系包括护城河、城门、城墙及城墙上城楼、垛口、望楼、垛口和藏兵洞等建筑设施。藏兵洞内部空间很大,既可储藏兵力,又可囤积战备物资。这些藏兵洞战时屯兵,闲时是牛羊的栖息地,可谓平战结合,一物两用。第二层防御体系就是迷宫似的巷道、过街骑楼和街巷两侧院落构成。进出自如的院落、迷宫似的丁字街巷构成了完善的内部防御体系,一旦敌人攻破城墙,胡同中间的过街楼可以使两边院落互相串通,城内居民聚集起来进行反击,保护自己。第三层防御体系是由堡内庙宇神祠公共建筑,这些建筑均建在最醒目的村口或者堡中制高点,平时供奉各路神仙,从精神上护佑居民;战时这些高大坚固的楼阁变身为抵御外辱,保卫乡民的阵地。第四层防御体系为古堡中的看家楼,如皇城相府的河山楼、郭峪堡的豫楼、湘峪堡的三都堂,选址通常在古堡的制高点。通高5-7层不等,窗户全朝向院内,外墙不设窗,站在顶层,既可瞭望敌情,又可接收堡内的各种信息,将对外防御和对内监控巧妙的融为一体,成为古堡中的最后一道抵御敌人的防线。<sup>①</sup>

## 结语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对晋城古堡和福建土楼等古堡建筑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对两地建筑的比较研究非常必要。通过对两地古堡建筑的比较,挖掘深厚的文化内涵,无疑将会对提升两地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实施文化旅游精品战略,增强文化强省地位有着长远的意义。

<sup>①</sup> 郝文军:《明清时期晋东南堡寨聚落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199页。

# 台湾竹枝词中的民俗节日研究

——以农历七月为例

刘国棋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台湾竹枝词对中国传统节日和台湾各地风土民情的描述十分丰富。台湾一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民俗节日, 种种酬神祭鬼, 以七月中元普度的盂兰会祭为最。七月又有中国情人节之称的七夕节与读书人最为重视的魁星爷诞辰。农历七月竹枝词创作相当丰富。就场域的观点而言, 流寓者、宦游者与本土乡绅的竹枝词有不同的特征, 流寓者作品多忧患之情, 宦游者咏述个人宦旅经验, 本土文人着意于乡土反思与批判, 皆深具文化诠释的意义。

**关键词:**台湾竹枝词; 民俗节日; 七夕节; 魁星爷诞辰; 中元普度

## 一、前言

竹枝词原为乐府之名, 亦呼巴歙词, 或通称竹枝歌,<sup>①</sup>本为巴、歙(今四川东部)一代之民歌。文人竹枝词的萌芽源自中国唐代的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唱和之作, 白、刘两人的文学创作本有通俗平易的特色, 使竹枝词初形成时即有通俗的本质。<sup>②</sup>后人仿效刘禹锡七绝形式的竹枝词体式, 歌咏各地方风俗小事。<sup>③</sup>竹枝词格律轻松, 世俗题材无可收纳, 相较传统诗词, 自然别有一种灵活的民间色彩。<sup>④</sup>台湾竹枝词累积的作品内容林林总总, 写作的题材与风貌琳琅满目, 已成为一种叙述风土的特殊诗体。从早期清朝文人的采风记异变成台湾本土文人的写景吟咏, 后来再变为记述岛内岁时节庆和民俗活动的作品。这些竹枝词作品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描述十分丰富, 显示出台湾承袭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然而台湾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的典型, 又有异于中国大陆传统的习俗。一年当中就有许许多多的民俗节日, 而种种酬神祭鬼, 就是七月中元普度的盂兰会祭最耗资财。<sup>⑤</sup>七月又有中国情人节之称的七夕节与读书人最为重视的魁星爷诞辰, 显得农历七月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月份, 文人在这月所创作出来的竹枝词也最为丰富, 本文仅就在台湾地区文人所创作出来描述农历七月份七巧节与中元节的竹枝词加以探讨。

## 二、七夕节习俗

我国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 相传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 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女

**作者简介:**刘国棋, 男, 福建金门人,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① 陈香:《台湾竹枝词选集》,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第2页。

② 翁圣峰:《民歌的纪实与改写——日治时期梁启超〈台湾竹枝词〉的创作与出版新论》,《台湾学研究》第14期, 2012年12月, 第53-72页。

③ 刘怡伶:《竹枝词名谊考析》,《中极学刊》第四辑,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2004年12月, 第23-50页。

④ 王德威:《台湾:从文学看历史》, 台北:麦田/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第55页。

⑤ 江宝钗:《台湾古典诗面面观》,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9年, 第193页。

儿节”，又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sup>①</sup>据传织女是一个奇能百巧的女工，她在人间传授织锦绣花技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女子针黹技能是农业生产力的其中之一，因此，每逢七夕，女子会向上苍祈求有一双巧手，故而称为“乞巧”。古代对“乞巧”这活动很重视，要张灯结彩、摆瓜果、妇女儿童要穿戴整齐，这种习俗在汉代就已出现。在我国各地的风俗不尽相同，例如：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等地乞巧的习俗是用面粉制各种小型物状，用油煎炸后称“巧果”，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女孩对月穿针，以祈求织女能赐以巧技。绍兴农村有许多少女会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传说夜深人静时若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少女便能得到忠贞不渝的爱情。浙江金华一带七夕则家家都要杀一只鸡，意为人们希望牛郎织女能天天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在广西西部，传说七月七日晨，仙女要下凡洗澡，喝其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七夕这天鸡鸣时，人们争先恐后地去河边取“双七水”，取回后用新瓮盛起来，待日后使用。广州的乞巧节是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至五更，要连拜七次。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在福建，七夕节时要让织女欣赏、品尝瓜果，以求她保佑来年瓜果丰收。供品包括茶、酒、新鲜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鲜花和妇女化妆用的花粉以及一个上香炉。一般是斋戒沐浴后，大家轮流在供桌前焚香祭拜，默祷心愿。台湾在七夕当天，会在床上摆设麻油鸡、油饭、金帛和婆姐衣等祭拜婆姐。另外，凡是给七娘妈作契子的孩童，七夕黄昏须在门口摆设供桌设七娘坛，准备鸡油饭、胭脂水粉、鲜花、金帛和婆姐衣等祭品，并以铜钱系上红丝线，挂在孩童颈部，称为“挂褙”，此后每年七夕都要祭拜七娘妈，并更换红丝线，直至十六岁为止。农历七月初七亦是魁星爷诞辰，“魁星”系北斗一星宿名，民间谓“魁星主文事”，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所以一定在七夕这天祭拜，祈求保佑自己考运亨通。相关民俗活动，参见图1。



图1 台湾七夕风俗照片

<sup>①</sup> 于童蒙：《中国节》，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 三、台湾七夕节的竹枝词

郑大枢<sup>①</sup>的《台湾风物竹枝词》<sup>②</sup>中有：

今宵牛女度佳期，海外曾无鹊踏枝。屠狗祭魁成底事，结缘煮豆始何时。

七夕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会面的佳节，传说七夕当晚由喜鹊所搭成“鹊桥”，然而台湾当地并无喜鹊，故曰“海外曾无鹊踏枝”。是日亦为魁星诞辰，读书人杀狗取头，以祭魁星爷。台湾传统民间在七夕当天，以煮豆和糖以及芋头龙眼等甜点作为礼物相赠，称为“结缘”，但不知此风俗始于何时。

张湄的《七夕》<sup>③</sup>中有：

露重风轻七夕凉，魁星高燕共称觞。幽窗还听喁喁语，花果香灯祝七娘。

此诗《七夕》同样到说到家家设牲礼、果品、花粉之属，夜向檐前祭献，祝七娘寿诞。同时这天也是魁星的生日，士子为魁星会，竟夕欢饮。

蔡振丰的《苑里年节竹枝词》<sup>④</sup>中有：

香花酒果列多盘，高供巍巍七妈坛。有巧似知人尽乞，小儿身上乞平安。

此诗说明七夕这天供桌摆满香花、水果和酒，并设置高大的七娘娘坛以供祭拜。女子祈求手艺灵巧，儿童祈求平安长大。

施琼芳的《乞巧》<sup>⑤</sup>中有：

瓜果中庭默祝时，剧怜儿女太情痴。休论仙巧人难乞，巧似天孙亦别离。

这首亦是说明在庭院供桌上摆放瓜果默默地向织女祈祷，求取美丽容貌与灵巧双手，以期能有一段美满良缘，也非常同情牛郎织女一年才能相见一次的命运。不禁感慨仙巧都难以乞取，而有巧如织女也要忍受与牛郎的别离的痛苦。

施钰的《重度七夕》<sup>⑥</sup>中有：

乞巧邻闺盛绮筵，穿针少妇拜神仙。劝侬莫学天孙巧，巧似天孙见隔年。

同样的，这首《重度七夕》亦是七夕看到邻家少女摆满整桌的供品向神仙祈祷，而有所感慨。诗劝人不要学织女的灵巧，灵巧如织女照样要忍受与牛郎隔年相见的悲哀。

①《全台诗》第二册《郑大枢》，台南：台湾文学馆、远流出版公司，2004年，第72页。郑大枢，字子如，福建侯官人。乾隆初渡台，入府幕，喜优游，亦喜察民俗，前清康熙六十年(1721)例贡。

②陈香：《台湾竹枝词选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31-232页。

③《全台诗》第二册《张湄》，第145页。张湄，字鹭州，号南湖，又号柳渔，浙江钱塘人。清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曾任《大清一统志》编修。乾隆六年(1741)四月十二日由翰林院迁巡台御史，兼理提督学政。在台二年余，严查冒籍，校士公明，政绩卓著。颇重文教，在台期间主岁、科两试，曾仿夏之芳《海天玉尺》编有《珊瑚集》，选取诸生课艺佳作，纂集而成，以为士子科考撰文之楷模。

④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379页。蔡振丰(1862-1911)，字启运，后以字行，又字见先，号应时，亦作运时，台湾新竹人。光绪十二年(1886)将咸丰年间成立之竹、梅二诗社，改组为竹梅吟社，自任社长。1897年与鹿港许剑渔共创鹿苑吟社。诗作颇多，有《养余轩诗钞》，未刊；《栢社第一集》曾录存18首，名曰《启运诗钞》。命其子汝修录其竹梅吟社课稿及唱酬之作，编为《台海击钵吟集》，共收诗四百余首。

⑤俞育婷：《台湾古典文学精选集11——施琼芳集》，台南：台湾文学馆，2013年，第137页。施琼芳(1815-1868)，初名龙文，字见田，一字昭德，号珠垣。中进士后，改名琼芳。清台湾县治(今台南市)人。与林晴皋、冯虚谷、蔡廷兰等结为至交，常相唱和。道光乙巳(1845)中恩科进士，施氏生平著作颇多，散佚过半，仅《春秋节要》与《石兰山馆遗稿》由其子嗣士洁携渡中国大陆，方得以保存。

⑥《全台诗》第五册《施钰》，第13页。施钰(1789-1850)，字少相，一字霄上，号石房居士，原籍福建晋江。清嘉庆八年(1803)东渡来台，遂寄籍于竹塹。为章甫弟子，道光四年(1824)成岁贡，不仕，设教乡里。道光二十二年(1842)西渡，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泉州北山别业。著有《台湾别录》二卷、《石房樵唱》四卷。

孙霖<sup>①</sup>的《赤嵌竹枝词》<sup>②</sup>中有：

结缘才过又中元，施食层台市井喧。三令首除罗汉脚，只教普度闹黄昏。

薛约的《台湾竹枝词》<sup>③</sup>中有：

才过乞巧结缘天，好事头家漫赚钱。海口红灯燃百盏，中元普度又喧阗。

七夕煮豆拌，裹洋糖，同龙眼、芋头分饷，名曰结缘。以上二首竹枝词都说明了七夕过了之后就是中元节。中元节这天常会有俗称“罗汉脚”的单身汉来抢孤打降，结党滋事。做头家的人要敛集众人之钱，以便张灯庆中元。

#### 四、中元普度习俗

中元普度习俗是由盂兰盆会“目莲救母”的故事演变而来，目连为救母亲脱离苦难，于是向佛陀请示解救之道，佛陀指示目莲于农历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日，以百味五果置于盆中供养十方佛僧，超度众恶鬼，其母才能得以济度；目连于是依法设供，最后与父母同修证果，为十八罗汉中的目莲尊者。

每年农历七月，是台湾人俗称的“鬼月”，相传七月初一，阴间的鬼门便会开启，让一群无人供奉的孤魂野鬼来到阳间享受人们的奉祀，直到七月底，鬼门便会再度关闭，而所有亡魂，则又得重新返回阴间。鹿港地区昔日普度是从农历七月初一至八月初三，各角头分区划地轮流举行，称为“轮普”，该月除了祭拜的普度活动外，有的地区也举办抢孤、放水灯等活动。

抢孤活动源自清代，每当人们普度完毕，都会将祭祀用的供品绑在数十公尺高的孤栈上让众人抢夺，所有参赛队伍必须以迭罗汉的方式，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沾满牛油的棚柱及孤栈，过程中，需将孤栈上的食物割下，丢给棚下的民众们捡拾，最后取下栈尾上的顺风旗才算获胜。屏东恒春的抢孤活动是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于恒春古城东门旁举行。而宜兰头城抢孤的抢孤活动是在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鬼门关时举行。

放水灯的习俗，主要是用来帮助水中孤魂照亮道路、接引水中孤魂上岸以接受众人普度的一种仪式。相关习俗，参见图2。



七月初一竖旛旗

盂兰盆会大士爷

中元普度民众捡拾供品

八大八小祭品

抢孤活动一

抢孤活动二

图2 台湾中元普度习俗照片

①《全台诗》第三册《孙霖》，第139页。孙霖，字武水，号美门居士，浙江吴兴人。连横《台湾诗乘》谓其于乾隆初期来台湾，曾绘制渡海图，并征咏诗。其作《赤嵌竹枝词》注中曾述及巡道觉罗四明、台湾知府余文仪、台湾知县陶绍景禁演夜戏事，可推断其当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或稍后渡台。

②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第217页。

③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第265页。薛约，清嘉庆年间江苏江阴人。生平不详。



## 五、台湾中元普度的竹枝词

何澄的《台阳杂咏》<sup>①</sup>中有：

闽人信鬼世无俦，台郡巫风亦效尤。出海大雉刚仲夏，沿乡普度又初秋。

这首说明福建人相信鬼神是无人能匹敌的。而台湾这个地方巫覡降神的风俗更是特别盛行。六月出海禳祭，期以驱除瘟疫、消灾避祸，驱逐疫鬼。七月每一个乡村又要举行普度的祭典活动。

陈朝龙的《竹塹竹枝词》<sup>②</sup>中有：

七月兰盆盛会兴，修斋施食仗高僧。招魂先把高幡竖，又向溪头放水灯。

此首叙述盂兰盆会先礼佛斋戒供养高僧，并在七月初一将幡竿高挂以便招呼孤魂野鬼谓之“竖高幡”，并在溪头燃放莲花灯谓之“放水灯”，而郑用锡作了“盆设盂兰演到场，先期绝路引灯光。喧天箫鼓于龙舞，惹得城厢尽若狂。”<sup>③</sup>陈述庙宇延请道是僧人做法会，家家户户点“老大公灯”为孤魂野鬼照明引路，舞龙舞狮锣鼓喧天，道说了台湾农历七月人人热衷参与盂盆会到达“狂”的整个热闹场景。

郑大枢的《台湾风物竹枝词》<sup>④</sup>中有：

香烟缥缈绕盂兰，果号菩提佛顶盘。普度无遮观自在，纸灯夜静散波澜。

菩提果种出荷兰，又曰“释迦果”。张鹭洲诗：“清果菩提绕室馨，金包柑橘丽繁星。更怜斗大波罗蜜，磔砢真同佛髻青。”中元盂兰会，延僧建醮做普度，或三、五、七昼夜不定。高搭木台，排列瓜果、饼饵之类。至夜，以纸为灯千百种，头家捐银钱藏于第一盏内，燃放水中，渔船争相攫取，得者以为一年顺利之兆。

蔡振丰的《苑里年节竹枝词》<sup>⑤</sup>中有：

广设盂兰好道场，慈和宫里闹踉跄。闹梨化食浑闲事，大众皈依拜鬼王。

道士设坛诵经的地方称“道场”，中元普度每个角头皆设有每个角头的道场，非常的普遍，苗栗苑里则以妈祖庙慈和宫人来人往最为热闹。道行高深的阿闹梨诵经化食给诸鬼魂，广大的民众大家归信，一起来膜拜大土爷，显示中元普度各地热闹的局面。

黄赞钧的《普度竹枝词》<sup>⑥</sup>中有：

山珍海错竞华筵，鳞凤鱼虾巧制妍。莫笑盘中多是假，哄神骗鬼未妨然。

在描写供桌上所展示的山珍海味，有鳞、凤、鱼、虾等八大八小的各种造型，以争奇斗艳。盘中虽然都是哄神骗鬼非为真实，但其雕花的艺术性极具有观赏的价值，并未妨碍中元普度的习俗。

① 王德威：《台湾：从文学看历史》，第60页。何澄字竟山，浙江山阴（今绍兴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因牡丹社事件，日本窥伺台湾，东南有警。时沈葆楨督台湾海防，以巡抚王凯泰励行清苦，心思缜密，开山抚番诸大役，宜以任之，乃奏请以巡抚由福建移驻台湾，经理番社起衅事宜，何澄以知府奉檄随营，处理抚署文案。暇则与王凯泰及举人马子翔等相唱和，各得《台阳杂咏》数十首，与雍正年间之巡台御史夏之芳所作作先后辉映，传播艺林。

② 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第366页。陈朝龙（1859-1903），字子潜，号卧庐，竹塹（今新竹市）人。少时以工诗能文而闻名，光绪四年（1878）任东城义塾教席。教读之余，亦加入竹梅吟社。台湾巡抚邵友廉于光绪十八年（1892）计划纂修通志，获聘与郑鹏云共同担任新竹县的采访工作，两年后完成《新竹县采访册》。著有《十瓣斋诗文集》，已佚。

③ 余育婷：《台湾古典文学精选集7——郑用锡集》，台南市：台湾文学馆，2012年，第114页。郑用锡（1788-1858）字在中，号祉亭。先世福建漳浦人，乾隆年间由金门迁居苗栗后壠，后避分类械斗迁竹塹。嘉庆二十三年（1818）中举人，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为第一位台湾本籍出身的进士。晚筑“北郭园”，著有《北郭园全集》八卷。

④ 陈香：《台湾竹枝词选集》，第232页。

⑤ 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第379页。

⑥ 陈香：《台湾竹枝词选集》，第267页。黄赞钧（1874-1952），字石衡，号立三居士，台北市大龙峒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生。尝梓行《感应录》《崇圣道德报》（共出版七十期，至1945年3月停刊），以教化社会。著有《大同要素》及生平吟咏为《海鹤楼诗钞》上下二卷。

庄嵩的《鹿江竹枝词》<sup>①</sup>中有:

盂兰盆会盛乡间, 焰口宏施鬼一车。使派争夸街尾戏, 排场还让菜园猪。

施让甫<sup>②</sup>也写道:

瓜秋朔旦鬼门开, 日演梨园几十台; 三十日间轮遍遍, 自夸普度冠全台。

这两首竹枝词都是描写鹿港中元普度的盛况, 过去鹿港以每日分区普度一个月的方式, 从农历七月初一至八月初三, 各角头分区划地轮流举行, 即是所谓的“轮普”, 使孤魂野鬼每日都能享受人间祭品, 民众也趁此机会轮流宴客联络感情, 人鬼同欢。鹿港地区昔日普度流传有一首“鹿港普度歌”, 内容是“初一放水灯(夜间在鹿港溪流放水灯以引导水中孤魂上岸), 初二普王宫(即今公会堂, 昔为厦郊会馆, 庙名万春宫), 初三米市街(今改名为美市街), 初四文武庙(由彰化进入鹿港镇的左边), 初五城隍宫(即鳌亭宫城隍庙), 初六土城(清代水师游击署所在地, 日据时改为小火车站), 初七七娘妈生(拜七娘妈、床母), 初八新宫边(即新祖宫), 初九兴化妈祖宫(即兴安宫), 初十港底(龙山寺的南边, 清朝为船舶最远可达之地), 十一菜园(鹿港国小旁, 分为顶菜园和厦菜园), 十二龙山寺, 十三金盛巷或是衙门(北路理番同知署, 今为鹿港国小), 十四铁鬼埕(今城隍庙前第二市场), 十五旧宫(即天后宫), 十六东石(北头渔村东石里), 十七郭厝(北头渔村郭厝里), 十八营盘地(泉州街附近, 为清朝水师驻扎地), 十九杉行街, 二十后寮仔(忠义庙左前方至乐观园), 廿一后车路(即后车巷), 廿二船仔头(北方福德祠西侧, 昔为船只停泊处), 廿三街尾(鹿港街镇的南端), 廿四宫后(天后宫后方), 廿五许厝埔(鹿港国中后方), 廿六牛墟头(景灵宫前方一带, 为牛只贩卖集中市场), 廿七安平镇(民俗文物馆前), 廿八泊仔寮(文开國小左前方), 廿九通港普(鹿港其他角头为普度者在这天补普), 三十龟粿店(糕饼店), 八月初一猪砧(猪肉摊), 初二米粉寮(米粉业者), 初三乞食寮(乞丐集中地), 初四乞食食无肴(普度结束, 乞丐无处吃拜拜)。”从中可想见当年各角头互相较劲, “输人不输阵”的奢华热闹场面。

黄逢昶的《台湾竹枝词》<sup>③</sup>中有:

中元肴果列层台, 夜夜灯花绕市阑。鸭作高山鸡作塔, 人人竞说抢孤来。

许南英的《台湾竹枝词》<sup>④</sup>中有:

盂兰大会最闻名, 鸡鸭豚鱼饭菜羹。一棒锣鼓出入耳, 有人奋勇上孤棚。

黄赞钧的《普度竹枝词》<sup>⑤</sup>中有:

高扬锦旗拂云飞, 短棍长橈护四周。谁似猿猴好身手, 竿投十丈夺标归。

这三首竹枝词除了描写中元普度街头巷尾张灯结彩, 供桌上鸡鸭鱼肉鲜果供品摆满的盛况外,

① 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 页412。庄嵩(1880-1938), 字伊若, 号太岳, 又号松陵, 鹿港人。擅诗书。与谢颂臣、林幼春、蒋渭水、庄垂胜等时相往来, 又与林痴仙情同莫逆, 从游加入“栎社”。1917年与施家本、丁宝濂等人创设鹿港最大的诗社“大冶吟社”。著有《太岳诗集》《太岳诗草补遗》《太岳文存》。

② 庄研育:《鹿港中元普度》随意窝 Xuite 日志, 2011年11月01日, <http://blog.xuite.net/cs47129006/twblog/187904095-E9%B9%BF%E6%B8%AF%E4%B8%AD%E5%85%83%E6%99%AE%E5%BA%A6>, 2018年8月25日。施让甫(1900-1967), 鹿港大儒书法家, 曾任“聚鸥吟社”社长, 鹿港大冶吟社, 浚励吟社, 洛江吟社社员, 为鹿江之诗文名家, 著作有《鹿江集》《春晖草堂集诗存》等。

③ 王德威:《台湾:从文学看历史》, 第60页。黄逢昶, 字晓暉, 湖南湘阴人。清光绪初年宦游台北, 其子黄芷陔汇编其诗文, 刊行《台湾纪事略》, 又称《台湾杂志》, 书中载有《台湾竹枝词》百首, 记录在台宦游之见闻。此外, 台湾银行另编纂有《台湾生熟番纪事》一书, 除收录《台湾驱寇论》《上岑宫保抚番稟稿》《台湾生熟番輿地考略》等文外, 收录了七十五首《台湾竹枝词》。

④ 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 第339页。许南英(1855-1917), 字子蕴, 号蕴白、允白, 自号窺园主人、留发头陀、龙马书生、毗舍耶客、春江冷宦。清台湾安平人。早年成立“闻学舍”, 以教书为业, 光绪十六年(1890)登进士第, 钦点主事, 签分兵部车驾司加员外郎銜。后返台南, 管理“圣庙乐局”事务, 并参与垦土化番之职。光绪二十年(1894)应唐景崧聘, 协修《台湾通志》。在台南时曾参与崇正社、浪吟诗社, 与施士洁、汪春源、丘逢甲、陈望曾等人唱和往来。1913年, 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建成, 林尔嘉广邀诗文同好组“菽庄吟社”, 许南英亦常参与盛会。现存《窺园留草》包括《窺园诗》《窺园词》。

⑤ 陈香:《台湾竹枝词选集》, 第269页。

也描述了一声锣鼓响，众人抢孤的盛况，尤其第三首的描述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到那旗海飞扬，木柱高筑，抢孤者身似猴的矫健身手，从十丈高的地方，光荣夺标的盛大场面。

郑鹏云的《新竹竹枝词》<sup>①</sup>中有：

孟兰胜会斗繁华，女伴娉婷伞半遮。绝似芙蓉初出水，一枝叶护一支花。

这首写出新竹中元节时，民间张灯结彩，争相炫耀，妇女就像芙蓉初出水般清秀出尘撑伞观赏祭祀法会络绎不绝的热闹场面。

施琼芳的《孟兰盆会竹枝词》<sup>②</sup>中有：

大地风扬纸蝶灰，浮屠旧事目莲开。花瓜初罢穿针会，又见孟兰荐福来。

六道三魔孰见真，瑶坛不少拜经人。倒悬无限人间苦，偏是冥曹解脱频。

玉京花果记遗文，人海喧阗会若云。十万河灯齐放夜，棠梨月冷鲍家坟。

给孤园内靡金钱，忏遍空王愿力坚。祝与酆官妖雾散，笙歌灯火太平年。

这整组竹枝词描述了孟兰盆会是因目莲救母的故事而创的，七月初七才穿针设瓜果，接着又是七月十五孟兰盆会祭神求福的法会。佛家所谓的六道三魔真的有人见识过吗？仙人居住的瑶坛却有不少的拜经之人。孟兰盆会是为了解脱阴曹地府孤魂野鬼的苦。玉京花果诵经的场面，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在河里放水灯的场面非常壮观。将纸钱焚烧给孤魂野鬼，就是希望地狱的妖气能烟消云散，人间能够过个太平的日子。

陈肇兴的《到鹿津观水陆清醮普度》<sup>③</sup>中有：

沸天锣鼓彻宵喧，一片灵风闪彩幡。十字街中人似织，不知何地着孤魂。

万枝灯火绮筵开，金纸如山化作灰。此夕酆都应不夜，鬼门放过绿衣来。

狼籍杯盘等布金，给孤园里肉成林。不知一例谈功德，可有慈乌返哺心。

谁把天花散道场，信男善女七宵忙。年年苦被西僧累，一个兰盆误十方。

陈肇兴到鹿津观看水陆清醮普度所写的竹枝词，是众多描述台湾宗教信仰的诗作之一，不仅将当地“清醮普度”的传统描述得栩栩如生，还加入了个人看法。普度时排场浩大，贡品罗列，极尽浪费之事。对于此风俗陈肇兴是不能认同，甚至提出批判，直言阳世间仍有饥民挨饿，台人却只注重鬼神之祀。更有斗富者，以普度建醮为炫耀财力的场所，豪奢浪费，令人不解。台湾民间习俗，认为中元普度之时，定要大肆张罗，务必丰盛。才能对得起先人，并且能让无主孤魂，得到抚慰，而不再扰乱世间。也难怪郑用锡作了“恤祭阴孤饭满筐，抛遗尘土杂余粮。可怜南邑珠同贵，莫贷监河半粒偿”<sup>④</sup>，以此来奉劝台人，莫要铺张浪费糟蹋食粮，甚至有其他郡县闹饥荒，米与珍珠同贵还要去借贷买米祭祀孤魂野鬼。而劝人祭拜虽要敬，但仍要以人为主，才不至于本末倒置。

黄赞钧的《普度竹枝词》<sup>⑤</sup>：

家家户户庆中元，古事相沿古俗存。岂止贫寒争浪费，后村热闹到前村。

① 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第342页。郑鹏云（1862-1915），字毓臣，或作毓丞，号北园后人。原籍福建永春。同治四年（1865）其父祥和署理淡水厅儒学训导，自福建永春州来台，卜居竹堑北门外涵雅，遂为新竹人。生平雅好诗文，活跃于竹梅吟社，常代表该社到各地击钵联吟。作品甚多，或因家贫，未能结集出版，几皆散佚。另编有《师友风义录》一书，收录清季台籍人士或与台湾有关者之作品，凡诗家127人，作品二百七十余首，光绪二十九年刊行。又与王人骥、郑以庠等合编《送米溪先生诗文集》。

② 李宏健：《历代竹枝词选》，第270-272页。

③ 顾敏耀：《台湾古典作家精选集15——陈肇兴集》，台南市：台湾文学馆，2011年，第177页。陈肇兴（1831-1866？），字伯康，号陶村，彰化县人。初设教里中，咸丰三年（1853）入邑庠，选补廪膳生。九年中式举人（是年补行八年戊午正科乡试）。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起事，七月谋刺潮春，不中，几濒于险。闰八月避入集集内山，教化训练番民，组成队伍助官军平乱；夜则秉烛赋诗，追悼阵歿，题曰《咄咄吟》。著有《陶村诗稿》六卷，与《咄咄吟》二卷合刻于世。清中叶中部古典诗人代表，被视为彰化文学史上“磺溪精神”的开创者。

④ 余育婷选注：《台湾古典文学精选集7——郑用锡集》，台南市：台湾文学馆，2012年，第118页。

⑤ 陈香：《台湾竹枝词选集》，第267-269页。

列栅糍粽积崔巍，肉腻鳞鲜羽族肥。底事祭余凭夺取，百年陋习不言非。

道出台湾中元普度的陋习，即使是穷困人家也一样浪费，而且是整个地区都是，糕糍粽子堆积如高峻的山丘，猪肉鱼虾鸡鸭样样都有，这种百年的陋习不知何时才能停止，恐怕也无人能说得上来。

彭廷选的《孟兰盆会竹枝词十二首》<sup>①</sup>中，也大量描述普度排场的浩大，极尽浪费之事亦是不能认同，诗云：

冥府缘何不赈灾，鬼犹饥饿亦堪哀。生前想必饕贪惯，又向人间乞食来。  
有饌飧篮酒盈尊，享祀无须待子孙。好事解囊多信士，自家曾否报亲恩。  
金钱糜费万千偿，何不存留备救荒。生度方为真普度，舍人度鬼总茫茫。

这三首创作，道尽世俗应适可而止，在外慷慨解囊，在家是否也一样孝亲。花费巨资在普度亡魂，为何不用这些钱去赈灾救荒，最后感慨地说“生度方为真普度，舍人度鬼总茫茫”以警示，值得世人省思。

## 六、结语

台湾竹枝词的作者有多位并非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如：郑大枢是福建侯官人，张湄是浙江钱塘人，施钰是福建晋江，孙霖是浙江吴兴人，薛约是江苏江阴人，何澄是浙江山阴（今绍兴县）人，黄逢昶是湖南湘阴人，郑鹏云是福建永春人。当然也有台湾人，如蔡振丰、陈朝龙、彭廷选是新竹人，施琼芳是台南人，庄嵩、施让甫是鹿港人，许南英是安平人，陈肇兴是彰化县竹山人，黄赞钧是台北市大龙峒人。这些文人将在各地七月节日的所见所闻以竹枝词的形式创作出来，这些作品兼容并蓄，成为现代人研究传统节日非常重要的文献史料。然而前者对亲眼看到的节日活动有别于原乡，多以一种新奇的视野为出发点，重在表面的描述。相对而言，后者对本地的节日活动有较深层的认识，除了表面上的描绘之外，有兴有赋，有讽有劝，多加入个人的省思与批判，用以抒发个人内心和移风易俗的思想。就场域的观点而言，流寓者、宦游者与本土乡绅的竹枝词有不同的特征，流寓者作品多忧患之情，宦游者咏述个人宦旅经验，本土文人着意于乡土反思与批判，皆深具文化诠释的意义。

再者，早期从大陆渡海来台的先民，能平安抵达陆地实属不易，又因“明郑以来，漳州、泉州、客家三大移民体系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地方械斗层出不穷”<sup>②</sup>，在这种背景之下，移民社会客死他乡的孤魂野鬼，自然就比安稳地定居社会多了许多，因此台湾中元普度的习俗会与大陆有很大不同。在七月的鬼月孟兰盆会上竭尽可能的铺张，并以抢孤与放水灯等活动来体现，而其背后的含意，除了超度亡魂，还有一股宣示群体实力的象征。而同样在农历七月的七夕节与魁星诞辰，台湾与大陆几无差别。在台湾女子设坛拜七娘妈，孩童挂綦魁星爷诞辰，男孩敬魁星皆与原乡（闽南地区）的习俗相同，体现了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特征。

<sup>①</sup> 陈香：《台湾竹枝词选集》，第270-272页。彭廷选（1826-1868），字雅夫，一字升阶。彭培桂之子。竹塹袁柳庄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淡水厅拔贡。善书画，工诗赋，诗文多选刻于《东瀛试牍》《瀛州校士录》等书。曾任教谕。诗集名《傍榕小筑诗文稿》《龟湖居笔记》。

<sup>②</sup> 王德威：《台湾：从文学看历史》，第49页。

# 论阳明文化在平和的传承与发展

张山梁

(福建省平和县委宣传部, 福建 平和 363700)

**摘要:**平和县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与一代大儒王阳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阳明文化始终根植于和邑大地, 滋养着平和民众的心灵家园。可以说, 王阳明领兵平靖漳寇是其“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践履, 而奏请设县则是其“明德亲民”思想的落地结果。也正因为如此, 平和既是王阳明建立功业的第一站, 也是阳明心学的实践地, 更是阳明文化的传承地。阳明文化在平和的传承、发展从未中断, 生生不息。

**关键词:** 阳明文化; 平和县; 传承发展; 生生不息

平和县从无到有, 与一代大儒王阳明<sup>①</sup>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可以说, 平和既是王阳明建立功业的第一站, 也是阳明心学的实践地。

500 年前, 王阳明受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处, 打响他建立功业的第一仗——漳南战役, 历时两个多月的征战, 先后攻破了象湖山、可塘洞、箭灌、大伞等 40 多座山寨, 擒获斩首“山贼”2700 多人, 俘获“山贼”家属 1500 多人, 烧毁贼巢房屋 2000 多间, 缴获众多的牛马辎重, 肃清了盘踞在闽粤交界山区数十年之久的以詹师富、温火烧为首的山民暴乱, 还妥善安置了 1235 名“山贼”、2828 名“山贼”家属, 让他们安居乐业。可以说, 王阳明在“漳南战役”中体现的是“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践履, 他两度奏请设立“平和县”则是其“明德亲民”思想在闽粤交界山区的落地结果。王阳明在平靖漳寇之后, 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思想家的内圣智慧, 抽丝剥茧地分析了闽粤交界的漳南地区民众落草为寇、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 基于“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的认知, 提出“析划里图, 添设新县”的思路, 探索了“添设县治, 以控制贼巢”<sup>②</sup>的长治久安之策, 两度上疏奏请朝廷添设“平和县”。从此, 平和, 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版图上的一个县, 也因此成为阳明先生过化之地。正如施邦曜<sup>③</sup>所评“(阳明)先生(奏请添设平和县)此举, 不特可以弥盗, 亦可以变俗, 允为后事之师”。<sup>④</sup>

王阳明在第一份奏疏中, 认为这里“地理遥远, 政教不及, 小民罔知法度”<sup>⑤</sup>, 明确提出“建立学校, 以移风易俗, 庶得久安长治”<sup>⑥</sup>, 对民众应“训以儒理”, 才能“政教既敷, 盗贼自息”, “变

**作者简介:** 张山梁, 男, 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理事、中共平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① 王阳明(1472—1529), 名守仁, 字伯安, 号阳明, 浙江省余姚县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军事家, 学界称之为心学大师。生于浙江余姚, 卒于江西南安, 葬于浙江山阴。因早年曾在绍兴会稽山阳明洞侧筑室读书, 自号阳明山人, 故世称阳明先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封新建侯, 谥号文成, 从祀孔庙。兼有立德、立言、立功, 被后世誉为“真三不朽”。

② [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 施邦曜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年, 第 405-409 页。

③ 施邦曜(1585—1644), 字尔韬, 号四明, 浙江余姚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历任顺天武学教授, 国子监博士, 工部营缮主事, 工部员外郎。时奸臣魏忠贤当道, 施邦曜不与附和。魏忠贤刁难, 不成。迁任屯田郎中, 期后迁任漳州知府, 善于断案, 辑评《阳明先生集要》。迁任福建副使、左参政, 四川按察使, 福建左布政使, 有政绩。历任南京光禄寺正卿, 北京光禄寺正卿; 改任通政使。起用为南京通政使。崇祯十六年十二月, 任用于左副都御史。赠太子少保, 左都御史; 谥忠介, 清朝赐谥忠愍。

④ [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 第 405-409 页。

⑤ [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 第 405-409 页。

⑥ [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 第 405-409 页。

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sup>①</sup>，达到“永保地方事理”“久安长治”的目的。可见，王阳明对教化民众、启迪思想、诞敷文德是何等重视。再者，王阳明在首任知县的选录上也颇费心血。在《再议平和县治疏》中，建议朝廷“新县所属多系新民，须得廉能官员，庶几开新创始，事不烦而民不扰。”<sup>②</sup>最终，朝廷采纳王阳明的建议，选派了一位曾经与王阳明老师娄谅<sup>③</sup>一起讲学、“志圣贤学”的罗伦<sup>④</sup>仲子——罗干到平和担任第一任知县，并于正德十四年（1519）十二月到任，“时方建县之始，百度未飭，（罗）干悉心经理”。<sup>⑤</sup>或许是无意的巧合，或许是上苍的眷顾，无论是奏请设立的王阳明，还是首任知县的罗干，都是状元之子。也正因此，平和自肇创以来，文脉源远流、文气鼎新。平和，从此就有了儒学的昌盛和教化的昌明，也有了风俗的淳化和文化的繁荣。平和，曾经“远离县治，政教不及，民众罔知法度”的穷乡僻壤，才变成了“百年之盗可散，数邑之民可安”的美好家园；昔日“盗藪”化外之地，才成为今天“冠裳”有序之区。

众所周知，要了解一个地方具有什么样的人文特质、精神品格，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看这个地方的人们在追怀什么样的人和对什么样的人表达敬意。在和邑这方土地，从置县至今的500年，平和百姓始终感念王阳明的奏立之功、教化之德，阳明精神更是始终根植于和邑大地，滋养着平和民众的心灵家园，生生不息，从未中断。可以这样说，平和县从弱到强，无一不是得益于阳明心学的滋养，是阳明文化的传承地。

平和县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开县至今的500年间，先后至少发生了“阳明门人马明衡撰碑记、传心学”“宁波教授李世浩致仕归乡讲阳明、甘泉之学”“创建阳明祠”“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之孙知平和县”“移建王文成祠于东郊”“刊刻《阳明先生集要》”“王阳明五世孙知平和县”“修葺王文成公祠、置祀田、塑像”“明清两代每年春、秋祭祀王文成”“兴办文成中学”“建制保、镇以阳明命名”“新时代构建阳明平和地域文化”等12件与阳明文化在和邑弘扬、传承、发展有关的重大事件。下面，分别略为介绍：

一、王阳明门人马明衡撰碑记、传心学。置县之初的明嘉靖五年至十一年（1526—1532）期间，也就是建县10年左右，“时开邑未久，事多草创，百废待兴”。时任平和知县的王禄“治邑如家，爱民如子。开设学、置学租……”<sup>⑥</sup>还邀请王阳明的早期弟子马明衡<sup>⑦</sup>撰写的《平和县碑记》。《明史》有载：“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sup>⑧</sup>也就是说，马明衡是一位受炙于阳明先生门下的学者，也是“闽中王门”的开创者之一。马明衡在《平和县碑记》中明确指出：“而又惧非长久之道，覆详诸司，金（指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的王阳明）议设县，疏上。天子可其奏，谓地旷民顽，即若析南靖之半，分理得人，将寇平而人和。”<sup>⑨</sup>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在平和县添设不久，当时的平和执政者就以谦卑的身段，善交“闽中王门”学者，致力

① [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第405—409页。

②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3页。

③ 娄谅（1422—1491）明代著名理学家。字克贞，别号一斋，江西广信上饶人。少有志于圣学，尝求师于四方。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冬，18岁的王阳明，因送新婚的夫人诸氏从南昌归浙江余姚，舟至广信，拜谒娄谅，并从之问学。娄谅授之以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王阳明深契之，因此始慕圣学。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姚江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

④ 罗伦（1431—1478），明代理学家、状元。字彝正，号一峰。江西吉安永丰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抗疏论李贤起复落职，滴泉州市舶司提举，次年复官改南京，居二年，以疾辞归，隐于金牛山，钻研经学，开门教授，从学者甚众。学术上笃守宋儒为学之途径，重修身持己，尤以经学为务。著有《一峰集》等。

⑤ [明]罗清霄：《漳州府志》，第1100页。

⑥ [明]罗清霄：《漳州府志》，第1100页。

⑦ 马明衡（生卒不祥），字子莘，福建莆田人；正德十二年（1518）进士，授太常博士。

⑧ [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64页。

⑨ [明]罗清霄：《漳州府志》，第1121页。

弘扬儒学文化。在当时，以马明衡为代表的一批阳明弟子在物质匮乏、思想荒芜的和邑大地上，借助儒学、书院、义学等场所，传播阳明心学，教化民众，开启心钥，将那天理之昭明灵觉、知善知恶“良知”的旨义，随地圆照，布施传道，以求人人皆可承当，高扬内心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在追逐名利、浮沉与世时，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定盘针。

二、宁波教授李世浩致仕归乡讲阳明、甘泉之学。根据《漳州府志》记载：李世浩（字硕远，号愧庵，平和县小溪镇西林人）是正德十四年（1519）的平和岁贡（平和置县“岁贡自此始”），少年时游学于蔡虚斋门下；嘉靖初年，授南海训导，奉庄渠先生之教，相与讲阳明、甘泉合一之学；之后升宁波教授，虽未能亲炙于王阳明门下，但结交了不少阳明门人，深受阳明心学熏陶；致世归乡后，创家规，正宗法，修乡约，建聚贤堂，宣讲阳明、甘泉之学，不负其所学。从这一点上看，李世浩是第一位平和籍的阳明文化讲学者、传播者。

三、创建阳明祠。为缅怀王阳明的功德，在其去世之后，凡是王阳明生前曾经活动、过化的地方，百姓纷纷立祠以祀。据《王阳明年谱附录》所记：在“嘉靖八年（1529）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后的第二年五月，“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先生……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之后，便有了“门人邹守益建复古书院于安福，祀先生”“门人李遂建讲舍于衢麓，祀先生”等等诸多立祠以祀的记载。作为王阳明立功第一站的平和县，自然也不会落下为其建祠长年祭祀这等大事。据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卷之七祀典志下记载：“阳明祠，在儒学西南隅，嘉靖三十三年（1554）佥事梁佐命知县赵进建。”<sup>①</sup>也就是说，有文字记载的平和县最早祀王阳明的专祠——阳明祠，是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距其去世已有25年之久，由福建按察司佥事梁佐（云南大理卫人，进士）督令时任知县赵进（江西南丰人，监生）筑于县城（今九峰镇）儒学的西南角。岁久已倾圮。后移建于县城东郊，改名为“王文成公祠”。

四、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之孙知平和县。据《平和县志·职官志》记载，明崇祯六年（1633）浙江台州临海人王立准（字伯绳，别号环应，选贡）就任平和知县。王立准乃是师从王阳明门人欧阳德<sup>②</sup>、浙中王门19人之一的王宗沐（1523—1591）之孙。《明儒学案》记述：“王宗沐字新甫，号敬所，台之临海人，嘉靖甲辰（1544）进士……先生师事欧阳南野，少从二氏而入，已知‘所谓良知者，在天为不已之命，在人为不息之体，即孔氏之仁也。学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释之分，谓‘佛氏专于内，俗学驰于外，圣人则合内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论。”<sup>③</sup>王立准作为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之孙从小就接受阳明学的熏陶，有“才猷敏捷，器识通方”<sup>④</sup>之誉，自然对阳明文化倍加推崇。在担任平和知县期间，“至特建王文成公祠，刻其全部文集”<sup>⑤</sup>，将阳明文化在平和的弘扬、传承、发展推到一个新高度。

五、移建王文成祠于东郊。明崇祯六年（1633），知县王立准到任不久，以建于嘉靖年间的阳明祠“湫隘卑庳”<sup>⑥</sup>为由，鉴于“溯文成之原，宏文成之业。以上正鹅湖，下鉏鹿苑，使天下之小慧闲悦

① [明]闵梦得：《漳州府志》，第453-454页。

② 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江西省泰和县人。明朝著名理学家，江右王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刑部员外郎，以学行改翰林编修，累迁礼部尚书。卒后赠太子少保，谥文庄。德所为诗文、章奏、案牘及讲学之文，有《欧阳南野集》30卷，又有《南野文选》4卷，并行于世。《明儒学案》记载：“先生以讲学为事。当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

③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14页。

④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287-288页。

⑤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287-288页。

⑥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36页。

者无以自托，是则亦文成之发轫藉为收实也”<sup>①</sup>之目的，“移建于东郊”<sup>②</sup>。祠三进，面阔三间，并请“一代完人”黄道周<sup>③</sup>撰书《王文成祠碑记》。有关移建王文成公祠的过程，可从明宫詹学士黄道周《王文成祠碑记》的载述中了解一些。黄道周在碑记中指出：“于时，主县治者为天台王公讳立准，莅任甫数月，百废俱举，行保甲治诸盗有声。而四明施公莅吾漳八九年矣。漳郡之于四明，犹虔吉之于姚江也。王公既选胜东郊、负郭临流，为堂宇甚壮，施公从姚江得文成像，遂貌之，并为祠费具备，属予纪事。”<sup>④</sup>从这段记述里，可见，时任漳州知府的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浙江余姚人）在平和阳明祠迁建过程中那运筹帷幄、居中协调的身影。无论是祀祠迁建资金的筹集，还是题匾“正学崇勋”，都有他亲力亲为的功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老家余姚带来王阳明的像，并按此塑像立于祠中，以供百姓顶礼膜拜。施邦曜是一位阳明后学的优秀王门弟子，《明史》赞之：“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以理学、文章、经济三分其书而读之，慕义无穷。”<sup>⑤</sup>施邦曜在知漳州府期间，大力弘扬阳明文化，自然而然将辖区平和县的迁建阳明祠工程排上知府的议事日程，列入用心抓、使全力推动的重点项目。王文成公祠落成之后，知府施邦曜、知县王立准还捐钱购置良田数顷，作为祀田。可惜的是，王文成公祠在1957年被辟为平和县水轮机厂，黄道周所作之《王文成祠碑记》（见图1、图2）现存于县文化馆，“明新建伯文成王夫子神位”（见图3）的灵牌散落在民间。



图1 《王文成祠碑记》



图2 《王文成祠碑记》



图3 明新建伯文成王夫子神位

六、刊刻《阳明先生集要》。王阳明同邑、后学施邦曜在任漳州知府期间，每每读到王阳明书籍刻本时，一股遨游于阳明心学浩瀚天空的激情充盈心田，始终有一种“饥以当食，渴以当饮”的感觉汲取营养。当时，施邦曜在精读隆庆谢氏刻本《王文成公全书》过程中，时常加以评点、批注，也感受到隆庆本《王文成公全书》存在帙卷繁多、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等问题，便将《王文成公全书》进行分门别类，条分缕析，评释丹铅，累累贯珠，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

① [清]王相修，昌天锦等纂：《平和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7—218页。

② [清]黄许柱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

③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螭若、螭平、幼平，号石斋，漳浦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隆武二年（1646）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年间改谥“忠端”。道光四年（1824），从祀孔庙。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儒学大师。

④ [清]王相修，昌天锦等纂：《平和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7—218页。

⑤ [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52页。



数易其稿，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共3编15卷（其中《理学编》4卷、《经济编》7卷、《文章编》4卷），并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于明崇祯七年（1634）秋肇工开刻，崇祯八年（1635）夏末竣工，书成。奉以藏之文成祠中。<sup>①</sup>学界称其为崇祯施氏刻本。王立准在为该书作跋中称赞：“准（王立准）捧而读之，如日月之行天，如河汉之无极。郭象注庄，苏洵评孟，未易逾此。”<sup>②</sup>这部刊刻于平和的《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成为后来多家翻刻的底本，与隆庆谢氏刻本，并称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阳明学术的人不可不知，不可不查的基本资料，为阳明学的传播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美国学者亨克于1916年出版了《王阳明的哲学》（见图4），阳明心学的著作才向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因亨克在中国期间所见王阳明著作的中文底本，就是首刻于平和的《阳明先生集要》之《理学编》，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阳明的哲学》就是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的英译本。目前，这部刊刻于平和的《阳明先生集要》，分别珍藏于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2018年，平和县有关方面将其影印，让这部文化巨作再现平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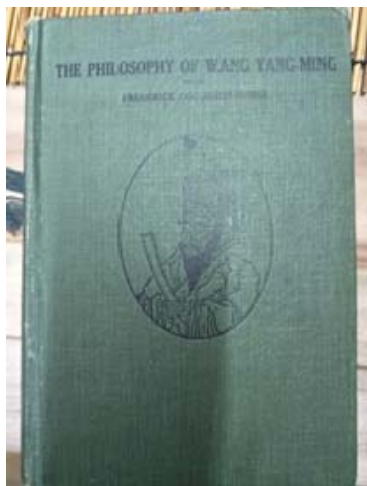


图4 《王阳明的哲学》

七、王阳明五世孙知平和县。据清光绪丁丑《漳州府志》（秩官志）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王孙枢权（号天智）任平和知县。<sup>③</sup>又据清道光《平和县志》（政绩志）记载，署县“王孙枢，浙江余姚人，文成公五世孙。革旧习，行新政，有数典不忘焉，重修学宫，有碑记。”<sup>④</sup>从中得知，王阳明五世孙王孙枢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1661-1662）权任平和知县（通俗的说法就是代理知县）期间，最值得一书之政绩就是“重修学宫”。王孙枢刚到平和“署邑事”<sup>⑤</sup>之际，但见“学宫鞠为茂草”，“文庙墙宇倾圮，廊庑荒落”<sup>⑥</sup>，感叹“此前人垂成之功，将竟未竟之绩也”<sup>⑦</sup>，于是，带头捐出薪俸金银，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十五日开工重建学宫，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素有潮州“戊辰八贤”之一的李士淳<sup>⑧</sup>在《重修儒学碑记》中指出：“公（王孙枢）以五世后裔不忘乃祖创业，

① [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第1023页。

② [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第1023页。

③ 《宦庵手抄漳州府志》，漳州市图书馆2005年出版，第235页。

④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291页。

⑤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29—330页。

⑥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29—330页。

⑦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29—330页。

⑧ 李士淳（1585—1665），字二何，广东梅州人。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并荣获会魁，选任山西省翼城县知县。1645年，唐王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其被任为詹事府詹事，积极从事反清复明。1646年3月福州隆武朝廷陷落，其见反清复明无望遂遁入阴那山中潜心著述，著有《古今文苑》《三柏轩集》《燕台近言素逸言》《质疑十则》《诗艺》等。后人把崇祯戊辰同榜潮州进士李士淳等八人称为“戊辰八贤”。

前作后述，孝也。和邑诸生沐公教育之德，当益思文成创肇之功；思文成创肇之功，则当师文成良知之学。”<sup>①</sup>

八、修葺王文成公祠、置祀田、塑像。王文成公祠落成后，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虽有倾圮，但也屡有修葺。据志书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平和知县林翹到任后，见祠“岁久渐颓，庙貌不复如故”，“其栋梁朽蠹、门垣倾圮，殊失观瞻。因集诸绅士与议而鼎新之”<sup>②</sup>，并于“祠后闲旷之地，修筑义学十余间”<sup>③</sup>；“康熙五十七年（1718），知县王相捐俸重修”<sup>④</sup>；“乾隆二年（1737），钱梦珠踵而新之，祠宇清肃”<sup>⑤</sup>。乾隆十一年（1746），知县周芬斗感慨“文成之灵固在天下，罔有怨恫，而邑之士民得毋愧忘其所自始耶？”<sup>⑥</sup>，捐俸“创置祀田若干。税收于县官，春秋供祀”<sup>⑦</sup>。2016年春，九峰镇各界贤达重新雕塑王阳明金身，并将其安放在王文成公祠遗址，供人观瞻礼祀膜拜。

九、明清两代每年春、秋祭祀王文成。王文成公祠自明崇祯年间落成之后，“每岁春、秋二仲上戊日致祭，祭品与朱文公祠同（即：帛一，白瓷爵三，匏一，簋、簠各一，笱、豆各四，羊一，豕一，酒樽一），行二跪六叩首礼。”<sup>⑧</sup>而且有祭祀王文成公专门祭文：“惟公建议，僻壤邑治是新。克平大憝，黎元宁谧。今兹仲春(秋)，谨以牲、帛、醴、齐、庶品，用伸常祭。尚飨！”<sup>⑨</sup>也就是说，明、清两代，每年农历的二、八月上旬戊日，平和历任知县都要率领县衙官员、乡绅以及书院、义学、社学的师生到王文成公祠，行二跪六叩首的礼节，祭祀王阳明，让平和百姓勿忘阳明先生的奏立之功、教化之德。

十、兴办文成中学。王阳明奏立设县时，就十分重视教育问题，并把学校列入考虑的范围，这在其《再议平和县治疏》所言“学校教官，合无止选一员署印，先行提学道，将清宁、新安二里见在府县儒学生员，就便拨补廩增之数，其有不足，于府县学年深增附内，量拨充补；又或不足，于新民之家选取俊秀子弟入学，使其改心易虑，用图自新”<sup>⑩</sup>中可以得到印证。因此，以王阳明的谥号来作为学校之名，更有特殊之意。平和县文成中学创办于1929年，前身是私立东溪初级中学（1929—1937）、私立双十初级中学（1937—1946）、私立文成初级中学（1946—1949）。1927年春，平和贤达林友梧等捐资倡办“私立东溪初级中学”；1929年10月，校舍落成并举行揭牌典礼，正式开学。1934年10月，厦门私立双十中学因日军侵入移迁平和，借用私立东溪中学校舍上课；1946年6月，双十中学奉令迁回厦门，在原双十初中基础上成立“私立文成初级中学”。意在纪念明朝一代圣哲王阳明对平和置县的功绩，同时寄望文成学子能“学如阳明成大器，长如文成毓英才”。1949年10月，文成中学与大诚中学合并，改称“平和县新民中学”；1954年春，定名为福建省平和第一中学。1983年9月，平和县又在文成中学原址附近兴建“城镇中学”；1996年3月，城镇中学复名为文成中学，学校始终秉承阳明先生遗德，与时俱进；2008年，文成中学与县城地区的小溪中学、育才中学，整合成立“平和广兆中学”。如今的平和，文成中学已经深深烙进了平和学子的心中，“阳明书画院”等一批以“阳明”命名的文化实体不断涌现，已然成为“弦诵文物，著于郡治”“人为诗书，家成邹鲁”的地方。

十一、建制保、镇以阳明命名。王阳明虽只在和邑这方土地驻留二个月左右的短暂时光，但却

①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29—330页。

②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36页。

③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36页。

④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129页。

⑤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34—335页。

⑥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34—335页。

⑦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34—335页。

⑧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129页。

⑨ [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129页。

⑩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66—467页。

给了平和一个新生。几百年后，这方百姓始终感怀先哲，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社保、乡镇。1940年，平和县划为4个区，分辖21个乡镇，192个保，在琯溪镇的领辖下，就有一个以王阳明命名的社区，即阳明保，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的阳明保位于今天县城老城区三角坪一带的中东街、中西街、九一七街和民主街。1950年6月，建立乡镇人民政权；年底，全县划分9个区，领125个乡镇，在第一区领辖的20个乡镇中，有一个阳明镇，也是当时唯一的建制镇，其余均设为乡；直到1958年上半年，撤区并乡，全县划分为45个大乡，阳明镇才并入小溪乡。当时的阳明镇，领辖中山东、中山西、府前、民主、桥头、后巷、生产、解放北等街路，镇人民政府设在解放北街（今九一七街28号）。目前，原阳明镇人民政府驻地还有一行斑驳的“阳明镇人民政府”字迹依稀可见。进入21世纪，在县城还新建了以“阳明”命名的“阳明路”“阳明公园”，创办了“九龙江阳明投资有限公司”“阳明驿站”经济实体，一些企业还将阳明文化融入商标品牌，注册了“心即理”“天泉道”“阳明平和”等商标，一个个“阳明”文化符号的嵌入就是一次次阳明文化记忆的叠加。

十二、新时代构建阳明平和地域文化。近年来，作为王阳明奏请设置的平和县，始终不忘阳明奏立之德，认真挖掘、研究、传承阳明文化的内涵和时代价值，构建阳明平和地域文化。在阳明平和地域文化宣传普及方面，将弘扬传承“阳明文化”列入县委的工作要点，开展以“崇德明礼、向善知行”为目标，以“阳明传习堂”为载体，大力弘扬“知行合一”置县精神，推动阳明平和地域文化落地生根，增强文化软实力。先后创办了18个“阳明传习堂”，举办传统文化讲座100多场，受众超过5000人次，浙江、广东、江西等地的阳明文化研究者多次前来观摩，并给予高度评价。著名阳明学专家吴光教授在实地考察后认为：平和县“阳明传习堂”的做法是全国阳明文化有效落地的典范。在阳明平和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先后主编出版《阳明平和》期刊4期、4000册；出版了全省首部阳明地域文化专著《心灯点亮平和》，揭示了王阳明与平和的关系，拉开了“闽中王门”的帷幕，呈现了一幅中国地域文化中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sup>①</sup>还出版了《王阳明读本——“三字经”解读本》《王阳明与平和》等2部著作。2018年，先后举办了“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平和分论坛——王阳明与平和”学术座谈会、首届海峡两岸（福建平和）阳明心学峰会，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到会，弘扬了阳明平和文化。县内的阳明文化爱好者也积极参加各地的论坛、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交流沟通，接待了浙江、江西、广东等外地阳明学者20多批次、300多人的学术考察、田野调查，为传承阳明平和地域文化提供了学术支持，有4人加入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1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此外，明正德年间建设的县衙遗址、文庙、城隍庙以及黄道周撰拜书的《重建王文成公祠碑》等一批阳明遗迹、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光风霁月，馨香千载。昨天的和邑，历经了500年岁月的沧桑变化，至少发生了上述12件阳明文化活动事件，足以说明阳明文化在平和大地的传承、发展始终没有中断，生生不息；今日的平和，正站在建县50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重新出发，再一次拉开“闽中王门”的帷幕，践行“知行合一”，在和邑大地上续写弘扬、传承、发展阳明文化的新辉煌，戮力建设“阳明古郡，文化平和”。

<sup>①</sup> 张山梁：《心灯点亮平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序言第19页。

# 闽地高僧慈航信仰与两岸文化交流

郑顺婷

(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 闽地高僧慈航法师, 人称慈航菩萨。慈航信仰在海峡两岸极为流行, 拥有两岸信众 1 亿多人。慈航法师有坚定的宗教信仰, 却又兼备人文精神, 出世而具有救世情怀, 倡导以佛教精神与思想服务社会的“弘法利生”理念, 致力于现实人间实践佛法。他关心国家安危, 是一位爱国僧人。他一生热衷于教育, 尊师重教, 主张佛教是教育。慈航的身前身后对两岸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慈航法师; 海峡两岸; 佛教; 文化; 教育

闽地慈航法师是现代佛教界的一位高僧。其生活的年代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等几个时期, 生活的地域遍及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缅甸、新加坡等地。他一生致力于护法弘法, 以毕生精力推行“人间佛教”, 取得卓越成就。圆寂后成为台湾首尊全身舍利——肉身菩萨, 人称“慈航菩萨”。

## 一、慈航菩萨生平

慈航菩萨, 俗姓艾, 名继荣, 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八月初七日午时生于闽建宁县艾阳村艾家际。父亲艾章璠, 字秉钧, 监生出身, 以设塾授徒为业; 母亲谢玉润, 系城邑文庠笔耕翁之次女, 以淑德闻于乡里。艾继荣出生于书香门第, 6 岁开蒙入读于报国寺旁的私塾。报国寺的晨钟暮鼓为他种下了佛根。慈航菩萨早年命运多舛, 11 岁母亲不幸病故, 12 岁父亲谢世, 他 17 岁于泰宁县峨眉峰庆云寺正式落发出家, 法名慈航。

18 岁至 32 岁, 为了修学佛法开阔眼界, 慈航前往各处寺庙修行, 分别住江西九江仁能寺、常州崇法寺、天宁寺、苏州戒幢律寺、宁波观宗寺、南京香林寺、扬州高旻寺、九华山、南京正觉寺等。其中, 九华山肉身菩萨辈出, 慈航深受震撼, 因此在九华山修持了两年。33 岁慈航前往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追随太虚大师, 并在太虚大师的教导下学习经、律、论三藏典籍。34 岁转南京毗卢寺, 在太虚大师和圆瑛大师领导的中国佛学会任庶务。35 岁在安徽安庆迎江寺任住持。从 18 岁到 35 岁整整 17 年时间, 慈航参访各地, 从一名小沙弥研修为一代大德高僧。

慈航 36 岁赴香港弥陀精舍讲经弘法。37 岁至 40 岁在缅甸仰光弘法。41 岁又回到祖国, 先后在香港、广州、厦门、上海弘法。之后陪同太虚大师到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桐城、九江、庐山、武汉等地弘法讲学, 受到佛教界的热烈欢迎。45 岁跟随太虚大师组织的“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访问东南亚各国, 传达我国的抗战政策。其后留在新加坡等地弘法。54 岁赴台办“台湾佛学院”, 主持院务。60 岁于台湾弥勒内院法华关中圆寂, 入塔后山。寂后坐缸, 面目如生, 俨然老僧入定, 封

缸后葬于后山墓塔。

1959年5月19日弟子们开缸检视，发现慈航肉身不坏、袈裟完好，面呈紫色，眼睛发亮，耳鼻口俱全，唇尚软，身肌尚有弹性，且长出头发与鬃须，眉毛亦长了许多。慈航肉身后被装金，迎归弥勒内院安座供养，成为台湾首尊全身舍利——肉身菩萨，人称慈航菩萨。慈航信仰在海峡两岸极为流行，两岸信众有1亿多人。

## 二、慈航信仰的人文精神

### （一）救世情怀

慈航法师生于1895年，圆寂于1954年。他一生的60年正好处于传统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段之中。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三个问题：国家重建，社会重建，精神重建。国家重建在于制度，社会重建关乎民生，精神重建直接涉及人民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文化素养。一个国家，制度的转换与人民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换应当相互一致。随着晚清社会的衰败，当时的佛教也是极为衰颓，突出表现为僧人素质低下，不能为社会提供精神与心灵的服务。当时的客家人孙中山先生等著名人物致力于通过革命推翻满清黑暗统治，建立共和制度。而慈航大师则继承太虚大师与圆瑛大师等师志，推动人间佛教的理念，兴办僧伽教育，提高僧众水准，培养僧才，并通过他们去弘扬慈悲仁爱的道德观念，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以使人类社会走向爱与和谐。<sup>①</sup>

这种以佛教精神与思想去服务于社会的过程，便是“弘法利生”，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利他”精神。慈航法师继承太虚大师佛教服务现实人生的理念，宣导的是人间佛教。他不仅努力实践佛法于现实人间，护教救危，而且还心系国家安危，呼吁普及佛法以救中国。他说：“倘若一个佛教徒，采取那离群索居的主义，长期和世人隔居在那深山里的话，那么这个宗教，不但不能盛行在这个人世间，而且还要遭遇灭亡的危险。假使侥幸存在，也不过是跟着他的几个教徒埋在深山里而已。这是我们应当时刻觉悟和警惕的事啊！”<sup>②</sup>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慈航虽然是僧人，却念念不忘爱国。1936年慈航到上海拜会圆瑛大师，大师邀他一同观看上海僧侣救护队战地训练。在演讲会上，慈航慷慨激昂地说：“国难当头，僧人有责。每一位僧人都应该记住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的一句话，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慈航的一生以办学办刊的宗教行为，响应教育兴国的社会理念；他以慷慨激昂的《我有一个理想》演讲，描述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救国，救国，凡属国民一分子，都应负起救国的责任……”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助流亡学僧，活脱脱一位菩萨。1945年日本投降时，慈航法师欣喜若狂，在灵峰山上高呼：“阿弥陀佛，我们终于胜利了！”同年他在《佛教人间》中发表了《吾爱吾教亦爱吾国》，体现出了爱国爱教的赤诚之心和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 （二）重教观念

慈航法师一生热衷于教育，他主张佛教是教育。在民国佛教关于“佛教是否为宗教”的争议中，慈航法师说：“以我的解释，宗教是有两种定义：宽义，狭义。现在先释宽义的宗教：宗者宗旨，教者教化，即是‘以自己的宗旨，去做教化他人’……若从狭义上说，则是：‘凡主张神能创造宇宙或主宰宇宙者便是宗教’，那么应当归于一神、多神、泛神等教才对；如耶教之上帝，回教之真宰，婆

<sup>①</sup> 张建业：《慈航与民初社会思潮》，《两岸潮音》，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11年。

<sup>②</sup> 《菩提心影》上卷《人生篇》二四《畸形的佛教》，第359页。

罗教之大梵天王等，这才是宗教。”<sup>①</sup>他还运用因明学的宗、因、喻三支比量，提出“佛教是教育。国家需要教育。教育可以救国”<sup>②</sup>。

文化、教育、慈善是慈航法师平生追求的三大理念。他说：“佛法既是令人离苦得乐的法宝，然而我们应如何去推行它呢？这可从三方面着手推行，就是文化、教育、慈善。因为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才；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和信仰。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命圈！”<sup>③</sup>在这三大理念中，教育是核心是关键。慈航法师重视教育、主张佛教是教育的理念在当时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民族危亡、国家动乱之际。

他还说：“讲经说法不是我的本愿，我的本愿是培植人才，因为讲经说法的法师很多，办教育的人少。同时住持佛教是需要人才的。”后半生中，他每到一地，都以在那里兴办菩提学校为己任，从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台湾，一直在僧才教育、培养僧才的路上。据统计，慈航法师创办的学校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有安庆迎江寺义务夜校、安庆迎江寺国民学校、安庆迎江寺僧伽训练班；在中国台湾地区有沥圆光佛学院、台湾灵泉佛学院、台湾狮山佛学院、台湾佛学院、台湾汐止弥勒内院；在南洋地区的有星洲菩提学院、星洲菩提学校、檳城菩提学院、檳城菩提学校。他通过创办菩提学校、佛学会、佛教人间月刊，培养出众多僧才。慈航法师的教育理念主要是针对僧才教育。在他看来，僧才教育的实践方法应以慈善为相，以教育为用，以文化为体，此为“相用体”。在他看来，教育根本的精神在文化，文化需落实于教育，教育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认为，世间越是动乱，僧众们越是要保持自己的僧格、僧德，以僧人特有的风范来让大众更加尊重，才能使社会更加安定、国家更加祥和。

就像闽地的很多理学教育家那样，慈航法师是一位精通教育规律的僧界教育家，他将佛学与社会结合，重实践，知行合一。慈航法师理想中的教育是：“我想办一个佛教学校，内部分为五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法学院、佛学院。除了佛学院是专门研究佛学之外，其余的四院，都同普通所办的大学课程一样，唯每周加两节佛学常识，令学生知道佛学内容是什么，不至于是门外汉，对于佛学有了认识，一旦毕业后，到各处去服务，自然护法为民。”他的教育观已经跳出佛教教育，上升到普遍教育。他不仅创办学校，还亲自讲经说法，给学生上课。他说法时从不计较人数，一人也讲，十人、百人都讲。慈航大师治教勤勉，即使到晚年也务使一分钟也不虚度。表1是大师的每日定课表，慈航法师直至圆寂当日上午还在上课，午餐后还在编藏书目录，这为后辈们树立了至上的榜样。

表1 慈航法师每日定课表

时间	定课
晨间五时至六时半	诵经礼拜
七时至八时	读英文
八时至九时	读经
十时至十二时	编书
午睡后二时至三时	讲经
五时至六时	编书

①《菩提心影》上卷《释疑篇》九《宗教研究》甲《宗教的意义》，第88页。

②《菩提心影》上卷《释疑篇》一一《佛教可以救国》，第98页。

③《菩提心影》上卷《人生篇》三六《佛法就是佛法》，第428页。

时间	定课
晚上八时至九时	讲经
九时至十时	编书
十时后	礼佛静坐就寝

### （三）尊师思想

慈航法师的出生地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信奉“天地君亲师”。慈航法师虽为出世之人，却并非隔世无情，对于“父母之情”“师友之情”“民族之情”“苍生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于1927年考入厦门闽南佛学院受学于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革新的先驱，对慈航的一生影响极大。慈航也终生以成为太虚大师的弟子为荣。慈航法师在闽南佛学院第一次见到太虚大师，便决定一生“以师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慈航法师自许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在很多场合明言：“我的老师就是太虚大师。”1950年，台北汐止弥勒内院落成时，慈航法师表示，弥勒内院就是太虚大师纪念堂，他说：“本院供的佛，是释迦世尊、弥勒菩萨、太虚大师，是表示三位一体；本人即在这弥勒内院代表三位阐扬唯识教理。这是定名为弥勒内院的第六个意义。弥勒内院又是菩萨学处，又是太虚大师的纪念堂。”

慈航法师感念太虚大师的恩德，终生不忘。在他的多首诗作中表达了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如《奉寄太虚大师》：“深入民间胜住山，蓬门未设不须关。心如流水随来去，身似浮云住往还。人法皆空夫岂易，利名不染更维艰。亲事学法三三后，愿把身心奉佛颜。”这首诗是太虚大师提倡佛教改革、积极与社会各界往来、推广其佛教革新理念的真实写照。“心如流水随来去，身似浮云住往还。”是对太虚大师心性的赞颂，彰显大师“人法皆空”“利名不染”的境界。又如《怀师》一诗：“屈指三年别我师，茫茫云海每相思；心香一瓣无由显，聊借潮音献短诗。”抒发了对恩师的殷殷思念之情。又《赞太虚大师四德颂》：“太清无始亦无终，虚豁圆融处处通。大地有情同一体，师心如海印晴空。”这首诗是太虚大师圆寂后，慈航法师在悲痛中为老师所写的。“四德”是佛教中的一种境界，即“常、乐、我、净”，又称“涅槃四德”。这是对恩师最高的赞誉。

此外，慈航法师年轻时曾学禅于圆瑛大师，游学于谛闲法师之门，于度厄法师坐下习净土。圆瑛大师是曹洞宗第四十六代法嗣，抗战时期在上海的“僧侣救护队”，他与慈航志同道合，交往密切，后将四十七代法脉传给慈航。慈航也多次写诗赠给圆瑛大师：“当年太白曾陪坐，后又相亲七塔塘。三复沪滨期报本，德风早被忆甘棠。”又如：“佛说因缘固亦奇，因缘犹必待时宜；亲师虽早离师速，直至如今悔已迟。”圆瑛大师圆寂，慈航正在台湾闭关，悲痛中写下了《风雨声中悼我师》的祭文。

## 三、慈航信仰与两岸文化交流

海峡两岸客家人血缘与文化同根同源，两岸僧道宗教界也是一样。1948年，应台湾圆光寺妙果和尚的邀请，慈航法师赴台弘法，创办台湾佛学院，开启台湾佛教教育的新纪元。后在台北汐止秀峰山兴建弥勒内院，开讲大乘经论。弥勒内院成为当时台湾佛教教学中心，培养了许多佛教精英人才，如星云法师、净良法师、了中法师、自立法师、印海法师等，促成了台湾佛教的全面复兴。但是慈航法师始终挂念自己的故乡，临终前对弟子说：“我已老病，今生返回大陆已无可能。但愿入寂后，将来能有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一天。”

慈航以他对两岸文化的巨大影响，身后继续影响两岸文化交流。慈航法师出生于福建省建宁县，

18岁在福建省泰宁县庆云寺出家。两县都是慈航法师的故里。2007年9月17日，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慈航木雕模拟圣象回归福建泰宁，安奉在闽浙赣最高的寺庙，位于海拔1600多米的泰宁县弥勒山庆云寺。两岸和香港、澳门及美国、新加坡、印尼等地佛教界人士及当地信众上千人参加。两岸佛教界人士表示，慈航法师魂归故里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两岸亲情和法脉无法割舍，两岸因缘谁也阻隔不了。2009年6月20至22日，首届海峡两岸慈航法师文化论坛在慈航故里建宁县召开。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明学法师，台湾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高雄县佛教会理事长心茂法师及两岸信众共400多名佛教界人士及慈航法脉弟子齐聚建宁。期间举行了建宁报国寺佛像开光法会、慈航纪念馆奠基典礼，成立了建宁慈航文化研究会。2009年12月，建宁的报国寺和泰宁的庆云寺被三明市民宗局、台湾事务办联合授予“三明市对台交流重点寺院”。2010年11月13日上午，慈航菩萨祖庭福建泰宁庆云寺隆重举行了大雄宝殿兴建落成佛像开光大法会。后还隆重举行了慈航菩萨纪念馆奠基仪式。2011年2月24日，福建省对台（慈航）文化交流基地在建宁县报国寺举行开工仪式。2011年，三明市宗教文化研究会、三明市佛教协会和建宁报国寺共同举办两岸四地高僧和专家学者参加慈航文化研讨会。这些活动有力地推进了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有利于繁荣中华传统文化，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慈航大师在台虽只有六年光阴，但他的影响却是百年台湾佛教的磐石。他是台湾佛教之光，是台湾光复一甲子以来台湾佛教永远的第一人。慈航信仰不仅在台湾生根发芽，还推动了两岸文化交流，走向全世界，真正实现了“人间佛教”。他既是中国佛学界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的典范，也是两岸客家在佛教、教育、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典范。